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位於太平洋盆地西側的台灣，這美麗的福爾摩沙，不僅孕育海洋文明，同時也深受大陸文明所薰陶。因為台灣正處於海洋文明進入到大陸文明的門戶，也是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接軌的橋樑。它不僅扼守西太平洋的海線要道，也是東亞地區交通與營運的樞紐的最佳要塞。

自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無情的戰火曾經蹂躪過中國大陸、朝鮮半島、日本、菲律賓、越南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唯獨台灣得天獨厚，完全不為人類爭鬥所引起的戰火而遭受到破壞。經過先賢先烈在這個島上胼手胝足，深耕闢拓，讓台灣的人口增加、經濟繁榮、社會開放等。可惜的是近一百年來，先有日本殖民，後有冷戰孤立，讓台灣人民不僅失去與世界交流的機會，也激發出濃郁的悲情意識。

台海兩岸自 1949 年分治以後，長期處於軍事衝突與冷戰的對峙關係，在事實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據台灣海峽一方已逾半世紀，兩岸的關係其實就是「反攻大陸，殺『朱』拔『毛』」與「武力解放台灣」、「七分政治，三分軍事」與「和平解放台灣」，到了八十年代，雙方的關係則轉變成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後，兩岸關係中軍事所佔的比重也相對降低許多。然而，「兩個政治實體」已經儼然形成，但受限於兩岸政府僵化的「一個中國」、「台獨」，或「獨台」等政策思維影響，兩岸關係至今仍陷入僵局，台海穩定依舊充滿變數。

李登輝於 1988 年繼任中華民國總統後，在其十二年的執政期間，先後成立「國統會」、「陸委會」與「海基會」等單位，促成「辜汪會談」，開啟兩岸民間交流，不但延續「後蔣經國時代」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陸政策大方向，更促使兩岸關係透過多次的交流與協商，終能快速發展。

然 1994 年李登輝在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問時，「自比摩西帶台灣人民出埃及到應許之地」、「『中國』這個名詞是含混不明的」、「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以往掌握台灣權力的，即使是國民黨，全

部是外來政權」、「中共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是很奇怪的夢」等相關談話，引起中共強烈質疑與不滿。這不僅是兩岸關係由平順轉為衝突的開始，更是李登輝主政下大陸政策由「統」逐步轉向「獨」的轉捩點。隨後 1995 年李登輝以總統之名訪美、1996 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以及 1999 年李登輝正式提出「七塊論」、「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等主張，不但促使中共不斷對台文攻武嚇，更使兩岸關係跌入谷底，自此台海又再次陷入緊張與不確定的敵對狀況。

李登輝執政十二年期間，雖然推動一連串的政治理念與政治改革，但也顛覆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使兩岸關係脫離「一個中國」的軌道，首次呈現多重選項。然而，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出身於國民黨、繼承蔣經國遺位的李登輝，其大陸政策會從設立「國統綱領」、「陸委會」、「海基會」等的「統一中國」，演變成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類台獨意識」？其中轉化的過程為何？是李登輝個人的主觀意識改變？還是美中台三角關係出現變化？抑或是國內政治統獨意識消長所造成？正是本文想探究的問題。

貳、研究目的

探討李登輝主政下的大陸政策，為何會由「統」轉向「獨」？是李氏個人喜好所造成？是單純受國內民意所趨影響？還是有其他如美中台關係等國際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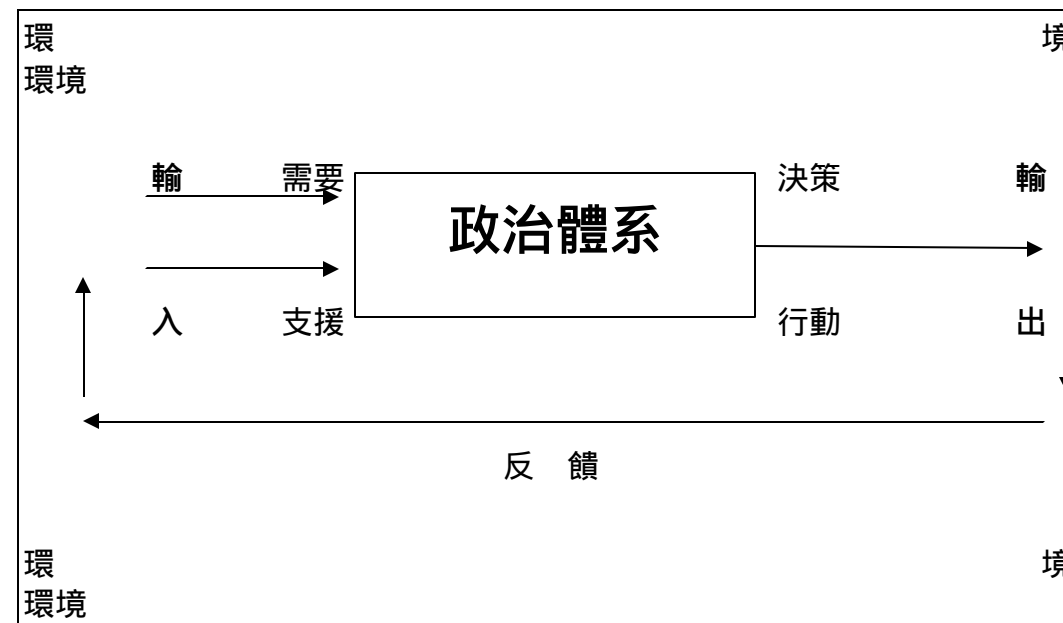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政治系統理論（Political System Theory）

依據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理論」，政治主要為社會系統作權威性的價值分配¹；「系統」從實際運作的過程來看，中心是在權力組織與成員間的關係，以國家而言，就是政府與人民間的關係。其系統分析架構圖（圖一）如下：

¹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5, p112.

圖一：系統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²

政治體系包括下列各要素³：

- (一) 環境(Environment): 指可影響政治系統運作的社會、生物與個人的力量，但與政治系統相分離的因素。
- (二) 輸入(Inputs): 環境中影響政治系統及引起政治系統反應的項目。並分為：
 - 1、 需要 (Demands): 為表達對社會價值分配願望之需要。
 - 2、 支援 (Supports): 表示接受政治價值分配，或接受做成此分配的過程。
- (三) 轉化 (Conversion): 政治系統將需求、支援轉換成產出權威性決策行動的行為。
- (四) 輸出 (Outputs): 指政治系統影響環境的諸行動，主

² 同註一。

³ 彭懷恩，《政治學》，(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6)，16至17頁。

要包括權威性決策與行動。

(五) 反(回)饋(Feedback): 由產出影響環境後, 對需求或支援造成的改變, 又重新投入到政治系統的過程。

本文希望藉由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理論」, 深入探討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大陸政策(即政治系統理論中的「輸出項」), 到底是受到內部因素如國內民主進展的影響? 還是外部因素如兩岸關係演變? 抑或是美中台等國際因素的影響(即政治系統理論中的「輸入項」), 才會讓李登輝時期的大陸政策, 由「統」轉化到「獨」, 從「國統會」轉化成「兩國論」?

事實上, 當前兩岸關係研究中的相關理論包括:

- (一) 兩岸互動面向的「整合理論」、「分裂國家理論」與「博奕理論」等;
- (二) 國內政治面向的「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即唐斯法則) 與「發展國家理論」等;
- (三) 國際環境的「戰略三角理論」與「國際體系理論」等。

就李登輝主政時期而言, 國民黨正處於一黨獨大的優勢政治環境, 因此當時李登輝應著重於「如何凝聚本土意識」, 而非考量「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

明居正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⁴中也提及, 「包宗和用博奕理論研究美中台三邊關係是一個例外」。而就現實主義來看, 兩岸關係一方面夠成「台北—華盛頓—北京」(即美中台)「小戰略三角」的一部份, 一方面又附著在整個國際體系當中。因此本文除採「政治系統理論」外, 將同時將以「戰略三角理論」來檢視李登輝主政時期大陸政策演變之「外部因素」。

⁴ 明居正, 《國際體系理論與兩岸關係》, 《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000年4月), 365-388頁。

貳、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對論文的重要性，在於研究方法不僅是探索問題、追求真理的工具，更具有指導研究人員如何構思、蒐集資料與分析資料的功能。⁵至於研究大陸問題的方法，則包括分析法、演繹法、歸納法與歷史研究法等科學方法，但若以機械式的單一研究方法來研究所有問題，恐將受到侷限而無法真正能夠探索真理。因此應針對研究主題與資料的多寡，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以不同角度的觀點，作縝密的分析，方能得到接近事實的分析與判斷。⁶因此本文將採取文獻研究法與深度訪談法，來進行研究。

一、文獻分析法（ literature review ）

所謂文獻分析法，必須經由廣泛的蒐集、閱讀與整理相關理論之研究成果，並針對中外文書籍和文獻進行研究。因此除了一般閱讀外，應將內容加以分析，並充分利用相關期刊、統計數據、報紙、專書、法條及政府出版品加以研究。最後始能針對研究標的進行深入探討，並試圖追求進階文獻。⁷

本研究主要針對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大陸政策相關主題進行文獻檢視，試圖從重點性文獻中摘要其研究發現與代表性，並針對相關文獻作一評述，進而延伸至李氏主政時期大陸政策演變之原因研究，試圖達到本文研究目的之開創性意義與價值。

二、深度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 ）

所謂深度訪談法，是種無結構、直接的、個人的訪問，在整個訪問過程中，掌握高級技巧的調查員深入地訪談一個被調查者，以揭示對某一問題的潛在動機、信念、態度和感情。⁸深度訪談常用的技術通常包括下列三種：（1）階梯前進；（2）隱蔽問題尋探；（3）象徵性分析。

⁵ 易君博，《政治裡輪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84年9月），223-4頁。

⁶ 郭華倫，《中共問題論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年10月），393頁。

⁷ 李美華等人譯，Earl Babbie 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下）》（台北：時英出版社，1998年2月。）

⁸ 胡幼慧，《性質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研究實例》（台北：巨流出版社，1996年12月），27頁-45頁。

因此深度訪談，通常將訪談過程視為「交談事件」，強調「訪問者」與「受訪者」雙方共同進行意義建構的過程。⁹換言之，「深度訪談法」並非由訪問者「挖掘」受訪者已存在於其個人腦海中的想法和情緒，而是透過雙方互動的過程，共同去經歷、選取與感染，重新建構共同的意見與情緒。因此深度訪談的結果所得，是「受訪者與訪問者」雙方經由持續的互動所共同營造出來的。

由於中國大陸研究課題之侷限，因此深度訪談之技巧與訪問對象之選擇，對於探索真相十分重要。故選擇適當訪問對象、透過指導教授的轉介，以及訪問目的透明化等，都是深度訪談成敗的重要關鍵。

本研究擬對兩岸專家學者進行深度訪談，特別是當時在李登輝主政時期，曾經擔任或參與兩岸事物決策的重要閣員、智庫學者，如前陸委會主委蘇起、國安會委員蔡英文，以及前外交部長胡自強等，以開放式的訪談法，透過面對面的接觸，訪談有關「李登輝主政時期大陸政策演變之主要原因？」、「當大陸政策調整時，大陸、美國或日本的反應為何？」、「國內民主政治的進展對於李登輝的大陸政策影響為何？」等重要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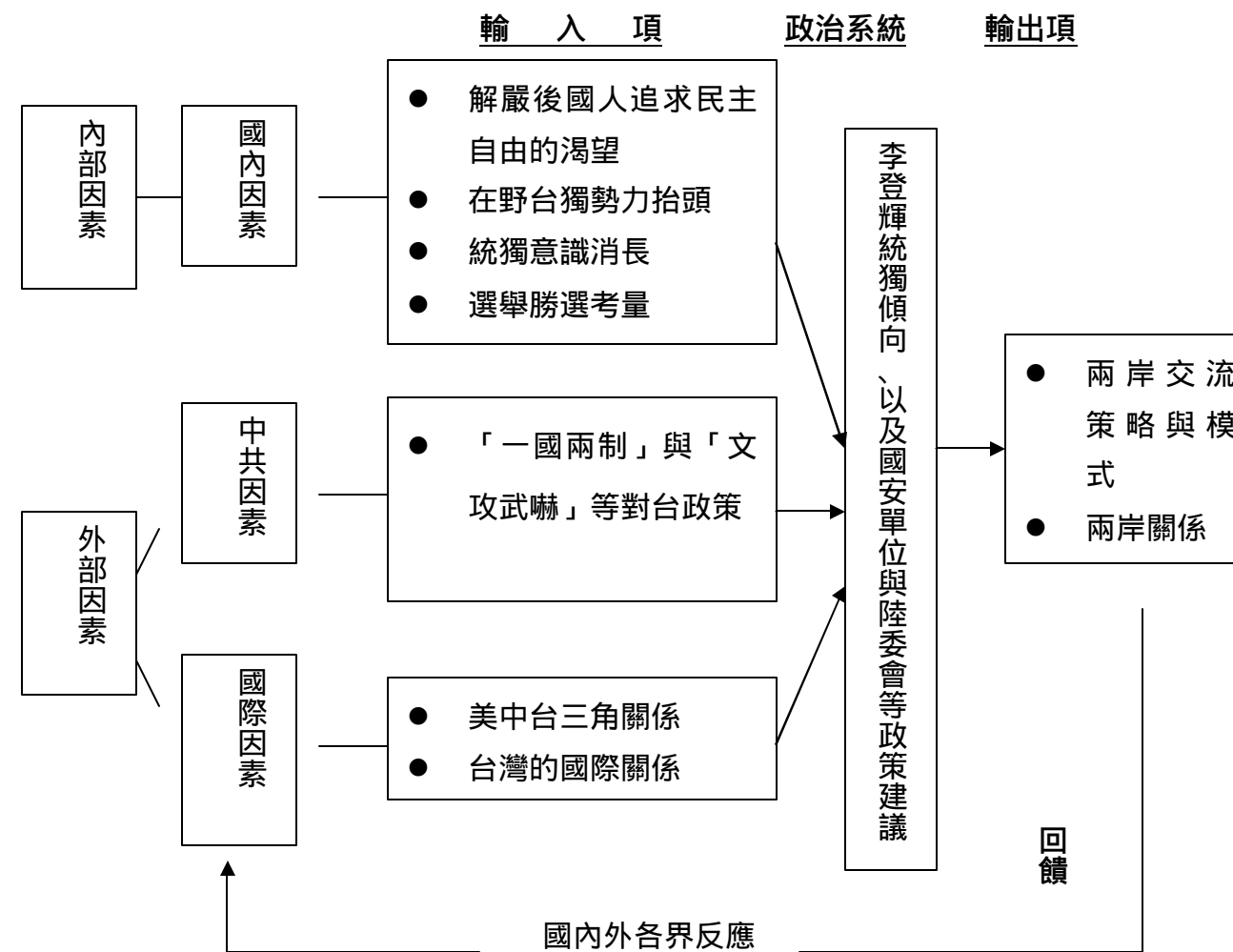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有二：一為深度訪談所得之訪談內容資料，亦即本文之初級資料；其次為政府、官方公開資料、期刊報導，以及學者相關學術研究等，以期達到公正、客觀與詳實的論述。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研究將從國內因素、中共因素與國際因素等變項建立研究關係架構，其架構如下圖二所示：

⁹Elliot G. Mishler,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圖二：本研究概念性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海峽兩岸國家級政策文件取得不易：國家政策的相關資料，需由官僚體系中取得資料，還原真相，但海峽兩岸官員往往均以「機密」為由而拒絕提供¹⁰。因此本文僅就官方公開資料、首長相關

¹⁰ 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1986年），326頁。

談話、期刊報導為主，輔之以學者相關學術研究，以期達到客觀詳實的論述。

二、訪談當時大陸政策決策者、前國家領袖（李登輝）恐不易達成：

（一）李登輝雖已於 2000 年卸任，但仍享有極高之社會地位；且因受中華文化影響，國人對國家元首，不論是帝王或總統，仍倍加禮遇、尊重與保護；同時要一位制訂出重大爭議政策的決策者、前國家元首接受訪談，有其窒礙難行之處。

（二）當時代表與大陸會談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已於 94 年初因年老體衰，不幸撒手西歸，將不利於還原當時兩岸會談過程的真相，以及彼此談判的堅持與讓步內容。

三、受筆者自身過去學習領域侷限，本研究面向僅限於政治因素，並未探討如兩岸經濟社會交流等因素。

第五節 文獻探討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王家英的《李登輝出任以來的大陸政策及其困境》¹¹提及，台灣民主化至少牽涉到四個廣闊互動的層面，包括：一、政治反對勢力的壯大及對政治民主化訴求的提升；二、執政（國民）黨內部部分菁英漸漸產生對政治改革的意向及決心；三、民間社會多元化後對國民黨一元統治的權威體制產生挑戰與求變的心態；四、八十年代世界民主浪潮的影響與國際民主社會的壓力。

王家英認為李登輝為自己定下兩大歷史任務，包括：（一）儘速推動兩岸關係的正常化並以之為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二）加速完成台灣內部的政治改革以強化台灣在兩岸民主統一的關鍵作用。因此李登輝希望利用台灣經濟與民主的優勢，來影響兩岸關係，促進大陸民主化，最終促使中共接受他所提出的兩岸統一模式。但北京堅持的是「中共是中央、台灣是地方」的「一國兩制」統一模式。對於李登

¹¹ 王家英，李登輝出任以來的大陸政策及其困境，《當代月刊》，第四十四卷，1994 年 11 月 15 日出版，42 頁-45 頁。

輝所提兩岸對等承認的民主統一不僅沒興趣，更視之為是李登輝帶領台灣走向獨立的藉口。因此使得李登輝的大陸政策遲遲未能有所突破，招致民間及政治反對勢力的質疑與批判，不僅使得台灣的民意開始向台獨方向傾斜，也迫使李登輝大陸政策的主導性與靈活性日漸降低。

張亞中的《兩岸主權論》¹²，對於兩岸主權爭議做出許多不同角度的分析，認為看似單純由「國共鬥爭」所造成的兩岸分裂，其背後其實卻隱含其他國際強權介入的因素。亦即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不但密不可分，更是互為因果，隨時牽動台海情勢與亞太和平。正如美國名義上協助台灣捍衛民主，但實則為了其自身國家安全與國際戰略考量，是故讓「共產的中國」與「民主的台灣」隔著台灣海峽相眺望。其實也就說明兩岸主權之爭，實際上已經成為國際強權利益的棋子。尤其 1999 年李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更可顯見背後的國際現實。海峽兩岸不僅不應同室操戈，更應捐棄成見，共謀兩岸雙贏的未來。這和包宗和與明居正提出的「戰略三角理論」和「國際體系理論」概念不謀而合。

楊力宇在《李登輝對大陸的重大宣示兩岸關係的展望》¹³一文認為，當時在李登輝總統依法宣布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公布《國家統一綱領》、行政院設立「大陸委員會」，以及成立「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後，兩岸政治關係日後重大突破取決於中共在國際上如何對台定位。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統一之前的過渡階段台北是否有權在非政治的國際組織中代表中國台北地區。如果大陸拒絕承認此一現實，兩岸的僵局仍將繼續存在。

大陸學者周世礪所著的《李登輝執政後“大陸政策”的調整》¹⁴則認為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是台灣內部政治環境所需，但卻被用來作為要求中共改變現行制度和基本國策的一個條件。而李登輝宣稱「將有條件的願意以“對等地位”，建立雙方溝通管道」，「兩

¹²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 3 月）。

¹³ 楊力宇，李登輝對大陸政策的重大宣示：兩岸關係的展望，《動向雜誌》，第六十九期，1991 年 5 月（64 頁-65 頁）。

¹⁴ 周世礪，李登輝執政後“大陸政策”的調整，《台灣研究集刊》，第二、三期，1990 年，85 頁-91 頁。

岸統一的先決條件是大陸實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制度」等說法，實際上為兩岸交流與統一設立障礙，不僅使得「對話管道」變成「喊話管道」，同時這樣的說法讓對岸認為是要大陸放棄「四個堅持」，也就是要以「台灣經驗，統一大陸」，根本無法接受。

李雪巖在《李登輝洩漏天機與兩岸關係條例》¹⁵文中，認為李登輝早在 1992 年 7 月 8 日接見民進黨主席許信良等人時的談話，就已經洩漏天機的告訴民進黨：「我（李登輝）和你們（民進黨）的目標（無意走向統一）是一致的，但我的手法比你們高明多了。」因為李登輝告訴許信良中華民國已經是存在已久的國家，他（李登輝）無意走向統一，目標和民進黨一樣，同時也邀民進黨支持其對黨政改革的未竟事功，亦即清除台灣的大陸人勢力。

至於淡江大學研究生陳鵬光的《李登輝時期大陸政策之研究》¹⁶，針對李登輝主政十二年期間的兩岸情勢，來探討當時的大陸政策，並做歷史性的回顧。同時並深入瞭解李登輝總統所採行之兩岸交流與談判策略，對兩岸關係之發展及其效應。

該論文將李登輝時期的兩岸關係之發展分為「初任總統到結束動員戡亂」、「辜汪會談到司馬遼太郎對話風波」、「康乃爾之行與飛彈危機」，以及「『七塊論』與『特殊國語國關係』之爭議」等四大時期，文中並詳實記載當時事件的經過，以及國內各界與國際主要國家的反應，進而論述到美中台關係因為李登輝調整大陸政策而隨之改變，但對於李登輝為何從「統」轉為「獨」？其造成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因素為何？卻隻字未提。是該文最大缺失，同時也使筆者萌生探討「李登輝主政時期大陸政策演變之研究」的動機。

¹⁵ 李雪巖，〈李登輝洩漏天機與兩岸關係條例〉，《鏡報月刊》，第一八二期，1992 年 9 月，66 頁-69 頁。

¹⁶ 陳鵬光，〈李登輝時期大陸政策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文化教育組碩士論文》，2000 年。

第二章 李登輝權力不穩固時期的大陸政策（1988 繼任總統~1994 司馬遼太郎事件）

雖然歷史結構發展有其難以逆轉的趨向，但單一個體與事件的變化，往往會對歷史結構的發展帶來意想不到的衝擊。李登輝在其推動政策的過程中，所引發台灣內部政治與兩岸關係的結構變化，恐怕是李登輝本人也無法預計，甚至是朝其所不願見到的方向前進。

台灣經過多年的勵精圖治，培育出旺盛的經濟實力；旺盛的經濟實力也孕育出多元的社會力；多元的社會力再催化出澎湃的政治力。這三股力量匯集在一起，對內要求民主化與自由化，對外則要求重返國際社會與發展大陸關係。

當 1987 年 11 月 2 日蔣經國宣布開放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的歷史性一刻到來，不僅使兩岸關係在對峙四十年後出現一道曙光，也擴大兩岸多元的文化、經濟與政治等層面的交流¹⁷，更為兩岸關係開啟新的序幕。至此，「民主化」、「務實外交」與「兩岸關係」開始密不可分。

1986 年 9 月，民進黨成立，同年 10 月解除「黨禁」；1987 年「戒嚴令」解除；1988 年「報禁」解除，威權主義在遭挑戰後逐步出現崩解的現象，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改革」和「由下而上的民主化壓力」¹⁸。台灣民主政治中的「本土化」與「和平民主化」，主要是由黨外勢力催生，蔣經國宣布解嚴則是民主的催化劑，不僅為台灣民主化的方向定調，也為繼任得李登輝排除掉戒嚴體制所產生的重大政治障礙；而李登輝則是順勢被捲進這的民主化的潮流中，卻享有寬廣的政治揮灑自主空間。

1988 年 1 月 13 日下午下午 1 時 55 分，蔣經國在國人錯愕與驚訝中因心臟衰竭逝世。

蔣經國病逝後三小時，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立即舉行緊急中央常

¹⁷ 陳德昇，《兩岸政經互動》，（台北：永業出版社，1994），183 頁。

¹⁸ 井尔秀憲著，邱榮金等譯，《台灣經驗與後冷戰的亞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5），10 頁。

會。會中宣讀蔣經國遺囑，並決定：(一)全體黨員敬謹恪遵蔣經國總統遺囑。(二)由具有副總統身份的中常委李登輝繼任總統職務。(三)立刻展開有關治喪事宜。當天晚上，李登輝便依據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在司法院長林洋港的監誓下，宣誓繼任總統，展開李登輝十二年總統的生涯。並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於國民黨十三全會上正式當選國民黨主席。

李登輝甫繼任總統，其所主持與主導之政務仍堅持中國國民黨的「一個中國」政策，如：

- 一、 1990 年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為政府規劃大陸政策。
- 二、 1991 年 2 月，「國統會」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明確規劃中華民國政府處理兩岸關係的近程、中程及長程政策。
- 三、 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宣布中國共產黨不再是一個叛亂集團，中共亦不再是個非法政府。過去「漢賊不兩立」、「反共復國」的兩岸政策，從此正式成為歷史¹⁹。
- 四、 相繼成立「行政院大陸事務委員會」，以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以民間團體名義協助政府處理相關大陸事務等。
- 五、 1992 年國統會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²⁰。
- 六、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李登輝曾說：「從歷史文化來看，在台灣的台灣人或外省人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我們不能切斷與中華民族的關係，也不能切斷和中國文化的關係。」
- 七、 1993 年李登輝接受美國 CNN 電台訪問時表示：「我們希望

¹⁹ 王家英，《台灣近年外交政策的趨向》（香港：香港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8 年 5 月），34 頁。

²⁰ 1992 年 8 月 1 日，國統會第八次會議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件，說明：「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參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china.htm>

透過交流的活動，使大陸當局務實的認識、尊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历史與現實。我們期盼，兩岸的政經差距能逐步接近，以達到中國統一的目標。」

八、 1993 年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雙方並共同簽署四項協定，不僅有助保障兩岸人民權益、穩定兩岸關係，更建立兩會（海基會、海協會）制度化會談與聯繫交流方式。

當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言人馬英九表示：「海峽兩岸現階段不可能開放直接通商、通郵、通航，以及雙方高層官員互訪，國家統一綱領仍是現階段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²¹」「國統綱領經國統會通過，及行政院會通過後，已經成為大陸政策的指導原則。」

然而在此同時，台灣內部面臨一個非常大的轉變時期。國內出現對以往既成秩序的挑戰，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例如勞工運動、自力救濟、環保抗爭、農民街頭運動，以及政治抗爭等如火如荼的進行中。而台獨意識的抬頭等，促使民進黨將「台獨條款」正式納入其黨綱，鼓吹制訂「新憲法」，以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其目標。

另一方面，由於台灣內部社會來自民進黨及其支持者的壓力與日俱增，要求重返聯合國的聲浪日漸擴大，李登輝也著手努力尋求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當前分裂的事實，並以「國家分裂模式」處理台灣問題，藉此向北京施壓，以期能在平等、民主的基礎上，與北京就兩岸問題展開會談。同時更呼籲中共以「兩德」與「兩韓」的模式為借鏡，來思考兩岸關係的未來與我國重返聯合國的議題。在此同時，李登輝更積極推動所謂「度假外交」，企圖開創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因而最後終於在 1994 年 3 月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話中，首次出現「以往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部是外來政權」「即使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中共講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是很奇怪的夢」等語。此等轉變不僅是本章要討論的主要內容，也是以「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對話」最為分界的主因。

²¹ 王震邦，（台北：聯合報，1991 年 4 月 30 日），第三版。

第一節 國內政治因素

一、 外交困境與省籍情結使本省籍菁英脫穎而出機會大增

多年來台灣一直面對著兩個非常難以解決的問題，一是來自外部的「中共問題」(統獨問題)，另一則是內部的「省籍情結」問題。前者使台灣不得不花費龐大的軍事預算來鞏固國防，以防衛隨時可能發生的兩岸軍事戰爭；後者則成為台灣內部社會不穩定的一個要素，更是台灣獨立運動的種子。²²

這兩個棘手的問題已經構成台灣內部發展的重大阻力，但在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院長、掌握決策權力之後，大量任用本省優秀人才，例如李登輝、林洋港、謝東閔、高玉樹、張豐緒等人，以融合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情感，使得在野黨不得不改變對所謂「外來政權」的觀念，也因此出現「台灣化」、「本土化」的名詞。此舉對於改善台灣內部省籍情結問題有了顯著的幫助。

尤其在台灣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中美斷交等外交困境接踵而至，使台灣在國際社會孤立無援，內部社會因而產生危機感，必須要團結一致，自立自強，才能走出困境，而此一外交困境也正好促使台灣內部砲口一致對外，使得省籍對立問題得以暫時降溫。

綜觀世界各國與歷史先例，政治改革的推行通常是在群眾的龐大壓力之下進行，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方式，且往往夾雜著武裝革命或暴動等方式；但台灣當時仍處於強人政治的局面，假使蔣經國無意推動政治改革，化解省籍情結，不僅台灣的民主自由政治型態恐無法成形，更難保歷史上不會出現另一個如「228事件」一般的省籍對立意外。

二、 蔣經國選李登輝當接班人，已有「人選本土化」路線考量

「總統」是國家大位，不是光以智就可取得的。它不僅是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相結的時勢產物，更是海峽兩岸關係現實需求與歷史發展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

蔣經國主政後的台灣，經濟快速起飛，使台灣朝已開發國家之林

²² 張茂森，《兩千萬人的抉擇》，(台中：台灣日報社，1992年)，4頁。

邁進。至 1987 年止，台灣人民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已達五千萬美元，平均國民所得也達到四千五百萬美元，貿易總額八百八十億美元，而外匯存底則高達七百五十億美元，造就了享譽世界的「台灣經驗」。

但是最能顯示出蔣經國偉大政治家智慧光輝的，則是其晚年所推行的政治變法：「本土化路線人選政策」²³。蔣經國曾說：「只有專制與獨裁的國家才有所謂總統後繼問題，我們的立國基礎是以憲法為依據，因此下任總統的產生仍由各位（國大代表）代表全國國民選出，也許有人會問經國的家族會不會有人候選，我的回答是，不會，也不可能。」²⁴不僅如此，業已臥病在床、行動不便的蔣經國，更邁出重要的一步：允許大陸探親、取消戒嚴等，不僅為兩岸互動建立新關係，更為李登輝的「寧靜革命」開闢通道。

蔣經國曾是威權統治的繼承者和終結者，而任何一位威權統治者是不會無緣無故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唯有社會潮流與民心向背的衝擊下，統治者做出智慧的抉擇，才能將「本土化路線人選」最為接班人的考量。

（一）來自黨外人士對「外來政權」的壓力

1984 年《蔣經國傳》作者江南在美國遭暗殺，震撼太平洋兩岸，使美國對台灣的「特務統治」大肆撻伐，美國政界與媒體對台灣特務與黑道聯手在美逞凶，大感意外與憤怒，台灣形象受到前所未見的重挫。當時為促進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美國甘乃迪和貝爾等議員甚至組成「台灣民主化委員會」。另一方面則是台灣本土菁英在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後政治抗爭加劇，不僅在 1983 年的立委選舉中提出「民主、自決、救台灣」的口號，也在 1985 年地方選舉中，獲得 30%選民的支持，在台北市更贏得近四成的選票，不僅如此，黨外人士更利用逐步整合之隊伍，以及逐漸升高之得票率，隨之在 1986 年成立「民主進步黨」。

值此風雨飄搖的情勢，一個所謂「從大陸戰敗撤退至台」的「外來政權」，在未來民主選舉中，恐將難保其政權。即使蔣經國曾喊出「我也是台灣人」的情感表白，但無論如何，多數的台灣「本土人民」，

²³ 楊中美，《李登輝 VS. 江澤民》，（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0 年），195 頁。

²⁴ 蔣經國，1985 年 12 月 25 日於國民大會演說。

將無法在忍受繼蔣經國之後，還有所謂「外省人」來擔任領導統治者。

正因如此，蔣經國或許深知由「台籍國民黨菁英接班」是唯一的選擇，更是大勢所趨，他曾在晚年明確表明：「政權正在移轉中，本省人士不必急。」這也是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雖擁有如日中天的聲望，以及完整的行政歷練與資歷，蔣經國卻完全不為所動的原因之一。因此自謝東閔以台籍人士出任副總統之職之後，「以本省人接班已成為既定方向」，而李登輝能被蔣經國挑選為副總統、而後總統，乃是國民黨人選「本土化路線」考量。

（二）欣賞李登輝「不僅非強勢、無野心，更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權威獨裁的領導人，選擇接班人的重要考量之一，就是其是否會依照自己的路線、貫徹自己的理念，是否有搶班奪權的野心。

蔣家父子都是強烈民族主義者，更是一個中國政策的堅持者。蔣經國可以說「我也是台灣人」，但是必須在認同中華民族的大前提之下，才能認同台灣。蔣經國可以取消戒嚴，開放黨禁、報禁，但卻不允許分裂國土、搞台獨。

1983 年李登輝省長向第七屆省議會提出施政報告並接受質詢時，對於「台灣獨立」問題表示，「中國歷史沒有拋棄台灣，台灣不能脫離中國。」表達鮮明的一個中國立場，這距離 1984 年李登輝被蔣經國正式提名為副總統僅隔了三個月。

同時，蔣經國在決定第七屆副總統人選時，曾召集黃少谷等核心幕僚舉行會議，提出四條件說：一、具有博士學位高學歷；二、具有外國語文能力；三、有宗教信仰，做事不會走樣；四、無子嗣，不會為子孫謀私²⁵。李登輝此時經過行政院內政部長六年的觀察與訓練，以及台北市長、省主席各三年的表現，無怪乎蔣經國會選擇李登輝為其接班人。

在蔣經國去世到國民黨召開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正式選舉李登輝成為黨主席之前，國民黨內部雖也曾出現不同的聲音，希望暫緩代理黨主席的人事案，但最後仍由國民黨內部改革派獲勝，順利讓李登輝成為國民黨的代理主席，進而正式選舉成為黨主席。此次風波正反

²⁵ 王作榮，《壯志未酬》，（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9 年），113 頁。

映出兩個明顯趨勢²⁶：

- 1、 國民黨內部元老保守勢力已經呈現退潮現象，主導權已流向面對現實而力求革新的第二代幹部。
- 2、 本省籍與外省籍各佔一半的中常委，全體支持李登輝，顯示黨內的抗爭並非在於本省對外省，而是改革對保守。

上述情形對李登輝而言，等於是打了一劑強心針，不僅使李登輝對於在台灣推動改革產生莫大的信心，也間接顯示出不僅是台灣住民、本省籍對於台灣的改革有深切的期待，同時也證明國民黨內部也有強烈的意願，也正式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李登輝才能放手一搏，在政治、外交、兩岸等重大議題，逐漸緊握主導權，展現出自我領導風格。

三、 本土意識高漲，銳不可擋

當年的蔣經國在台灣代表的是一種權威性的強人政治，不論要推行政府政策，或是進行改革，都不會出現太多阻力；但是李登輝繼任的是「憲法所規定的總統任期」，而無法繼承蔣經國的權威。因此不論李登輝要完成蔣經國的遺志，還是要有新的作為，都必須獲得黨內的支持，以及台灣住民的信賴。

戒嚴令解除之後，台灣內部社會出現一連串「脫序」現象，治安的急速惡化、股票市場的不穩定，以及不動產的暴漲等因素，造成民眾的不滿與恐慌，進而反映在李登輝就職後 也是戒嚴後的首次選舉

1989 年底的選舉結果，以強調「台灣國際主權獨立」與「人民有主張台灣有獨立的自由」為號召的民進黨，立委席次從 12 席增加到 21 席，21 個縣市長選舉中也贏得 6 席，這樣的結果對國民黨而言當然是很嚴重的衝擊。

其中國民黨少壯改革派為了與民進黨抗衡所成立的「新國民黨連線」，在此次的選舉中，也出現八位候選人全數當選的佳績，等於證明民眾對於政治改革的要求十分強烈。

當時甫成立的民進黨，眼看自己所提出的「台灣本土意識」主張

²⁶ 同註 3，49 頁。

逐漸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與支持，因而乘勝追擊，逐年提出如表一的政治改革主張與活動，藉以打擊國民黨長年的威權統治，並喚醒本土意識：

表 1：1989~1994 民進黨重要大事摘要表

年份	民進黨重要大事摘要
1989	縣市長選舉，得票率 38.3%，取得 6 席；立委選舉，得票率 28.2%，取得 21 席。 以「總統民選」、「聲援許信良」為訴求，發動大規模遊行。
1990	赴總統府遞交「解散國大」抗議書，遭警方強制驅離，因而揭開「野百合三月學運」序幕。後李登輝不僅接見靜坐學生，更允諾召開國是會議。 舉辦「全民反軍人組閣」遊行，抗議提名郝柏村組閣。 公布「民主大憲章草案」，作為國事會議藍本。 「國是會議」正式揭幕，達成總統、省長直接民選之共識。
1991	「人民制憲會議」通過「台灣憲法草案」。 民進黨全代會通過「公民投票方式建立台灣共和國」黨綱修正案。 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民進黨得票率 22.78%，當選 66 席。
1992	為訴求「總統直選」，發動「419 大遊行」與靜坐。 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得票率 33.05%，當選 55 席。
1993	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得票 41.2%，贏得台北縣、宜蘭縣、新竹縣、台南縣、高雄縣與澎湖縣六縣市。
1994	發動「發放敬老津貼，反對利益輸送」大遊行。 民進黨執政六縣市開始發放老人津貼。

民進黨表達反對核四興建之立場

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

資料來源：民主進步黨網站 (<http://www.dpp.org.tw/>), 2007/4/25

民進黨自 1988 年至 1994 年一連串街頭運動、政治訴求與改革理念等，著實打動人民的心，順利喚醒沈睡已久的台灣本土民族意識，加以選舉利益考量與政治巧妙操作，省籍情結逐漸成為影響台灣內部團結最大的因素，這不僅使台灣社會出現對立與仇視，百姓也開始質疑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甚至影響台灣的經濟發展，動搖過去「亞洲四小龍」的地位。

本土意識的高漲，使李登輝不得不開始重視這股勢力，並且藉由在某些議題上的合作來表達善意，因為此時李登輝必須兼顧國民黨內部的挑戰，以及外部民進黨的崛起，為避免陷入「腹背受敵」的窘境，必須「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先解決國民黨黨內同志的問題，才是此階段李登輝首要任務。

四、剷除黨內異己，成為實權總統，開啟「本土化」之門

李登輝繼任總統時曾明確表示將負責主導外交、軍事與大陸政策，但仍受到蔣經國的重臣所牽制，尤其在李煥、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任內，府院黨關係更是暗潮洶湧，因此對於施政理念、民主改革與台灣主體認同等問題的理念差異，便自然的被歸結為是「省籍情結」所導致。

（一）順利化解黨內推選連選總統的危機

蔣經國逝世後，由於黨政雙方面的配合不如過去，重以 1989 年立委選舉民進黨席次大有斬獲，故俞國華於次年辭去行政院長一職，此舉等於讓李登輝「穩定壓倒一切」的佈局破功，也讓李登輝明顯感受到黨內派系鬥爭的問題，已經可能危及李登輝的領導地位。

1990 年國民大會選舉第八屆總統、副總統之際，同樣是當時所謂「本土代表」的林洋港，以及原有意爭取擔任李登輝副手的蔣緯國，在黨內其他重要幹部的遊說與利用之下，計畫與李登輝、李元簇一較高下，因而登記參選黨內提名。

然而李登輝以推動民主政治改革為號召，且林、蔣陣營內部原本就各懷鬼胎，意見紛歧，故在李登輝策動黨內大老、本省籍菁英幹部，以及林蔣好友遊說林蔣之下，林洋港終於在選前發表退選聲明²⁷。至此，李登輝不僅成功的化解一次黨內派系挑戰其權威的危機，順利成為國民黨推動民主化與本土化改革唯一的本省籍領袖，更強化李登輝加速台灣政治改革的堅定決心。

（二）一石二鳥，成功剷除異己

李登輝對於李煥的戒心，源自於李煥在黨內的輩份與派系，且在李登輝挑選李元簇擔任副手後，李煥竟私下轉鼓勵與支持「林蔣」。故在一次又一次的黨內外鬥爭，以及黨外「野百合三月學運」後，李登輝便釋放出調整行政院長人事的訊息，並以「當前社會動盪、法治不彰，政府公權力威信蕩然無存，治安惡化」等理由，透露希望由當時的國防部長郝柏村來接任，以改善治安，並重建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如此「出將入相」的誘惑讓郝柏村答應接受行政院長的職務，但卻因此掉入李登輝一舉數得的佈局中：

- 1、繼續沿用外省人，以安撫李煥原有追隨者：李煥與郝柏村同為外省人，因此郝柏村的人事案不僅在立院能順利過關，還可讓李煥的勢力無法反彈。
- 2、坐收「杯酒釋兵權」之效：郝柏村從參謀總長到國防部長，再從國防部長到行政院長，讓當時這位軍事強人在不知不覺中與軍界漸行漸遠，順利且和平的將軍權上交三軍統帥李登輝。
- 3、借「立委之刀」，幫李登輝剷除心中顧忌：具有民意基礎的立法委員們，必然無法接受郝柏村的強勢軍人個性與威權作風，故不僅可收「過渡治安內閣」之效，又可「藉立法委員之刀」，來剷除李登輝心中的疑慮，以真正掌握軍權。

²⁷ 同註 7，213 頁。

臺灣島內政局變化使得李登輝逐步朝分裂傾向進一步發展：

- 1、1988 年推動務實外交，爭取台灣的「國際生存權」，並公開表示所謂雙重承認問題在北京。李登輝並於 1989 年首度承認中華民國的實際統治未及於中國大陸地區。
- 2、1989 年李登輝訪問新加坡，被新國稱之為「從台灣來的總統」，開啟元首出訪無邦交國的「度假外交」模式²⁸。
- 3、1991 年的「國統綱領」，特別強調「對等承認」是近程階段的一向最重要目標，也是由近程過渡到中程階段的首要條件。
- 4、繼 1991 年底所謂「形式修憲」後，於 1992 年 5 月完成了標誌著“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實質修憲」²⁹。
- 5、1992 年年底，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獲得近 1 / 3 的席位。
- 6、「刑法」和「國家安全法」的修訂，放寬了對境外「台獨分子」的入境限制，致使大批「台獨流亡分子」將活動中心向島內轉移。如「台獨聯盟總部臺灣本部」在台召開盟員大會，民進黨公開鼓吹臺灣主權獨立。在這種背景下，李登輝開始極力鼓吹務實外交，力圖拓寬國際生存空間，並爭取盡速重返聯合國。
- 7、1993 年 9 月，台灣以「一個中國」和「兩個政治實體」為主訴求，試圖參與聯合國，但終究遭到中共的阻擾與否決。
- 8、1994 年在接見「世台會成員」，以及接見「美國新聞協會訪華團」等場合，都出現「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說法。
- 9、1994 年的元旦賀詞中，李登輝說到「因為中共當局不願

²⁸ 林正義，《中美關係專題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8 年 12 月），102 頁。

²⁹ 1992 年 5 月 27 日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二屆國大第一次臨時會第二次修憲增訂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八條：調整國民大會職權；明訂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原則；司法院大法官增設憲法法庭；調整考試院職權；重新定位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明訂直轄市市長及台灣省省長改由人民直接選舉；保障殘障者與山胞權益。

面對四十餘年來分裂分治的現實，兩岸關係難有良性突破。」³⁰我們誠懇地呼籲中共當局正視兩岸人民的福祉，放棄敵意與對立，珍惜兩岸手足情分，在新的一年里，努力培養相互間的瞭解與信任。」並宣示對外關係的兩大政策：「南進政策」與「參與聯合國」。

此新春賀詞中，李登輝宣示台灣對外關係的兩大政策：「南進政策」與「參與聯合國」，其目的可說是企圖將「兩岸分裂與分治」固定化與永久化，落實江丙坤在西雅圖高峰會向國際宣布的「階段性兩個中國」的構想³¹。至此，李登輝已經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在國際間和兩岸間採取不同表達方式：在國際間明白提出兩個主權國家，不再強調「一個中國」；在兩岸接觸談判時，則採「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政治實體」。正如陸委會所言：「一個統一、均富、自由的中國，是政府的最終目標。但在此之前，為打開國際空間，在國際間強調兩岸是對等、分治、各自享有充分自主權的獨立國家。³²」換言之，台灣的大陸政策已經從「一個中國」，經由「一個中國原則下的政治實體」，過渡到「兩個中國」³³，雖然為穩住中共反彈而刻意保留「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的帽子，創造「有過渡性模糊」的空間，但李登輝的真正目的，是設法在國際間凸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進而朝「兩國論」邁進。

此外，另一明顯的例子則是 1994 年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在《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中已經正式揭示台北將不再與中共在國際社會上爭奪「中國」代表權，明確將兩岸定位為「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並期望以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為重，在「一個中國、兩岸分治」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兩岸關係，創造兩岸共存共榮的環境。雖然外交角力中仍常為「中國代表權」而明爭暗鬥，但這已明顯表示台灣為了爭取國際空間，突破外交困境，已經不再排斥「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任何可能性³⁴。

³⁰ 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2006 年 6 月參考。

³¹ 1993 年 11 月 20 日，江丙坤在西雅圖參加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時召開記者會表示：「中國是地理、歷史、文化上的中性名詞，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份，兩岸是互不隸屬的兩個主權國家。在條件未成熟前，台灣採取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

³² 陸委會，《大陸政策答客問》，(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8 年)，1 頁。

³³ 李雪巖，李登輝的階段性兩個中國論，《鏡報月刊》，第 199 期，1994 年 2 月。

³⁴ 「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原文如下：「民國八十年四月三十日，李總統登輝先生宣告動員戡亂

最後，李登輝在同年 3 月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一次長談中，發表了許多前所未見的觀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包括：

- 1、 將國民黨說成是「外來政權」：「國民黨也是外來權，只不過是來治理台灣人的政黨罷了。³⁵」李登輝認為「國民黨不只是外來政權，還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原封不動地帶入台灣。這個照理應稱之為蔣王朝的國民黨政權，將台灣及台灣人看成了王朝私人的財產而支配著。」
- 2、 認為「『中國』這個詞是含糊不清的」。
- 3、 反覆強調「台灣人的悲哀」：李登輝認為，「所謂的悲哀就是，台灣原は無主之島，擁有四百年以上歷史的台灣的人民，既沒有自己的政府，都被人管，不僅日本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同樣是外來政權，連要為國盡力也不可。」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強調的一種場所的概念，也就是你出生在何地，那個地方的過去與所處的位置，就會給你帶來與生俱來的悲哀。
- 4、 否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進而以「摩西」自居，要帶領台灣人民「出埃及」。

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反映了他內心深處的想法。他選擇司馬遼太郎作為談話對象，絕不是偶然的；同時，想當然爾，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話，北京立刻解讀為「最能暴露李登輝內心深層想法」的憑據，因此將李登輝定位為「明統暗獨」之代表。

事實上，由於兩岸長期缺乏互信的基礎，加上中共看待台灣從來沒有所謂「對等」、「民主」等觀念，李登輝的兩岸政策當然會泥牛入海。正因為如此，台灣內部民間及政治反對勢力的質疑與批評日漸擴大，整體民意因而傾向「台獨」，再加上李登輝積極推動的民主改革

時期將於五月一日零時終止，……，這個宣告在兩岸關係上有兩個重大涵義：第一，它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正式且率先放棄以武力方式追求國家統一；第二，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在國際上與中共競爭『中國代表權』。中華民國政府認為『中國只有一個』，但『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一部份』、『中共不等於中國』，在中國尚未達成最後統一之前，兩者既處於分治局面，理應各自有平行參與國際社會權力。」參照：<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mlp2-3.htm>

³⁵ 《朝日週刊》，(1994 年 5 月 6 日 13 日期刊) 版一。

卻諷刺的使國民黨陷入所謂「黑金政治」的漩渦，更迫使李登輝必須利用兩岸政策來轉移外界對國民黨「黑金」的指謫與批評。於是國民黨在李登輝主導之下，不斷的將新黨推向「急統」、將民進黨推向「急獨」，而刻意將國民黨塑造、定位為「不統不獨」，企圖藉此減少台灣人對於「急統」或「急獨」所產生的現實恐懼，一方面期使在國際間能與中共分庭抗禮，另一方面希望藉此滿足台灣人長期在兩岸關係中處於劣勢的族群尊嚴，最後藉由兩岸問題的操作，來轉移國人對於國民黨與「黑金政治」密切關係的關心與批評。

第二節 美國因素

向來國際政治都符合「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每個國家追求自身的利益」等原則。在國際間固然有些國家靠依附在大國而生存的，但一個國家依賴遙遠的另一個國家，而與鄰近的國家長期為敵，卻是罕見的³⁶。在全球化的今日雖然已經有「地球村」、「天涯若比鄰」等特性，但是地緣政治與經濟仍是左右任何一個國家命運的重要因素。台灣如果要長期依賴遙遠的美國，而與近在咫尺的大陸對抗，實有違地緣政治的戰略邏輯思考。

一、美蘇關係緩和，台海問題成為亞太防線關鍵

1980 年代中期，全球的經濟合作與國際的安全合作，已逐漸取代過去東西兩大集團在政治、經濟、軍事與意識型態等議題上的對抗，使過去不論是東西對抗，或是南北對峙，都漸漸的消弭於新的區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衝突中。

在亞太區域方面，不僅後冷戰時期的經濟合作與安全合作仍尚未體現，反而出現「區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矛盾現象³⁷。而過去因為冷戰時期而被抑制的潛在衝突與危機，也因為冷戰體系的逐漸瓦解與退場，都陸續浮現，其中當然包括大陸與台灣在內。

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正值 1980 年代末期，全球仍處於兩大體系對立的國際體系時代，但彼此不論在軍事對抗或意識型態對立

³⁶ 張亞中，《全球化與兩岸統合》，（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29 頁。

³⁷ 蕭全政，《巨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5 頁。

等層面，均略趨式微，整體國際情勢已經從冷戰時期的「緊密兩極對立體系」(tight bipolar) 逐步演變成為「鬆弛的兩極對立體系」(loose bipolar)，再從「鬆弛的兩極對立體系」，繼續朝「多極體系」(multi-polar system) 過渡³⁸。

隨著美蘇兩強降低其軍事武力，以減緩雙方軍備競賽，使周邊次強國家不禁覬覦美蘇兩強軍事降溫後所可能釋出的區域與利益，反而增加軍事衝突的可能，產生另一種區域安全的威脅。同時更因為美蘇兩霸權對抗的日趨鬆弛，蘇聯更於 1991 年垮台瓦解。對美國而言，中共反而失去其在亞太地區聯合對抗蘇聯的重要性，雖然中共成為世界僅存的少數共產主義國家，但因為在「美蘇中」三邊關係中，由於美蘇對峙關係降溫，且中共經濟的快速崛起，使其國力逐漸增強，軍事武器在經濟支撐下當然快速增強，反而使中共成為繼蘇聯之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潛在與最大隱憂。也由於這樣的戰略考量與亞太安全威脅，台灣因而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防線中，有效制衡中國威脅的武器之一³⁹。這也使得兩岸問題躍上國際，讓台海安全問題成為國際各界關心與矚目的焦點。

也就是說，自九十年代以來，由於蘇聯的解體，以及東歐共產主義各國政府的垮台，二次大戰後延續四十多年的冷戰體制終於告終，兩極體系消失，在戰略賽局中美國儼然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霸主。而美方也正好想藉此機會，力圖主導「國際新秩序」的形成。因此對美國而言，「以中制蘇」的戰略已經完成其歷史性使命與任務⁴⁰，中共反而成為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幾個共產主義國家之一，而改革開放後國力日益強盛的中共，當然成為美國意識型態上的「頭號敵人」。因此台灣便成為美帝國主義牽制中共的「以台制中」戰略棋子之一。

二、美國加強對台關係，使台灣成為美國制衡中共的棋子

1989 年布希總統入主白宮，大陸正好發生「天安門事件」，嚴重打擊西方國家對中共在經濟改革開放下向民主政治和平轉移的樂觀想法。雖然美方立即宣布對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制裁，但仍反對「孤立」

³⁸ 張惠煌，《兩岸關係演變之研究（1978~1995）》，（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15 頁。

³⁹ 陳峰君，《冷戰後亞太國際關係》，（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362 頁。

⁴⁰ 林國炯等人，《戰雲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77 頁。

中國大陸。布希強調應以「持續保持交往」作為對大陸的政策依據，並支援中共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發展，企圖藉由中共經濟持續發展，來改變其政治現況。這樣的變化表面上或許有利於加強台灣與美國的實質關係，甚至提供台灣重返國際社會一個有利的環境與機會，但實際上卻僅是利用台灣的地理位置，來完成美國的戰略佈局。

1992 年布希總統批准向台灣出售 150 架 F16 戰鬥機，等於是違背「八一七公報」的約定與限制，並且於同年底，派聯邦貿易代表卡拉·希爾斯女士訪台⁴¹，不僅開啟兩年一度內閣成員訪台先例，更首次打破美台斷交十三年來，美方內閣級官員訪台的禁令。

1993 年柯林頓政府上台後面對的正好是蘇聯解體、冷戰體系結束的全新國際情勢，國際架構等同進入重整的重要階段⁴²，因此明確提出三個外交宗旨：持續國際由於穩定和充實國防、持續經濟繁榮，以及推廣民主化⁴³。並調整美國國家戰略與軍事部署，朝下列幾點發展：一、強調美國領導角色，重視軍事與外交的合作運作。二、預防國際間相抗衡的國家出現。三、現代化（數位化）軍事力的建構，是全球軍力部屬的重點。四、美國需要盟邦的支援，以發展全球戰略的部署。五、預防與嚇阻仍是戰略運用的手段。六、戰爭形式的多樣化，戰區衝突有可能出現，因此加速戰區飛彈防禦系統，是全世界軍事戰略的方向⁴⁴。

柯林頓對台政策則是表現出更多的善意，例如：

1993 年，參議院通過修正案，稱「台灣關係法」中對台軍售部分高於「八一七公報」中相關規定，等於是為美國大量出售尖端武器給台灣鋪路。

1994 年提升美國與台灣的實質關係：

⁴¹ 羅山愛，美國高官 6 年來首度訪台，《世界新聞報》，2007/05/09 參考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2201/2006/05/25/1905@1060663.htm>

⁴² Joseph S. Nye, Jr., “*What New World Orde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105.

⁴³ 王慶新，〈冷戰後美國與東南亞的安全關係及其在區域金融危機之際的變化〉，《亞洲評論》，春夏卷總第七期，1998 年，43 頁。

⁴⁴ 張明睿，《中共國防戰略發展——跨世紀軍事革命浪潮跟隨者》，（台北，洪葉出版社，1998 年 9 月初版），189 頁。

(1) 台灣駐美機構名稱，由「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辦事處」更名為「台北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

(2) 解凍雙方高層內閣官員互訪的禁令。

(3) 台北的「高層首長」可以「過境停留」美國，但不宜「訪問美國」。

(4) 美國同意支持台灣加入非國家性的國際組織，但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或其他「以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

(5) 美方對台軍售仍以「八一七公報」和「台灣關係法」為基本準則，提供台灣「足夠的防禦裝備」⁴⁵。

美國或許在整個亞太戰略佈局中，將台灣視為同一陣線。但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也僅能在「三公報一法」(即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簡稱三公報一法)所形成的框架下進行⁴⁶。簡言之，也就是「中共不武、台灣不獨、兩岸和平解決」。因此美國不僅對台灣有保護的承諾，也有「不獨」的約束，而對中共，也以「台灣不獨」的承諾，來換取「不武」的約束。

另一方面，美國為確保中共與美國的雙方關係能夠朝建設性方向發展，成為國際議題、共同利益等合作的成員或伙伴，以減少並預防衝突的發生，因而希望能夠進行各層面的交流與互動，促使中共軍事透明化，甚至影響中共軍事決策。也就是中共所謂美國對華採「軟圍堵」政策⁴⁷。簡言之，柯林頓對華政策是希望與中共保持接觸，企圖影響甚至控制中共的政經軍等層面發展，一旦「接觸政策」無法達到美方預設的目標，則轉為將中共視為敵人，做好做壞的準備與打算(bottom line)⁴⁸。

然而由於美國國內經濟情勢的轉變，柯林頓的執政重心由外交轉回內政，但中共天安門事件、人權問題、將飛彈技術轉移給巴基斯坦

⁴⁵ 同註 20，78-79 頁。

⁴⁶ 同註 13。

⁴⁷ 周煦，《冷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出版社，1999 年 2 月），54 頁。

⁴⁸ 李正文，《小布希政府對華政策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32 頁。

等使美中關係出現一連串的衝突與變化，再加上中共的經濟實力快速成長，使中共不僅對於美國「一國獨大」的霸權心態與作為極為抗拒，更希望能國際舞台上擁有更多的空間與發言權⁴⁹。這些變化與因素最後促使柯林頓在 1994 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時提出「擴大與交往」（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將貿易與人權、軍事等問題脫鉤，並且讓中共融入國際體系之中。

大陸「天安門事件」衝擊、東歐民主浪潮，以及蘇聯的解體，使布希總統上台後立即面對冷戰結束後的新局勢。1991 年爆發波灣戰爭，國際體系再次出現變化，美國體認到全球將近入「單極時刻」(the unipolar moment)，意即美國將成為全世紀唯一的超極強國，面對這樣的國際新局勢，必須調整期戰略佈局：一方面在國際社會繼續扮演領導這角色，並積極建立以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另一方面在軍事上則改採「兩個主要區域戰爭」⁵⁰的戰略⁵¹。

或許正如美國的期望，台灣正一步步成為「以台制中」的棋子而不自覺。而李登輝成為所謂「第一個台灣人的本省總統」後，更恃美國對台「表面」友好關係，不僅在他任內推動本土化與民主化，更積極推動「務實外交」，拓展國際空間，參與聯合國活動，因而於 1995 年成功訪美，隨後更逐步朝「兩國論」方向演進。

第三節 中共因素

李登輝任內努力尋求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當前分裂的事實，並以「國家分裂模式」來處理兩岸問題，藉此向北京施壓，以求能在平等、民主的基礎上，仿照兩德與兩韓的模式，與北京討論兩岸統一的問題。但卻忽略北京對兩岸關係與發展的堅持。

⁴⁹ James Mann，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台北：先覺出版社，1999 年 7 月），406 頁、429 頁。

⁵⁰ 甘乃迪政府時期，美國國力鼎盛，但面臨中蘇兩大共黨政權在歐亞對自由世界安全的威脅，必須採取「兩個半戰爭」，準備同時應付兩個全球性的戰爭及一個區域性的戰爭。到了尼克森時代，美國因越戰元氣大傷，故欲與中共示好，以牽制蘇聯，採所謂「一個半戰爭」，及準備應付蘇聯引發一場全球性戰爭及可能出現的區域性衝突。此所謂「兩個主要區域戰爭」，即指中共與中東兩個地區所可能必須面臨的戰爭。

⁵¹ 同註 19，38 頁。

八〇年末期，中共堅持的是「中共是中央、台灣是地方」的所謂「一國兩制」統一模式。對於李登輝所提「兩岸對等承認」、「民主統一」等改變兩岸關係與未來的方式不僅視若無睹，更將李登輝這些行為，視為是「帶領台灣走向獨立」的藉口。而李登輝所提「重返聯合國」、「度假外交」等爭取國際地位等行為，則更進一步加深中共對李登輝台獨意圖的疑慮。因此北京對台策略，則為了打擊與防範「台獨」，變得更加謹慎小心與僵化，對於任何台灣參與國際活動，均絞盡腦汁極力封殺。江澤民曾在 1990 年對於台灣「一國兩府」的說法提出反駁：「按照國際法，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政府代表行使主權，不可能存在兩個代表這個國家的對等政府。所謂『一國兩府』，實質是『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是走向分裂，不是邁向統一。」

一、「六四天安門事件」更加堅定中共「一國兩制」政策

江澤民自 1989 年五月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之職，但對台工作方面，除完全按「集體領導」決議外，仍由鄧小平的親信老臣楊尚昆把關，副總理吳學謙、外長錢其琛襄助。因此江澤民接班初期對台政策立場，基本上是沒有自主意願，也是公式化的⁵²。直至 1994 年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江澤民享有「中共黨內最後決定權」後，便成為中共第三代集體領導的真正核心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門事件，使台灣民眾更強烈渴望追求安定。國民黨大陸工作會在二中全會中，提出「現階段大陸政策，是以爭取大陸民心為重要任務，要求運用民間的力量，推廣台灣經驗，特別是聯合海外有志之士向大陸進行「四爭」（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與爭財富），「四反」（反專制、反特權、反貪污、反迫害）與「四開」（開放報禁、開放黨禁、開放民運、開放私有）。」「並以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平等與輿論開放為當前大陸政策的四大目標，最後以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總目標。」此說法立即引發中共不滿，認為是「企圖利用大陸的暫時困難，積極從事反共的和平顛覆活動⁵³」。同時更警告國民黨當局，「應珍惜兩岸近十年來得之不易的日趨緩和與改善的關係與良好氣氛，不要再製造和升高兩岸的敵對情緒⁵⁴。」

⁵² 李登輝 VS 江澤民，282-283 頁。

⁵³ 王玉玲，《由兩岸關係探討台灣的統獨問題：以博奕理論析之》（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114-115 頁。

⁵⁴ 《瞭望週刊》，第二十九期，1989 年 7 月 17 日出版。

1989 年 6 月 28 日，江澤民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出席由中共中央召開的所謂「黨外人士」座談會時，發表他就任以來第一次公開談話，強調願以「負責的聲明」保證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絕對不會改變，「一國兩制」的方針不變，對台灣、香港、澳門的方針不變⁵⁵。

二、交流初期互不信任，中共堅持「文攻武嚇」兩手策略

到了 12 月，江澤民更訂定出「解決台灣問題時間表」，表示「解決台灣問題，再不能無限期拖，拖得越久，負擔越重，現在看來，台灣當局絕不會心平氣和的坐下來談，兩手準備（一手搞和談、一手「武力解放」），一手也丟不得。應該在五年內，把這個包袱甩掉⁵⁶。」此一談話後來也成為中共對台灣的決策指導。而負責統戰工作和對台事務的中共官員立即於 1990 年提出「統一祖國」五年計畫，「1990 年至 1992 年，推動海峽兩岸的各種交流。1992 年至 1994 年，舉行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會談。統一應於 1995 年達成⁵⁷。」

1991 年 12 月，中共成立「海協會」作為我方「海基會」之對話窗口⁵⁸。也由於兩岸開始有協商與交流的管道，始能對「一個中國」定義達成各自表述的原則共識⁵⁹，更促成 1993 年的辜汪會談得以順利展開，建立兩岸溝通管道與制度化的協商機制。

同年台灣將「國統綱領」視為當時大陸政策最高指導原則時，中共國務院台辦副主任唐樹備宣示中共方面處理兩岸具體事務的「唐五條」⁶⁰作為回應。但從中不難看出，「唐五條」沿襲「一國兩制」與「國

⁵⁵ 《人民日報》，（1989 年 6 月 28 日）版一。

⁵⁶ 中共解決台灣時間表，《爭鳴》，第 146 期，1989 年 12 月。

⁵⁷ 中共已擬定統一祖國五年計畫，《南華早報》，1990 年 9 月 19 日，版一。

⁵⁸ 《兩岸關係里程碑——有關「海協會」之座談紀要》，（台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1992 年 1 月），97 頁。

⁵⁹ 邵宗海，《兩岸談判中「一個中國」原則之探討》（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9 年 1 月），23 頁。

⁶⁰ 1991 年 4 月 29 日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唐樹備與海基會首度會面，提出處理海峽兩岸交往的五點原則：

- （一）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中國的統一是台灣海峽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和神聖使命，兩岸同胞都應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
- （二）在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事務中，應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也反對「一國兩府」以及其他類似的主張和行為。
- （三）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考慮海峽兩岸存在不同制度的現實，應消除敵意，加深瞭解，增進共識，建立互信，實事求是、合情合理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中的各種具體問題，維護海

共鬥爭」的思維結構，將台灣視為地方政府，堅持中共自己所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不僅在態勢上以「中央對地方」的「大吃小」方式看待，同時也迴避台灣剛提出的國統綱領對兩岸統一的建議，有意排除與否定台灣對兩岸統一的發言權。

三、一方面藉由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宣示對台政策，一方面展開兩岸交流

1993 年中共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這是中共政權成立以來第一次系統性的論述「台灣問題」的由來及現況，闡明中共關於統一問題，以及在國際事務中處理設籍台灣問題的方針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

- (1) 「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對美國批評甚多，且闡述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可謂大陸已將美國視為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因素之一，並透露出在意美國未來在兩岸關係發展所扮演的角色。
- (2) 「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對於「台獨」傾向的批評是有史以來最具系統性、且最嚴厲的一次，反映出中共對於「台獨」已有高度戒心。
- (3) 「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不僅嚴密觀察「台獨」的發展，也十分注意台灣民情民意⁶¹，如：「台灣同胞要求當家作主、管理台灣的願望是合情合理的、正當的，但這不同於『台灣獨立』，更與極少數堅持要走『台獨』道路的人有著根本的區別。」

整體而言，「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顯示中共對台策略的一貫立場不變，或許各界對於白皮書的內容有不同的看法或是解讀，但由於當時海峽兩岸都有「以交流化解歧見」的基本認知，因此不論

海峽兩岸同胞的正當權益。

(四) 積極促進和擴大兩岸同胞的正常往來，儘早實現直接通郵、通航、通商，鼓勵和發展海峽兩岸經濟、文化、體育、科技、學術和各方面的雙向交流。

(五) 海峽兩岸許多團體和人士致力於促進直接「三通」和雙向交流，應繼續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同時，為解決海峽兩岸交往中各方面的具體問題，應儘早促成海峽兩岸有關方面的適當方式直接面談。

⁶¹ 林國炯等，《戰雲下的台灣》（台北市：人間出版社，1996），277-278 頁。

是白皮書，甚或次年發生的「千島湖事件」，雖然台灣有二十多名旅客「客死他鄉」，也未直接衝擊到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

1993 年 4 月，在海協會倡議、海基會積極響應下，「辜汪會談」得以順利實現，雙方就兩會會務、兩岸經濟交流和科技文化交流等三項議題，充分交換意見，並簽署四項協議。其中「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和「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有效解決長期以來困擾兩岸的文書使用和重要函件寄達問題，而「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對於有效保障兩岸民間的各種往來與交流之順暢發展，維護兩岸人民的正當權益，具有更加積極的意義，同時也標誌著兩岸關係發展進入一個重要階段。

第四節 政治系統轉換過程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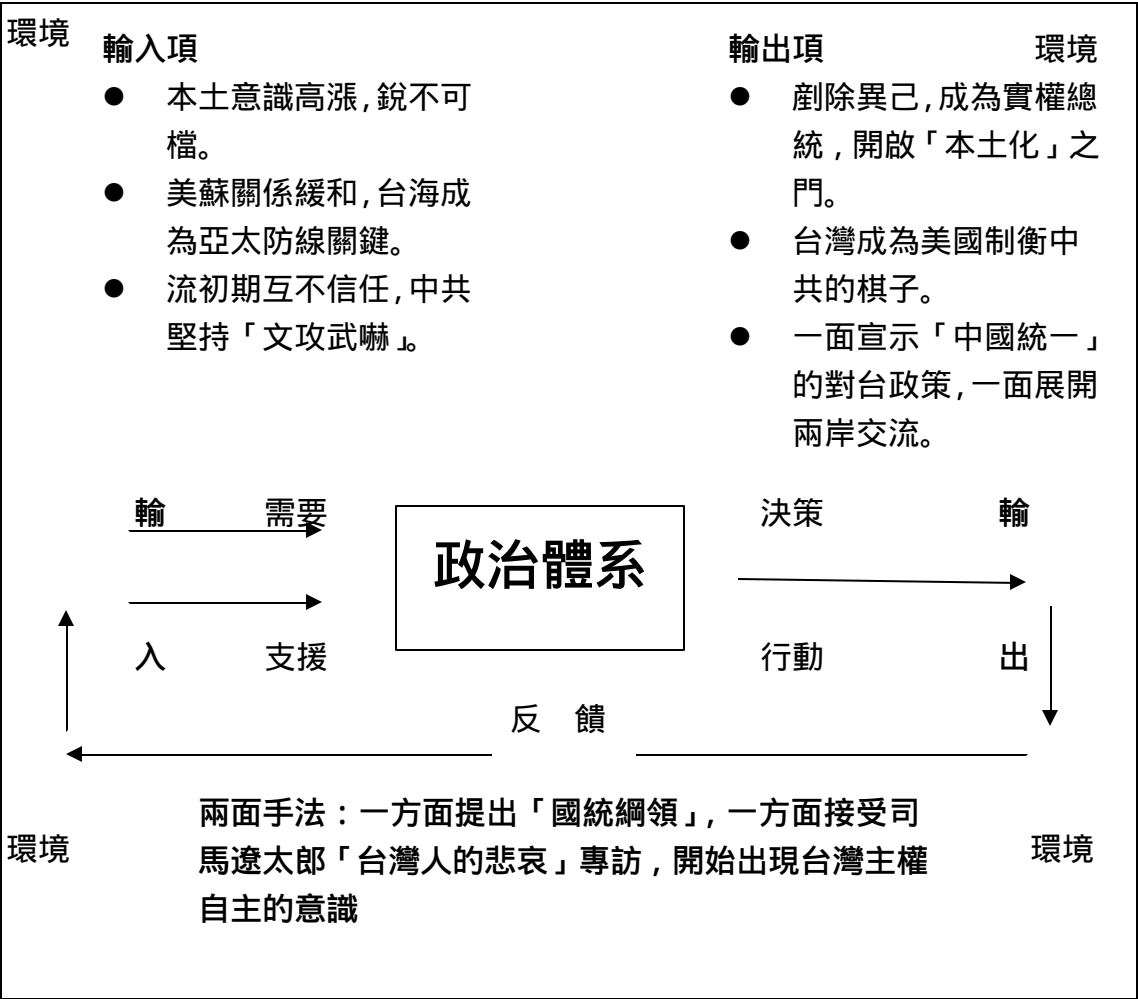
依據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理論」，政治主要為社會系統作權威性的價值分配⁶²；「系統」從實際運作的過程來看，中心是在權力組織與成員間的關係，以國家而言，就是政府與人民間的關係。

因此不論是「本土意識高漲」的國內因素，促使李登輝認真思考「台灣」的本土意識，進而向所謂「本土化」靠攏；還是中共的「文攻武嚇」兩面手法，一方面宣示「中國統一」的對台政策，一方面展開兩岸交流，藉此當作「風向球」，來測試李登輝的大陸政策；抑或是美台關係因為蘇聯瓦解而更加緊密等因素，都使李登輝意識到「台灣必須走出去！」但仍須顧及國內輿論與民眾觀感，以及中共與美國的反應等，因此一方面提出「國統綱領」，藉以「安撫軍心」，一方面則透過各種方式與管道，積極參與國際社會與組織，企圖大肆推銷「台灣的主權」，可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與中共互玩「兩面手法」。

綜合上述，試就「李登輝權力不穩固時期的大陸政策」，依據國內政治因素、美國因素與中共因素等，以「政治系統理論」分析結果如下（圖三）：

⁶²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5, p112.

圖三：李登輝權力不穩固時期的大陸政策系統理論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小結

台灣雖小，但卻擁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不僅是大陸通往太平洋的門戶、是美國前進西太平洋的遠洋航空母艦，更是日本列島的延伸和通往印度洋的樞紐⁶³。如此重要的地位使台灣處於美日中三大政治勢力之間，而更顯示出其獨特而不可或缺的存在價值。

台灣民主政治改革自蔣經國晚年開始，也就是台灣社會經濟趨向

⁶³ 楊中美，《李登輝 VS 江澤民》（台北：時報文化初版社，2000），278 頁。

成熟發展的八十年代初、中期。此一民主化過程至少牽涉到四個寬闊互動的層面，包括：

- 一、 政治反對勢力的壯大及對政治民主化訴求的提升。
- 二、 國民黨內部部分菁英逐漸產生對政治改革的意向及決心。
- 三、 民間社會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而日益成熟與多元化，對國民黨一元統治的威權體制產生挑戰與求變的想法。
- 四、 來自八十年代世界民主浪潮的影響及國際民主社會的壓力。⁶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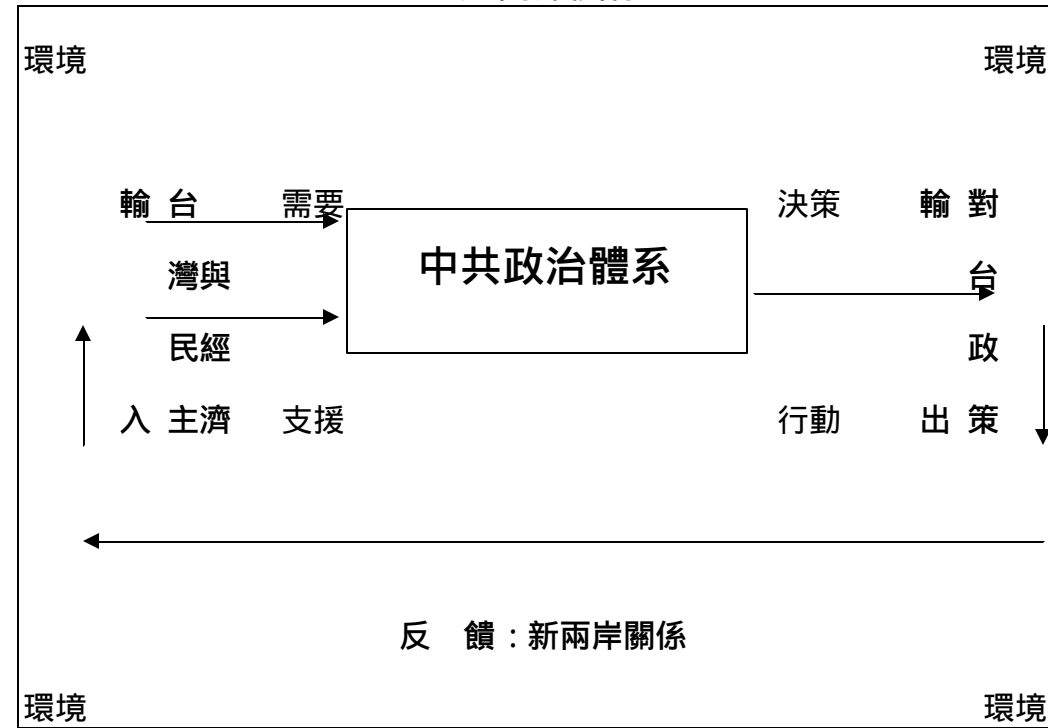
正由於上述四項結構因素的交互作用，台灣民主化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已蔚然成為無法阻擋的歷史趨勢。即便蔣經國於 1988 年突然逝世，也無法使這個歷史趨勢逆轉。因此李登輝做為蔣經國的繼承人，正是順應此一歷史趨勢，延續民主化的風潮而順利當上所謂「民主先生」。

李登輝認為台灣民主化是中國民主化的歷史開端，而中國民主化則是兩岸和平相處及最終走向統一的保證。因此他為自己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的定下雙重歷史任務：（一）儘速推動兩岸關係的正常化，並以之為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二）加速完成台灣內部的政治改革以強化台灣在兩岸民主統一的關鍵作用。

因此不難看出李登輝希望在對等承認的基礎上尋求兩岸的理性溝通，並透過理性溝通而達成共識，最終走向統一。同時，台灣的經濟實力及快速浮現的民主現實，最終會令北京接受李登輝所提出的統一模式。亦即企圖利用台灣經濟與民主的優勢，來影響與重組兩岸關係，再進一步推動台灣的民主改革，建立一如下圖（圖四）所示的政治系統套循環模式：

⁶⁴王家英，李登輝出任以來的大陸政策及其困境，《當代月刊》，第四十四卷，1994 年 11 月。

圖四：李登輝權力不穩固時期所擬定之兩岸統一模式：利用台灣經濟與民主優勢，試圖進入中共的政治體系，來影響與重組兩岸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

李登輝在其權力不穩固時期，企圖使兩岸關係在台灣民主與政策操控下相互發展下去，最終達到其總統任內的兩大目標：台灣民主化與兩岸民主統一的雙重理想。

至此，李登輝隨著政治領導地位的鞏固，其大陸政策形成一套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如下：

- (一) 主張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不可分，並反對民進黨「台灣獨立論」：李登輝繼任總統後的首次記者會上表示，「台獨問題從歷史上看起來，就民主與中國的傳統來說，是不能存在的。」「在國際上及內部都沒有辦法生存，特別是民眾並未支持它。」其後在不同場合也提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在未來中華文化

的發展上，必將居於關鍵性的地位，故絕無獨立的可能。」⁶⁵「台灣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⁶⁶「中國人的血脈斷難分離，國人的命運終為一體。中國的統一是我們未來最確定的目標。」⁶⁷「台灣無論在歷史、文化及客觀條件下，都沒有獨立的理由與可能。」⁶⁸1991 年李登輝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第一次較全面且系統性的說明他的看法：「在台灣的台灣人或外省人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我們不能切斷與中華民族關係，也不能切斷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再從現實利益來看，台灣未來經濟的發展，不能侷限於一個小島，必須有大陸做為腹地來支持，認清了歷史文化與經濟利益之後，所謂『台獨』自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自然也就消失於無形⁶⁹。」

- (二) 強調以「台灣經驗」來「和平演變」大陸，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東歐與蘇聯相繼發生巨變，李登輝認為中國大陸也不可能長期自外於世界潮流，「台灣過去四十年因致力於三民主義建設，建立了依個罪適合於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社會，因此「台灣經驗」應作為全中國人民希望之燈塔，以及統一之後重建中國的藍圖。」⁷⁰直此關鍵時刻，「台灣應勇敢地迎向前去，承擔起主導中國命運的重責大任，重建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統一的新中國。」⁷¹
- (三) 主張兩岸統一之前應先確立「對等政治實體」的架構：李登輝認為，中國實現統一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目前沒有統一的條件。⁷²但兩岸同時各有自己的管轄領域和國際活動空間，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名就是中華民國，就人口數目、財經實力來看，明顯的應在全球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故在國家統一之前，兩岸應仿效東西德和南北韓模式，先確立「對

⁶⁵ 中央日報，1988 年 2 月 26 日。

⁶⁶ 中央日報，1988 年 6 月 8 日。

⁶⁷ 中央日報，1988 年 4 月 6 日。

⁶⁸ 中央日報，1988 年 5 月 22 日。

⁶⁹ 行政院新聞局，《李登輝先生八十年言論選集》，第 121 頁。

⁷⁰ 中央日報，1989 年 11 月 24 日。

⁷¹ 行政院新聞局，《李登輝先生八十年言論選集》，第 270 頁。

⁷² 行政院新聞局，《李登輝先生八十年言論選集》，第 225 頁。

等架構」。⁷³

- (四) 在兩岸對等的架構下，秉持台灣安全第一，利益優先原則。
- (五) 在確保台灣安全與利益優先的前提下，發展兩岸民間交流，以交流促變。

李登輝以「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姿態出線，且社會充斥的民主化、本土化的強烈訴求，讓李登輝能順理成章推動台灣民主進展，甚至獲有「民主先生」的美譽，都是台灣社會四十多年來全體人民嚮往民主政治、追求改革開放的心血結晶，而李登輝則是全民追求民主共同資產得最大受益人。

⁷³ 中國時報，1993 年 4 月 27 日。

第三章 李登輝權力漸穩固時期的大陸政策（1994 司馬遼太郎事件 1995 飛彈危機）

本章藉由描述此一時期李登輝大陸政策之各面向制約因素，分析其大陸政策之轉換過程。本文首先描述此一時期，即李登輝權力漸穩固時期之大陸政策、以及在此政策指導下的兩岸關係互動狀況。

透過本研究前一章節可知，李登輝隨著政治領導地位的鞏固，其制定大陸政策的核心理念已經形成，亦即：在對等承認的基礎上尋求兩岸的理性溝通（詳情請參閱本論文之第二章第五節）。此外，作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李登輝，面對「本土意識高漲」之國內因素，其大陸政策的制定逐漸向所謂「本土化」靠攏，而在外交上則表現為「務實外交」之策略。正是基於上述，此一時期，李登輝的大陸政策開始出現轉變，而兩岸關係互動也隨之出現了轉折。（詳情請參見表一）故此，本論文將此一時期作為李登輝大陸政策轉變之關鍵點(key point)。同時，以政治系統理論為主要理論分析框架，分析此一時期之國內政治因素、中共因素、以及美國因素，詳細探討其大陸政策轉變過程。

表 2：1994 年至 1996 年之歷史事件及兩岸互動狀況

時間		歷史事件及兩岸互動狀況
1994 年	2 月 1- 4 日	海基會與海協會在北京舉行「焦唐會談」
	3 月 25 - 30 日	海基會與海協會舉行「辜汪會談」後第四次事務性協商
	7 月 31 日-8 月 9 日	海基會與海協會在臺北舉行「辜汪會談」後第五次事務性協商
	11 月 23-26 日	海基會與海協會在南京舉行「辜汪會談」後第六次事務性協商
1995 年	5 月 26-28 日	海基會與海協會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預備性磋商，預訂於同年 7 月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

	5 月 22 日	美國眾議院以 396 票對零票通過要求政府「歡迎李登輝以私人身分回母校康乃爾大學訪問」的決議案，隨後美國參議院也以 97 票對 1 票（2 人缺席）通過和眾議院一樣的決議案。
	6 月 7 日-12 日	李登輝前總統訪美、康乃爾之行。
	6 月 16 日	大陸海協會致函海基會，無限期的延後第二次「辜汪會談」，同時中斷兩會間協商的管道 ⁷⁴ 。
	7 月 21-26 日	爆發第一次「飛彈危機」：第一批六枚中共飛彈發射到距離台灣北部約一百哩的東海，使台灣股市慘跌。中共通過一項軍事演習計劃，即包含模擬兩棲攻擊、空戰演練、實彈射擊等，將由中共解放軍在八個月的時間內指揮運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節 國內政治因素

本文將國內制約因素界定在國內政治因素即台灣民主化方面，藉以分析國內環境對李登輝大陸政策變遷的影響。本節就依序先說明台灣民主化之意涵，藉以論述其對台灣內部環境所帶來的改變。

⁷⁴ 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79-80 頁。1995 年 6 月 16 日，大陸海協會就該項會談及其預備性磋商被迫推遲舉行一事，致函海基會，函中說：「鑑於台灣方面近期採取的一系列破壞兩岸關係的行動，舉行第二次汪辜會談及其預備性磋商的時間不得不予以推遲，我會將於適當時機與貴會聯繫。」至於海協會函中所說「磋商的氣氛已受到嚴重影響」，固然是台灣推動務實外交，導致北京面對國際社會改變對台灣的壓力所產生，但最重要還是與李登輝決定應邀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有關。因此北京當局在維護國家領土完整高於一切、高於「中美關係」的情況下，除認為是外交上的重大挫敗外，更視為有外國勢力介入兩岸關係，乃大肆抨擊，無限期的延後第二次辜汪會談，同時中斷兩會間協商的管道。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79-80 頁。

一、持續推進國內民主化與政治改革

台灣真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是近二十年才開始發生的。由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重點來看，在還沒有公開公平地選舉公職前，自由化尚不能轉變成民主化⁷⁵。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自大陸退守台灣以來的五十多年間，立法委員的選舉並不合於經常、定期、參與、競爭等條件，因？民國 37 年於中國大陸所選出之第一屆立法委員，因大陸淪陷而無由改選。到了 58 年，政府辦理立法委員增補選，立法委員選舉才開始正式成？台灣地區民？政治生活的一部份，民國 61 年起，政府又陸續辦理了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之後除 67 年因中美斷交而使選舉延後兩年外，其餘均依憲法規定每三年定期改選。因此，自民國 58 年後，我國在中央層次上，總算有些許民主進展，但相較於充分民主仍相去甚遠。

？順應全球民主自由浪潮，以及反對黨--民進黨要求民主呼聲之壓力，自蔣經國先生執政晚期即致力推動民主政治及憲政改革，轉型過程可以明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蔣經國開？政治自由化，第二階段是由李登輝完成民主化改革的過程⁷⁶。政治改革的具體措施包括：1978 年 7 月 15 日解除戒嚴令；988 年月 1 日開放報禁，准許新報紙登記；1989 年 1 月 20 日通過「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明定政黨公開成立要件；1990 年 5 月 1 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同年 12 月終止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之行使權，並完成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1992 年 5 月 15 日通過刑法第一百條修正案，排除思想叛亂入罪，以及 1992 年 12 月舉行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等。李登輝政權漸穩固，又接連展開的一連串全國性的選舉，被認？是「民主化過程中的奠基選舉 (founding elections)」，1993 年縣市長大選、1994 年首度民選省市長及省市議員選舉、1995 年二屆立委選舉、1996 年首次總統民選以及二屆國代選舉，期間民進黨的支持率逐步升高，民進黨的台獨黨形象在選民心中已經確立。此一民主改革的過程平和順利，建立我國在國際間良好開明的民主形象，同時由於政治發展比經濟發展更？困難，特別是政治權力的分配與轉讓是開發中

⁷⁵ Samuel P. Huntington 著，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文化事業，2007），7 頁。

⁷⁶ 朱雲漢，臺灣的民主化與政黨政治發展，《亞太情勢的發展：安全、經濟與政治》（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6），84 頁。

國家的難題，所以我國的民主化被認為是邁向已開發國家的重要條件。

當中共在天安門屠殺學生時，台灣正積極從事各項政治革新，從威權體制變為民主體制，若干在國際間具有影響力之新聞媒體，對我國推動民主改革之卓越表現，均曾撰文贊揚並予正面評價。例如 1992 年 11 月 11 日，「亞洲華爾街日報」以「台灣之寧靜革命」為題，發表社論指出，並非所有之革命都要排上硝煙與暴力，我國以發展經濟技術為基礎，並漸進地實施、改善民主政治體制，已為世人提供了一項「寧靜革命」之範例⁷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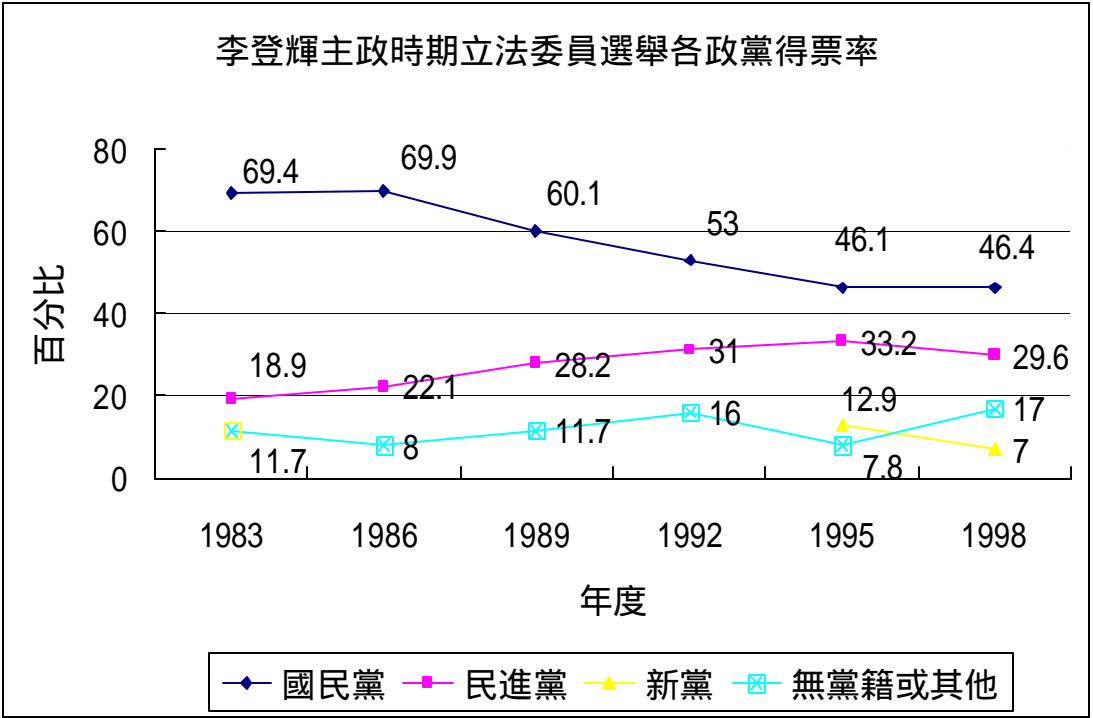
但是由於在「一個中國」的主權論述下，台灣必須承受國際孤立的損害，因此台灣在退出聯合國後，只有少數國家仍有中華民國的領事館或是大使館可以提供台灣的旅客、移民或是企業家保護與協助。

再者，國際孤立使得台灣變成政治風險很高的地區，被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再加上中共對外漸採開放態度，以及以強勢的外交策略打壓台灣，使台灣更加喪失各種商機和國際合作的機會，使得李登輝認為台灣沒有民主化就無法在國際社會上生存。

國內則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民眾民主意識提升，對國民黨政府產生統治壓力，民進黨勢力逐漸強大。因應這些壓力的挑戰，李登輝要將國民黨政權本土化，使國民黨不再被民眾視為外來政權，徹底變成台灣人的政黨，於是加速台灣民主化的過程。

⁷⁷外交部，《外交報告書-對外關係與外交行政》（台北：外交部，1992），40 頁。

表 3：1983 年至 1998 年立委選舉各政黨得票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觀國民黨持續推動的民主化過程，國民黨勢必會？生台灣、中國主權論述的不一致性，也就是國民黨政府「一個中國」的法統基礎受到了動搖，？了解決這法統動搖的現象，李登輝勢必要擺平黨內統獨之爭，以及善用外來勢力，對國民黨政府在「一個中國」的論述上持續做出變遷與解釋，以維持國民黨的生存。

二、國內經濟飛速發展，台灣民？要求提高國際地位，重返世界舞臺

後冷戰的國際社會正逐步朝向世界新秩序 經濟集團化及世界共同體邁進 經濟力量已漸次取代軍事武力成？衡量國家強弱的重要指標，各國亦以追求現實利益與經濟發展？國家主要目標⁷⁸。

二次大戰 40 年以來，我國經濟成長快速，以平均每人所得來衡量，1988 年已達 6,053 美元，雖然較同樣？亞洲四小龍的香港（同年？ 9,605 美元）及新加坡（？ 8,782 美元）？低，但仍較南韓的

⁷⁸同上註， 41 頁。

373,728 美元？高。此外，被世界銀行列？開發中國家的其它一百多會員國中，只有以色列、千里達與托貝哥(Trinidad and Tobago)及阿曼之平均每人國民生？毛額較我國高，其它開發中國家之平均每人國民生？毛額均較我國？低。如用世界銀行 1988 年「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8)的資料加以比較，則我國 1987 年之平均每人國民生？毛額？ 3,841 美元，但是 97 個人口超過 100 萬的開發中國家之中，屬於低所得的 39 個開發中國家，同年之平均每人國民生？毛額只有 270 美元；屬於中所得的 58 個開發中國家之平均每人國民生？毛額 1,270 美元，與我國的平均每人國民生？毛額仍有一段相當的差距，此顯示我國經濟在經過四個年代的持續發展，平均每人所得已遠遠超過絕大部份的開發中國家，而逐漸邁進已開發國家之林。由於經濟的傑出表現使得「台灣奇蹟」享譽國際，成？開發中國家的典範。

經濟實力的增加，導致了台灣民？要求國際地位提高，重返國際舞臺。首先，過去受制於中共的壓力而不願與我國來往的國家，？了擴大在台投資與貿易的機會，乃逐步放寬對台政策，擴大雙邊經貿交流。

其次，中華民國也採取具體行動，於 1989 年成立「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海合會)，回饋國際社會，不僅獲得各國的迴響，同時並提升中華民國在國際的聲望。誠如 1992 年 10 月 5 日「新聞週刊」專文表示，我國多年來累積的財富及建立雙邊關係之務實作法，已使我國重回世界舞臺⁷⁹。

再者，國民生活水準提升，人民出國考察旅遊之次數亦大？增加，中華民國的出國人數由 1983 年的 28 萬人次增？ 1994 年的 376 萬 4,000 人次，增加約 14 倍。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外受到的簽證、通關、過境的不平等待遇後，回國後向政府有關單位反映，逐漸形成一股民意，希望在國際上所受的待遇，能與其在經濟上所展現的實力成正比，所以在民意的需求和支持下，中華民國政府乃重新調整政策，提高國際地位，重返世界舞臺。

⁷⁹同上註， 41 頁。

表 4：台灣地區民眾對兩岸與外交關係優先性看法

民眾 看法 時間	優先發展 兩岸關係	優先發展 外交關係	兩者並重	其他	無反應
1994 年 4 月	13.8%	44.2%	26.9%	4.0%	11.1%
1995 年 6 月	7.5%	35.2%	43.8%	1.1%	12.4%
1995 年 11 月	18.3%	35.1%	21.5%		25.1%
1996 年 2 月	14.1%	29.3%	43.7%	0.6%	12.2%
1996 年 3 月	17.9%	29.5%	41.2%		11.2%
1996 年 8 月	23.0%	35.3%	38.3%		3.4%
1997 年 8 月	22.5%	30.8%	43.8%		4.29%
1998 年 10 月	20.4%	37.8%	23.3%		18.5%
1999 年 8 月	20.1%	31.3%	46.1%		2.4%
2000 年 4 月	26.7%	33.8%	22.7%		16.8%

資料來源：1、中美關係專題研究 1995-1997，132 頁。

2、陸委會網站：www.mac.gov.tw（2008/5/5 參考）。

三、本土化意識持續高漲

一個建基於台灣民意、透過多黨政治而開展的議會民主政治體系已開始全面支配台灣的政治發展，容許各種不同的政治理念的選擇，也因而提供分離主義一個自由討論的空間。再者，隨著兩岸經貿和民間互動的持續深化，國民黨過去高舉的「反共複國」和「一個中國」的口號，其效能亦逐漸遞減，因而強化以台灣為本位的本土意識，民進黨也因此獲得越來越多的民意支持⁸⁰。

⁸⁰王家英，《臺灣近年外交政策的趨向》（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8年5月），24-27頁。

對於許多新中? 階級⁸¹來說，並不僅僅是台灣政治史上人民首次可以有機會選出自己的總統而已，他們也很嚴肅地把它看成是台灣過去政治的完全告別⁸²。透過對具有強烈正當性的自由民主價值的捍衛，自由地區的人民直接選出屬於自己的總統來代表行使這個區域的「政治主權」，進而轉換到社會的文化層面。從各種社會運動的興起，環保意識的抬頭，本土文化的振興等等的趨勢，均暗示著「民主化」與「本土化」，而所謂「本土化」更意味「台灣化」，這三個概念之間具有一種實質上的「選擇性親近關係」。從這個脈絡來看，台灣民主主義的發展，已漸趨向分離主義的路?⁸³。

李登輝總統任內的「本土化」提倡，雖然平反過去備受壓抑的本土文化，但卻被有心人利用而發展成? 「偏狹台灣民族主義」，導致國家認同與民族意識的混淆，甚至引發統獨對立⁸⁴。

中共打壓的助長雖然台灣當前的分離主義問題不必然等同台獨主義⁸⁵，但是，由於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在國際間壓縮台灣的生存空間，以及以「文攻武嚇」威脅台灣人民，對台灣社會造成極大的反感，致使支持中國統一的民? 日益減少，支持台灣獨立的比例在過去數年中反而不斷增長。

1994 年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僅僅反映了他內心深處的一些想法，但北京解讀? 「最能暴露李登輝內心深層想法」的憑據，因此將李登輝定位? 「明統暗獨」之代表。事實上，由於兩岸長期缺乏互信的基礎，加上中共看待台灣從來沒有所謂「對等」、「民主」等觀念，李登輝的兩岸政策當然會泥牛入海。

正因? 如此，台灣內部民間及政治反對勢力的質疑與批評日漸擴大，整體民意因而傾向「台獨」；國民黨在從 1992 年到 1994 年的選舉競爭中，無論是得票率或是席次都持續下滑，相對的在民主化的潮流中，民進黨卻日益壯大，這種結果反應著國民黨對台灣的控制力

⁸¹田弘茂、朱雲漢著，《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業強出版社，民國 86 年 10 月）。所謂的「新中? 階級」係指：自由派知識分子、學生、大學教授、記者、法律專業者。

⁸²同上註，521 頁。

⁸³劉篤忠，《中山先生民族思想與兩岸民族主義發展之研究》（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89 年 12 月），187 頁。

⁸⁴同上註，272 頁。

⁸⁵同上註，27 頁。

已經逐年下降，這是國民黨本時期的一項危機。另一方面，國民黨因？李登輝採取與本省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結盟鞏固統治力量，而導致利益勾結、黑金共生的金權政治。貪汙腐敗逐漸侵蝕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更迫使李登輝必須利用兩岸政策來轉移外界對國民黨「黑金」的指謫與批評。

綜觀所述，在李登輝訪問康乃爾大學後，中共的武嚇行動，目的在於恐嚇台灣民？，不要再支持國民黨和李登輝總統的政策，但是飛彈試射的結果，非但沒有嚇走國民黨的支持者，反而加強民？對李登輝總統的支持。⁸⁶李登輝不時利用中共的威脅，強化選民對他的支持，這也是中共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節 美國因素

1990 年代初期，與美國長期冷戰的的蘇聯瓦解後，美國成？國際間的獨強，從而美國「聯中制蘇」的全球戰略佈局，亦應隨之而調整。此項調整不但直接衝擊美國與台灣的关系，同時也將影響美國的整體全球戰略佈局，當然也包含美國的對中共的政策。

在這一時期，美國現階段對台灣的基本政策是，延續把台灣作？制衡中共的一顆棋子，在不破壞中美友好關係前提下，暗中加強與台灣的實質關係，積極維持兩岸目前「和而不統」或「一中一台」的現狀。

自 1979 年後，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實力倍增，隨之投射出的國力，使得中共本身儼然成？崛起中的區域性，甚至是全球性強權。而？了因應中共即將成？國際新興強權的國際現象，對於中共「未來意圖」的解讀，在美國內部形成兩派不同的觀點，各自引出兩種不同政策論述，從而導致美國對中共的圍堵（containment）與交往（engagement）兩大政策並存。

⁸⁶張同瑩等譯，《臺灣有沒有明天？》（台北：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8 年 2 月出版），81 頁。

一、延續以台灣制衡大陸的戰略，提升與台灣的實質關係

在就職演說前，柯林頓就指出他施政三大支柱(Pillars)的理念。柯林頓正式就職後，？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與鞏固權利，美國開始積極部署亞太策略，1994 年，柯林頓總統發表「國家安全報告」，提出「一個目標、三個支柱」，一個目標即是要在全球建立鞏固美國的領導地位，三個支柱在於經濟安全、軍事力量與促進民主，即清楚明確地提出這種國際戰略架構。這種架構影響著美國對台灣關係的制定。

在兩岸問題上，美國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過台灣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西臨太平洋，北控東海，南臨南中國海，是最理想的貿易和戰略據點。從國際形式發展的大趨勢看，兩岸終究要走向協商與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共近年快速的經濟發展與日益重要的經貿地位及國力的增長，確實可以轉換？對台灣的優勢籌碼。若是任由這種態勢發展下去，是美國以台制衡中共的戰略所不允許的，一個統一的崛起的中國會對美國造成巨大挑戰。

美國此時期對台灣的基本政策是在不破壞中美友好關係前提下，暗中加強與台灣的實質關係，積極維持兩岸目前「和而不統」或「一中一台」的現狀。

柯林頓政府提出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促進民主，推廣自由化，美台有共同的價值理念，有意加重「台灣牌」的份量，但是亦不敢公然與中共敵對。因此美方一方面鼓勵台灣民主化，維護美台戰略利益，另一方面要維持亞洲的穩定，避免台灣在美中關係上製造麻煩。在政治上，美國將持續推動民主和人權價值，以保障亞太地區根本的和平與穩定；在安全上，美國將重申對亞太地區承擔軍事義務，積極促進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對話體系形成。

因此，？防範中共進一步擴張海權，確保台灣海峽通行無礙，台灣必須維持現狀。美國在整個亞太戰略佈局中，將台灣視？同一陣？，依據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維持兩岸相對性的軍力平衡，達到制衡之戰略目標。因此，柯林頓加強了對台的實質關係。如第二章所述：1993 年，參議院通過修正案，稱「台灣關係法」中對台軍售部分高於「八一七公報」中相關規定，等於是？美國大量出售尖

端武器給台灣鋪路。1994 年提升美國與台灣的實質關係，例如台灣駐美機構名稱，解凍雙方高層內閣官員互訪的禁令。美國同意支持台灣加入非國家性的國際組織。

1995 年 5 月，美國參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先後通過議案要求美國政府允許李總統赴美訪問，受到國會及輿論壓力下，美國終於在同月二十二日公開宣佈，允許李總統於六月赴美作私人訪問，這是李登輝務實外交的一次重大勝利。

然而中共反應強烈出乎美國意料之外。對美國而言，這次危機事件使美國充分認識到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堅定立場，美國和中共隱然要為台灣而走向戰爭。然而這是和美國戰略利益不符，美國的目的是希望努力改善和中共的關係，避免戰爭爆發的可能，所以大幅向大陸方向傾斜。

二、美國對中共之戰略調整，圍堵（containment）與交往（engagement）兩大政策並存

柯林頓政府擴大了傳統國家安全的定義，認為在後冷戰時代，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不再是與蘇聯的軍事對抗，而是在高度互賴的國際經濟中逐漸喪失競爭優勢會影響到美國人民的生活水準，進而侵蝕美國國力及在全球事務上的主導地位。所以國家安全不但是要確保軍事安全，更要確保美國的「經濟安全」。且國務卿克理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更在參議院外交委員的證詞中將「經濟安全」列為柯林頓對外政策六大重點之首⁸⁷。

要確保美國的經濟安全首要在於降低國內失業率，並創造就業機會，故柯林頓政府提出兼顧到增加公共投資和減少聯邦赤字的廣泛經濟計劃。美國國內經濟重振，增加就業競爭力和生產力，便能進而創造國際經貿新秩序，惟有美國繁榮，世界經濟便得以復甦，且此種繁榮將助於美國向外推行其普世價值觀——民主政治和人權的一大利器，以促進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保障其國家安全。

在美國內部形成兩派不同的觀點，各自引伸出兩種不同政策論

⁸⁷ Warren Christopher, “*The Strategic Prior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Nov.4, 1993), pp.796-798.

述：從而導致美國對中共的圍堵（containment）與交往（engagement）兩大政策並存。

對圍堵論者而言，基於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樂觀預期，到 2020 年中國將超越美國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所轉移到軍事部門的資源，將使得中國具有挑戰美國的能力。再者圍堵論者基於共黨專政與民族主義特質，中國積極籌劃以求取代美國成？亞洲第一強權，使得該地區國家採取任何行動時，皆必須考慮中國利益。因此，中國將取代蘇聯成？美國的潛在威脅，甚至較軍力強盛卻經濟雕敝的前蘇聯威脅更大，如欲避免中國的威脅，則僅有事先圍堵一途。

然而對交往論者而言，儘管中國經濟實力的日趨強大已無須否定，但是美國的力量仍是無與倫比的強大。在推動與阻撓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選項中，美國具有決定性的能力。因此，是美國具有威脅中國的能力，而非中國威脅美國的利益。再者，交往論者認？基於地緣政治的處境與威脅，以及糧食問題，中國基本上的姿態與意圖應該是防禦性，而非侵略性的。

因此，中國是否將成？美國的重要威脅，仍無法斷定，但是穩定發展中的中國仍較動蕩不安的中國，更符合現階段的美國利益。同時，如果持續將中國視？「潛在的重要威脅」，則根據「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原則，中國則必然成？美國的敵人。但是，在實際政策執行上，純然的交往或是圍堵政策並不存在，並且往往是兩者兼具，或隨議題領域與決策者的理念不同而有所選擇。

在後冷戰時期，相互依賴日深國際情勢下，加上中共第二擊能力的增強，在全球化的市場導向的趨勢下，國際權力結構的判定與分析，議題階層的設定日益困難。對於美中兩國的決策者而言，簡單的圍堵政策、競爭策略，安全至上的硬性對抗，並不能符合國家利益。蓬勃的中國市場、美國的龐大消費力、投資額與全球經濟的熱絡，都使兩國決策者不願放棄對於經濟、貿易等軟性權力的追求。故而美國方面，對於面對新國際結構的國際戰略？何，經歷長時期的爭辯仍未有定論，同時國際戰略也成？歷屆美國總統的重要政見之一，尤其是面對中國的態度。

美國柯林頓政府主要目標是建立一穩定、有彈性的全球金融體

系，以促進全球經濟發展。對美國而言，經貿相關議題已經成為美中關係的重要方面。由於柯林頓政府把經濟安全放在首位，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大陸市場愈來愈散發巨大活力，柯林頓以利益為重與中共大力發展財經，無視於中共的違反民主人權之事實，提出人權問題與經濟問題割裂，弱化台灣地位。

1995年5月，李登輝總統以利用共和黨所控制的國會熱情，迫使柯林頓發給簽證。六月李登輝總統訪美，並在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講。因應中共在1995年7月到次年3月間不斷升高兩岸緊張情勢，迫使美國必須出面採取立場。美國為避免事態的複雜化，柯林頓政府在中共軍事演習的第一次響應是：「對這些演習發表任何正面或負面的評論，都是不智，而且不適當的。」，國務院官員亦表達美國沒有以武力因應的立場。美國的姿態，從國務院到國防部官員言談中觀察，都是保持刻意的、戰略上的模糊⁸⁸。

綜觀美國的對台政策，是基於美國對大陸政策之上的。一方面，美國在現實利益下與中共建交，大力發展政經關係。另一方面，站在思想價值體系上的立場，共黨專制政權的中共與美國所講求的民主人權與自由的崇尚，根本是背道而馳。台灣是亞洲少有的民主表率⁸⁹，長期受到中共武力威脅，因此美國對中共的不滿很自然就轉化為對台灣的支持與同情。

這一段時期由於美國國內經濟情勢的轉變，柯林頓的執政重心由外交轉回內政，在現實主義理念引導下，美國以利益為重，無視於中共的違反民主人權之事實，對中共極力拉攏之能事，台灣自然又變成美「中」關係發展的障礙。這也是美國李總統訪美後，柯林頓政府希望努力改善和中共的關係，大幅向大陸方向傾斜的根本原因。

第三節 中共因素

經歷過「六四事件」之後短暫的經濟制裁，中共與國際社會關係改善，國內政治恢復穩定，經濟持續成長，中共國內的經濟潛力成為

⁸⁸同前註 14，217 頁。

⁸⁹李文朗，《臺灣民主化的極限》，（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8 年 8 月出版），243 頁。

世界各國都積極想要跨足的市場。而離大陸最近的台灣也流行「大陸熱」，台商赴大陸投資金額與件數都逐年增加，在兩岸政治方面，海峽兩岸兩會的交流也在持續。兩岸關係此一情勢，持續至第一次飛彈危機，兩岸關係才開始跌落穀底。

一、延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調

中共於1979年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要求與中華民國政府舉行「和平統一中國」談判，並且提出「三通」「四流」的主張，作為中共對台統戰基調。自1984年起，中共對台政策確定了「一國兩制」的方針⁹⁰。1987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兩岸關係解凍後，中共亦希望藉頻繁的民間互動，造成功能性的互賴關係，從而迫使台灣政治上與其接觸⁹¹。

1988年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後，在兩岸問題上，亦開始主動積極的作為，於1990年成立國統會，1991年陸委會、海基會先後成立，並通過國統綱領、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對中共之善意舉措。中共於1991年12月26日成立海協會⁹²，最為海基會之對口單位。由於兩岸透過協商，對「一個中國」定義達成各自表述的原則共識⁹³，因此，1994年的「辜汪會談」得以順利開展，即使出現「司馬遼太郎事件」，會談亦未受影響，並建立起兩岸溝通管道及制度化協商機制。「辜汪會談」前夕，中共為營造「兩黨談判，多黨參與」的假像，發動對台統戰組織「臺盟」、「台聯」，主動對民進黨表示願意與之就統一問題接觸談判。

二、以「江八點」作為對台政策綱領

中共為積極推動「一國兩制」，期以加快海峽兩岸「和平統一」進程。199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談話，闡述鄧小平「和平統一，

⁹⁰ 邵宗海，《兩岸談判中「一個中國」原則之探討》（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9年1月出版），2頁。

⁹¹ 《兩岸關係里程碑——有關「海協會」之座談紀要》（台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民國81年1月出版），97頁。

⁹² 同上註，64頁。

⁹³ 同上註，23頁。中共宣稱「九二共識」是雙方各自以口頭生命形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一國兩制」思想，概括 1979 年以來兩岸關係發展情況，指出台灣局勢和國際形式變化對「中國統一」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即俗稱的「江八點」，其基本主張如下⁹⁴：

- （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的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活動。
- （二）兩岸和平談判可分步驟進行，第一步雙方可就「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
- （三）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主張」，而是針對干涉「中國統一」的「外國勢力」與「台灣獨立者」。
- （四）面向二十一世紀，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加速實現「三通」，商談並簽訂保護台商投資權益的民間性協議。
- （五）中華文化是實現和平統一的文化基礎，也是台灣文化主體，通過兩岸文化交流，促進「和平統一」進程。
- （六）進一步寄希望於台灣同胞，尊重並保護台灣同胞願望與權益。
- （七）中共願意與持「台獨」立場以外之台灣各黨派、各界代表人士接觸，交換意見。
- （八）雙方領導人以適當身分互訪，共商國是。所謂適當身分，是指台灣方面訪問者身分應符合「一個中國」的原則。

同年4月8日李登輝總統發表「李六條」作為回應，兩岸高層的隔岸對話，鋪陳一股和諧的互動氣氛，兩岸關係在這段期間呈穩定發展

⁹⁴劉德久等，《解讀臺灣》（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458-459頁。

三、 中共發展「防止台獨」政策

自從民進黨崛起後，黨內經過「台獨保守時期」的發展，台獨理論論述更加完備與系統化，政策形式從決議文到黨綱不斷提高層級。台灣的民意調查中支持台獨的比例有增加的趨勢，主張維持現狀的比例更是逐步提高，該黨在台獨黨綱通過後的近幾次選舉中也能獲得越來越多的選票支持，從而擴大該黨的政治版圖與權力資源，該黨在台灣的政局中乃至於兩岸政策逐漸具有影響力。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不得不開始重新評估與調整民進黨在兩岸發展上的位置。一方面繼續在國際上孤立台灣的政策不變，另一方面加強對台和平統戰，加緊將國民黨拉上統一的談判桌，以避免民進黨執政的變數。

1995 年初，據台港媒體報導，中共方面研判自 1994 年大選後，台灣政局已經出現新的變化，民進黨勢力日益茁壯，民意基礎日增，開始威脅國民黨的統治，非常憂慮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的可能性增加，因此要求今後對台工作重點應放在「防止台獨」和「爭取島內民心」方面，有鑒於此種新形勢的演變，中共國台辦在新提出的九五年對台工作部署中，明確傳達中共領導階層表示應與民進黨進行有限度交往的新指令，中共對台各單位機構也可以邀請民進黨人士以個人身份訪問大陸。隨後中共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公開表示，「可以和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會談」。而江澤民提出的「江八點」中，也首度沒有提到「國共兩黨談判」，強調歡迎台灣各黨派前往參觀、訪問，也是因應民進黨在台灣政局的新情勢而來。

四、 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以及康乃爾之行，引發中共強烈反應，並且導致中共對台政策轉向武嚇為主，爆發第一次飛彈危機。

兩岸因「辜汪會談」之後，確定兩岸定期化制度化協商交流的機制，也使兩岸關係的發展進入正常化的階段。正當各界對於兩岸未來發展予以殷切期盼之際，1994 年 3 月，李登輝總統在與司馬遼太郎的《場所的悲哀 - 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一場對談卻引發中共的強烈反應。

李登輝總統的這場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以及隨後於同年 4 月 14 日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時表示：「一個中國是我們的目標，台灣與中共是兩個政治實體，目前看不到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在哪裡？」「不



是我不統一，而是中共不改，不同的政治生態，怎麼能統一？」⁹⁵。這些言論，引發中共強烈的震撼與不滿，一方面質疑台灣的「一個中國」政策，另一方面也對李登輝總統個人展開抨擊。這些談話發表使中共認為台灣在「一個中國」政策問題上倒退，並有意重新篡改對「一個中國」的詮釋；李登輝主政後的「一個中國」政策經過了一個沿用、含糊、倒退、篡改的質變過程；在島內國家認同上造成極大的混亂，給台獨勢力宣傳台灣獨立提供了舞臺，回避並進而放棄「一個中國」原則的趨向⁹⁶。這次事件導致中共在往後兩岸交流協商時，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強硬立場，升高兩岸爭議的敵意氣氛。

1995 年 5 月，美國眾議院以 396 票對零票通過要求政府「歡迎李登輝以私人身分回母校康乃爾大學訪問」的決議案，隨後美國參議院也以 97 票對 1 票（兩人缺席）通過和眾議院一樣的決議案⁹⁷。

中共外交部立即於 5 月 23 日向美國提出強烈抗議。李登輝總統訪美後，中共終止或暫停了一系列重要的團組訪美，召中共駐美大使返國述職，並且對台灣開始進行「文攻，武嚇」。

（1）文攻：無限期延後第二次「辜汪會談」，同時中斷兩會間協商的管道

中共除了向美方抗議外，亦在北京各新聞單位陸續發表評論，抨擊李登輝總統「背棄一個中國原則、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分裂祖國的真面目」。從 7 月 24 日開始，人民日報、新華社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深入「批駁」李總統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中的「分裂觀點」，「揭露」李總統上臺以來的「分裂活動」。

至於在兩岸接觸協商談判方面，大陸海協會亦終止與海基會的第二次「辜汪會談」的預備性磋商。6 月 16 日，中共國務院台辦發表聲明指出：「台灣當局近期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包括李登輝訪美，連續舉行針對大陸的大規模軍事演習，嚴重毒化兩岸關係氣氛，破壞兩岸關係發展，阻撓中國統一，第二次『辜汪會談』及其預備性磋商已不

⁹⁵李登輝，《經營大臺灣》（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 84 年 1 月 1 日出版），448-449 頁。

⁹⁶林國炯，《戰雲下的臺灣》（台北：人間出版社，民國 85 年 3 月出版），96-97 頁。

⁹⁷江振昌，《兩岸三地的政經情勢》（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 85 年 6 月出版），41 頁。

能按原計劃舉行，這完全是台灣方面一手造成的。」⁹⁸。

（2）武嚇：第一次飛彈危機

第一批六枚中共飛彈從 1995 年 7 月 21 日至 26 日發射到距離台灣北部約一百哩的東海，使台灣股市慘跌。在北京，中共政治局通過一項軍事演習計畫，這是包含模擬兩棲攻擊、空戰演練、實彈射擊等，將由中共解放軍在八個月的時間內指揮運作，並且在 1996 年台灣選民前往投票所首次直接選舉總統時達到最高潮⁹⁹。

綜觀整個事態發展，李總統如願於 1995 年 6 月 7 日至 12 日訪美後，中共的指控逐漸展開。中共方面首先默不作聲，接著是微弱的反應，然後似乎是源自中共軍方的抨擊突然爆發。一時之間，中共所有的傳聲筒同時對李總統展開謾罵式的攻擊，譴責他是分離主義分子，尋求「脫離主國」。

中共原本對第一位具台灣人身分的李登輝總統，就任後的民主化與本土化作為，自始即抱持保留態度。從李總統與司馬遼太郎對話後，中共就將以往質疑李總統強烈本土意識的先入為主印象強化，開始公開對李總統個人展開人身抨擊，認為李總統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已從一個中國政策嚴重倒退為兩個國家的混亂意識。惟李登輝之康乃爾之行，使得中共確認了此一認知，由此引發了第一次飛彈危機。

中共這樣做是基於自身之全盤戰略考量，為阻絕「康乃爾效應」之進一步擴大，除了威脅倒退與美國雙邊關係，意圖阻絕台灣務實外交發展，更重要是，在「結構上」刻意曲解李總統訪美為「外國勢力介入」台灣，及扭曲台灣在拓展國際生存空間上違背了「一個中國」原則，甚至製造永久的分裂¹⁰⁰。

綜上所述，這也從另一個面向，表明了李登輝之大陸政策的正式轉變開始，就在本研究界定的此一時期。

⁹⁸中共中央臺灣辦公室，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中國臺灣問題（幹部讀本）》（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8 年 2 月出版），113-114 頁。

⁹⁹聯合報編譯組，《中美交鋒》（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89 年 2 月出版），23-25 頁。

¹⁰⁰潘錫堂，《兩岸關係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9 年 4 月出版），302 頁。

第四節 政治系統轉換過程因素

美國總統柯林頓上臺，提出三大支柱的理念。美國在這一時期做出戰略調整，把經濟安全作爲首要目標，與中共發展經貿關係。由於與台灣擁有共同的價值理念，基於其自身戰略利益和意識形態考慮，亦加強與台灣實質關係，有意加重「台灣牌」的份量，但是不敢公然與中共敵對。一方面鼓勵台灣民主化，持續推動民主和人權價值，維護美台戰略利益，另一方面要維持亞洲的穩定，避免台灣在中美關係上製造麻煩。

在上一章分析中，李登輝權力尚未穩固時期亦已意識到「台灣必須走出去！」，但是須顧及國內輿論與民衆觀感，以及中共與美國的反應等。李登輝權力漸穩固，持續推進國內民主化與政治改革，經濟飛速發展，台灣民衆要求提高國際地位，返回世界舞臺。由於台灣民主政治發展漸具規模，經濟自由化的成功轉型，李登輝以務實理念發展兩岸關係、開拓國際空間，這是台灣賴以生存，爭取國家利益，保障國家安全之所繫。台灣基於這種理念推動下，開展務實外交。終於促使 1995 年 5 月間，美國政府允許李登輝赴美訪問，台灣開拓國際空間作出更大突破，亦是台灣務實外交的一大勝利。

然而由於兩岸長期缺乏互信的基礎，加上中共看待台灣從來沒有所謂「對等」、「民主」等觀念，李登輝的兩岸政策不僅泥牛入海，這一訪美事件亦引發第一次「飛彈危機」。

中共對具強烈本土意識的李登輝「總統」，就任後的民主化與本土化作爲，自始即抱持保留態度。從李總統與司馬遼太郎對話後，中共就將以往質疑李總統強烈本土意識的先入主印象強化，直至李登輝訪美，開始公開對李總統個人展開人身抨擊，認爲李總統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已從一個中國政策嚴重倒退，兩個國家的混亂意識，且不放過任何一個得以擴大渲染效果的事件，並且將對李登輝總統個人的負面情緒與台灣的大陸政策混淆爲一體，從而初步形成企圖以「和戰兩手」的統戰策略，達到「防獨、促統」之目的，對台政策日趨強硬。

李登輝總統任內的「本土化」提倡，平反過去備受壓抑的本土文化，導致國家認同與民族意識的混淆。由於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在國際間壓縮台灣的生存空間，以及以「文攻武嚇」威脅台灣人民，使台

灣社會造成極大的反感，導致本土化意識持續高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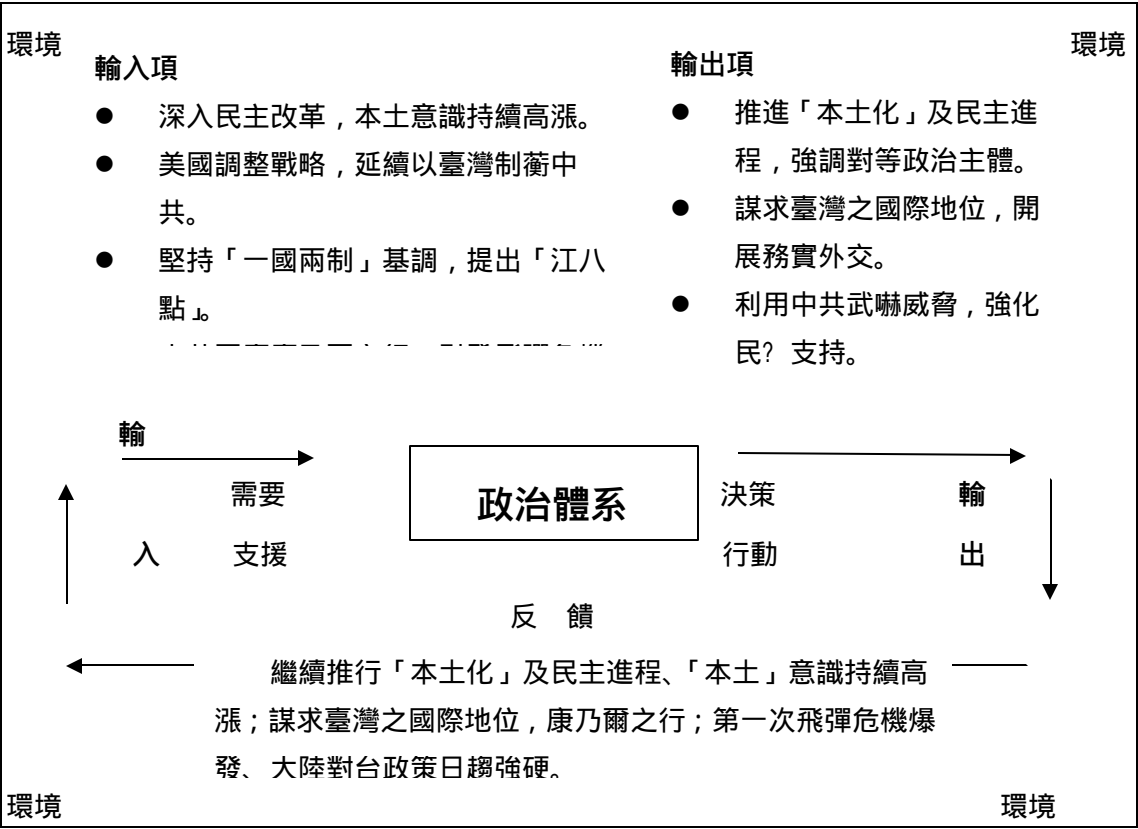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台灣內部民間及政治反對勢力的質疑與批評日漸擴大，整體民意因而傾向「台獨」；國民黨在從 1992 年到 1994 年的選舉競爭中，無論是得票率或是席次都持續下滑，相對的在民主化的潮流中，民進黨卻日益壯大，這種結果反應出國民黨對台灣的控制力已經逐年下降。

另一方面，在李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後，中共的武嚇行動，目的在於恐嚇台灣民衆，不要再支持國民黨和李登輝總統的政策。但是飛彈試射的結果，非但沒有嚇走國民黨的支持者，反而加強民衆對李登輝的支持。

國民黨因李登輝採取與本省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結盟鞏固統治力量，而導致利益勾結、黑金共生的金權政治。貪汙腐敗逐漸侵蝕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更迫使李登輝必須利用兩岸政策來轉移外界對國民黨「黑金」的指謫與批評，利用中共的威脅，強化選民對他的支持。

綜合上述，試就「李登輝權力漸穩固時期的大陸政策」，依據國內政治因素、美國因素與中共因素等，以「政治系統理論」分析結果如下（圖五）：

圖五：李登輝權力漸穩固時期的大陸政策系統理論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小結

兩岸自 1995 年 1 月至 4 月間，呈現「江八點」和「李六條」兩岸高層隔岸喊話、鋪陳改善兩岸關係的和諧氣氛，復以該年 5 月下旬焦仁和 唐樹備在臺北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的第一次預備性磋商，雙方就二度「辜汪會談」之程序問題達成八項共識。

儘管中共對具強烈本土意識的李登輝「總統」就任後的民主化與本土化作?，自始即抱持保留態度。1994 年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話，開始造成兩岸交流的心理障礙，惟並未見李登輝實際行動之證明，但中共已開始將以往質疑李總統強烈本土意識的先入? 主印象強化。

故此，當 1995 年 6 月的李登輝的美國康乃爾之行實現時，就坐實了中共此前之認知，造成了中共的猛烈「抨擊」與回應。首先，中共在同月片面中斷了包括二度「辜汪會談」在內的所有協商管道；其次，更因此中共？阻絕「康乃爾效應」之進一步擴大，以飛彈演習舉措作出了激烈的因應。加大對台實施「文攻武嚇」策略，使兩岸關係急劇緊張而協商之大門開始關閉。

本章透過對此一時期李登輝大陸政策之國內政治因素、美國因素、以及中共因素的分析，認為正是由於國內深入民主改革，本土意識持續高漲；國內經濟的飛速發展導致我國開始謀求國際地位；導致李登輝的大陸政策之轉折點在此一時期呈現出來。

此外，對美國而言，這次危機事件使美國充分認識到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堅定立場，美國和中共？台灣而走向戰爭的態勢似乎一觸即發。然而，華盛頓和北京的緊張關係到了 1996 年，柯林頓贏得總統選舉後就煙消雲散，華府又一次向北京靠攏，而美國因素在李登輝大陸政策之轉折點呈現後，又將會出現怎樣的變化？本論文後續章節將加以探討與分析。

第四章 李登輝權力穩固時期的大陸政策（1995 飛彈危機 2000 卸任總統）

在本文相關的大陸政策歷史回顧中，可以發現大陸政策與兩岸互動關係可以在 1995 年「江八點」作一分水點。自 1990 年「國統綱領」至「江八點」的提出，兩岸基本上處於互動頻繁的和平時期，我大陸政策基本上也依循著「國統綱領」規範和緩前進。而自「江八點」以降的諸多事件紛擾，結合著我政府相關政策的轉向、最終至 1999 年「兩國論」的主權宣示，使得兩岸互動到了一個歷史的新低點。

李登輝的「七塊論」以及「特殊國與國關係論」的相繼提出，由於時間過近，中共將「七塊論」強加附會為「兩國論藍本」，並提出強烈批判。「特殊國與國關係論」的提出，其重要性不僅在於其內容宣示台灣人民對於國家定位的基本共識，也在於其對整個國際輿論造成的衝擊與震撼，而呈現在各層面，特別是美國和中共的一連串反應與聲明之中。本文所要研究的，正是李登輝總統執政穩固時期變遷的大陸政策。

第一節 國內政治因素

李登輝權力穩固時期，正值台灣民主化進程突飛猛進時期，本節將從國內政治因素，包括台灣持續民主化，臺灣島內民衆本土意識高漲，兩岸經貿升溫，選票考量因素等方面著手，藉以分析國內環境變遷對李登輝大陸政策變遷的影響。

一、持續民主化，強化台灣本土意識，引發統獨意識之消長

（一）台獨意識由來已久

台獨運動早於日據時代即有之。中日甲午戰爭後，台灣割讓給日本，在台灣的一些知識分子不甘淪落日本殖民統治，發表「獨立宣言」，宣佈自主成立「台灣民主國」。此時之獨立運動是種策略性之台獨，其係以獨立於日本帝國殖民主義之外，目的仍是將來回歸中國。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重回中國版圖。惟因國民政府在接收台灣時的混亂與衝突，引發「二二八事件」的不幸歷史悲劇，台獨運動因

而延續至今¹⁰¹。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主義論者提出「台灣民族」這個概念，其主要目的乃是希望在國際輿論上造成「台灣人已不是中國人」的印象，以台灣為主體，透過國際干涉，讓台灣民族以民族自決的方式來達到獨立建國的目的，並以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為分界點，在此之後來台的大陸人視為中國人，將其排除在台灣民族的範圍之外，以此種分類來強調少數外來中國人統治本土台灣人¹⁰²。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更強化了大多數台灣民族主義者的論點：「台灣民族的存在，是在歷史的壓迫過程中塑造起來的。」，這也是在政治歷史層面對「大陸 - 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分歧點¹⁰³。

「二二八事件」與其後長期的戒嚴，事實上已經將中國與台灣在概念上與實質上隔絕開來，生長在這段期間的人，在兩岸開放交流之前，對中國大陸可說是極其陌生¹⁰⁴。

兩岸長期的隔絕和懸殊的制度及生活差異，使台灣一直存在著一股分離於中國大陸的情緒及訴求，而且隨著曾擁有中國經驗的老一輩外省籍人士的漸次凋零，越到民主化後期，便越發衝擊到中華民國的大一統中國認同(identity)，出現國族文化危機(crisis of national culture)的認知情結¹⁰⁵。因此，就國家認同意涵：「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的三個層面來看¹⁰⁶，部分台灣民在心理上，對國家的認同會產生不同的歸屬感。

（二）民主化與政治結構的改變

1980年中期之後，由於蔣經國的民主政治改革，使台灣的威權主義國家體制，迅速過渡至立基於台灣本土民意的自由主義公民國家，

¹⁰¹ 楊仲倩，《中共對美國外交政策中台灣因素之影響分析》，《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97頁。

¹⁰² 劉篤忠，《中山先生民族思想與兩岸民族主義發展之研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2000年出版），210頁。

¹⁰³ 同上註，83頁。

¹⁰⁴ 王家英、鄭赤琰，《第二次辜汪會晤後的兩岸關係》，（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9年出版），79頁。

¹⁰⁵ 同上註，25頁。

¹⁰⁶ 陳光輝，《台灣地區民國家認同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1997年，20頁。

並以民主政治？其主要組織基礎，以及政治權力的開放及制度化（如定期普選）的民主政治參與。同時，在時機上亦適逢下述之政治生態互動，而促成台灣自主意識的發展：

- 1、由於外省籍第一代日漸凋零，從而造成中國意識和統一意識的減弱，以台灣？本位的意識則不斷增強。
- 2、政治反對勢力的壯大及對政治民主化訴求的提升。
- 3、執政國民黨內部部分菁英漸漸？生對政治改革的意向。
- 4、民間社會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而日益成熟及多元化，對國民黨一元統治的威權主義體制？生挑戰求變的心理。
- 5、來自八十年代世界民主浪潮的影響及國際民主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壓力¹⁰⁷。

也因？上述政經條件的鬆動變化，使得各種關於「台灣人」論述的說法紛紛浮出臺面。其中真正能代表具有「台灣民族主義」建構意義是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的成立¹⁰⁸。

隨著戒嚴法於1987年7月解除，台灣邁進了一個新的政治時代，從此競爭性的多黨政治及議會民主成？政治發展的最重要動力。而民進黨是以建立獨立的、只屬於台灣人民的自由主義公民國家？主要的訴求，從而強化了台灣分離主義的基礎¹⁰⁹。

（三）總統開放直選，人民自主意識提高

在民主化國家中，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成？政策制訂的基礎。我國從解除戒嚴以來，民主化進程持續成長，雖然我國民主化的發展或尚未到達成熟的階段，但社會民意的？出對於我國政府的政策制訂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

因此大陸政策的制訂過程除了決策者對國家安全的顧慮以外，經濟與社會因素的全盤性考量才是整體大陸政策的基礎。由於台灣人民

¹⁰⁷ 王家英，《台灣近年外交政策的趨向》，（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8年5月出版），21-22頁。

¹⁰⁸ 同註2，186頁。

¹⁰⁹ 同註7，26頁。

的自主性提高，對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是要走向獨立或是進行統一，部分台灣人民都有各自的統獨意識，更有超過一半比例的民？是支持「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或「永遠維持現狀」，而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這裏的「現狀」代表的就是中華民國「實質」上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另外由於民主化的發展，政黨政治的形成與壯大，本土性政治力量的形成，中共任何對於台灣不友善甚至是武力相向的行？都會被本土性政治力量用來作？反擊中共，使台灣民？更支持本土性政治力量。民主化的發展是與本土化政治力量的發展密不可分，而中共對於台灣的種種打壓與文攻武嚇更是本土化政治力量的成長來源之一，促長民主化與本土性政治力量的發展與形成。

1996年，台灣的選民在不畏懼中共導彈威脅下，以過半數選票選出李登輝擔任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被部分人認定是「台灣人出頭天」¹¹⁰。對於許多新中？階級來說，並不僅僅是台灣政治史上人民首次可以有機會選出自己的總統而已，他們也很嚴肅地把它看成是台灣過去政治的完全告別¹¹¹。

因此，透過對具有強烈正當性的自由民主價值的捍衛，台灣人民直接選出屬於自己的總統來代表行使這個區域的「政治主權」，進而轉換到社會的文化層面。從各種社會運動的興起，環保意識的抬頭，本土文化的振興等等的趨勢，均暗示著「民主化」與「本土化」，而所謂「本土化」更意味「台灣化」，這三個概念之間具有一種實質上的「擇性親近關係」。從這個脈絡來看，台灣民主主義的發展，已漸趨向分離主義的路？¹¹²。

二、因應民？呼聲推行務實外交，反遭中共打壓國際空間

雖然台灣的分離主義問題不必然等同台獨主義¹¹³，但是，由於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在國際間壓縮台灣的生存空間，以及以「文攻武嚇」威脅台灣人民，對台灣社會造成極大的反感，致使支持中國統一的民

¹¹⁰ 莊明哲，《對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反思》，（臺北：第四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2001年1月9日出版），2頁。

¹¹¹ 田弘茂、朱雲漢，《鞏固第三波民主》，（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521頁。

¹¹² 同註2，187頁。

¹¹³ 同註7，27頁。

？日益減少，支持台灣獨立的比例在過去數年中反而不斷增長。

根據陸委會一分民意調查顯示，支持台灣獨立的民眾，從1995年9月的11.7 % 上升到2001年3月的17.8 %，而統一的支持者則下降，從27.5 % 下降到24.4 %；與此同時，永遠維持現狀的支持者亦持續於一成二至一成六之間，而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者比例最高，平均維持三成五左右。

表5：台灣民？的統獨態度（1995~2001）

時間	維持現狀 以後決定	維持現狀 以後統一	永遠維持 現狀	維持現狀 以後獨立	儘快宣佈 獨立	儘快 統一	樣本數
1995 年 9 月	42.8	24.2	12.2	8.0	3.7	3.3	(1067)
1995 年 11 月	32.4	23.9	12.3	10.6	3.4	1.9	(1151)
1996 年 2 月	41.2	20.7	13.9	8.5	4.4	1.8	(1067)
1996 年 3 月	33.9	17.3	16.8	12.7	7.8	1.5	(1067)
1996 年 8 月	34.1	22.0	19.3	9.9	6.3	4.8	(1067)
1997 年 2 月	24.8	21.7	21.0	12.6	8.7	5.0	(1231)
1997 年 8 月	35.4	13.9	21.6	11.2	10.0	5.1	(1067)
1997 年 9 月	34.3	21.5	13.8	10.7	9.0	3.1	(1240)
1997 年 11 月	42.0	15.7	18.5	6.7	9.5	3.8	(1067)
1998 年 4 月	39.2	17.7	16.0	13.0	6.1	3.2	(1067)
1998 年 5 月	36.6	17.2	16.0	11.6	6.7	3.9	(1122)

1998 年 7 月	34.9	16.5	15.8	12.9	4.9	1.9	(1098)
1999 年 5 月	30.8	14.1	19.4	13.6	4.6	2.4	(3343)
2000 年 4 月	30.2	16.2	21.1	14.6	3.9	2.7	(1085)
2001 年 3 月	37.5	21.4	16.7	12.2	5.6	3.0	(1077)

資料來源：陸委會網站：www.mac.gov.tw (2008/4/19)

由表5民意調查數據當中，可以清楚顯示，兩岸關係因素對台灣民？統獨之意向，亦有重大影響。以1995年9月至1996年3月臺海危機前後？例，事件發生前，贊成統一者（包括「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及「急統」）平均二成七左右，贊成獨立者（包括「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及「急獨」）一成二左右；1996年3月事件發生後，贊成獨立者上升至20.5 %，而贊成統一者僅18.8 %，這是首次主張獨立之民？比例超過統一之民？比例，顯見北京之軍事演習對主張統一之台灣民？造成重大衝擊。

李登輝推動之務實外交即使可能使兩岸關係惡化，台灣民？支持政府發展務實外交之比例仍一直較高，顯示政府的大陸政策得到大部分民？的支持。然而，當涉及統獨問題時，大部分的民？無意圖尋求台灣獨立，現階段他們所希望的就是維持現狀，俟時機成熟後，再討論統一或獨立的問題¹¹⁴。

然而中共在文攻武嚇方面，從李登輝訪美、1996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大選、李登輝的「兩國論」，中共都以文攻武嚇的方式來表達中共對於「一個中國」的立場。但反諷的是，中共的文攻武嚇卻反而造成1996年總統大選時，使李登輝的聲望到達最高點，造成李登輝以極高的支持度當選台灣首屆民選總統。

從陸委會所做的「民？認知大陸當局對我敵意態度」民意調查報告也顯示，台灣民？無法接受中國大陸對於台灣文攻武嚇的野蠻作

¹¹⁴戴東清，《北京的世界觀與兩岸關係》，（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9年4月出版），11-13頁。

法，本文認為，中共不願易對台灣結束敵對狀態，持續對台灣文攻武嚇，強迫台灣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對台灣外交打壓，這正是台灣人民始終無法認同中共，甚至對中共有負面觀感發生的主要原因。

表 6：陸委會「民衆認知大陸當局對我敵意態度」調查結果數據表
(1994.2-2003.8)

調查時間	樣本人數	對我政府有敵意 (%)	對我人民有敵意 (%)	調查單位
1994.2	1600	62.1	35.5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4.4	870	78.5	63.4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4.10	1067	78.7	56.9	柏克市場研究公司
1995.2	1067	57.5	42.9	柏克市場研究公司
1995.6	1067	69.5	48.3	柏克市場研究公司
1995.8	1621	73.4	46.6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9	1067	88.0	68.8	中華徵信所
1996.2	1067	74.6	49.7	柏克市場研究公司
1996.3	1067	76.1	53.9	柏克市場研究公司
1996.8	1067	69.4	46.5	中華徵信所
1996.10	1205	60.0	43.4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7.2	1231	74.6	50.6	中山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1997.8	1067	82.3	53.0	中華徵信所
1998.4	1067	63.2	47.4	柏克市場研究公司
1998.5	1122	64.3	48.7	中山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1998.7	1098	61.1	42.6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8.8	1097	60.8	52.7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8.9	1078	68.3	52.8	中山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1998.10	1107	58.5	48.8	中山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1999.4	1112	63.6	47.5	中山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1999.8	1067	88.5	66.7	中華徵信所
2000.2	1067	78.3	59.7	柏克市場研究公司
2000.4	1085	69.0	49.7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00.5	1067	76.5	55.6	中華徵信所
2001.3	1077	70.7	46.8	中山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2001.7	1100	65.7	48.1	中正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2002.2	1081	61.9	38.3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02.4	1091	58.4	49.0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02.7	1091	63.7	40.6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02.12	1076	56.8	40.8	E 社會資訊管理公司
2003.5	1082	64.5	44.4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03.8	1149	70.9	50.7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資料來源：陸委會網站 (www.mac.gov.tw) 【例行性快速電訪民意調查】，「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對兩岸關係的看法」：民？認知大陸當局對我敵意態度；作者整理製表。(2008/4/19)

當我們對中共的「文攻武嚇」與「外交打壓」做出進一步的深入探討時，更可以發現中共「文攻武嚇」與「外交打壓」有以下的內涵是台灣人民所無法接受的¹¹⁵：

- (一) 不尊重中華民國存在的歷史事實與兩岸分治的現實情勢，貶抑台灣？地方政府，漠視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事實，對台灣進行外交打壓。
- (二) 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動輒以「武力恫嚇」台灣，對台灣民心造成深遠影響，提高台灣人民自主性的上升。
- (三) 由中共對台灣的「外交打壓」所造成台灣與功能性國際組織進行雙向的正常交流，造成台灣在許多國際性功能議題上無法得到正確的國際資訊與國際援助。

據中共的理解與思維邏輯，台灣推動務實外交乃為包裝「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獨台」而設計，認為台灣之「外交政策」僅？掩護其大陸政策之手段而已。因此，儘管兩岸交流與良性互動頻繁，中共絲毫不改其「中央對地方」之不對等心態，尤以1995年兩岸氣氛低迷以來，中共對台灣政治上矮化、外交上打壓，更是無所不用其極。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曾於1994年9月研擬並批准一項對台「外交作戰計畫」，意欲封鎖壓縮台灣之國際生存空間至只有面對中共之「兩岸互動格局」，且不得不走向中共一手擘劃之統一藍圖「一

¹¹⁵ 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2月出版)，53頁。

國兩制」¹¹⁶。

綜觀所述，中共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早在李登輝訪美前已經持續進行。若台灣不推展務實外交，中共亦不可能賦予台灣較寬廣的國際空間。可見務實外交是台灣「以小事大」不容置疑的重要籌碼，藉此爭得較大面向的廣泛支持與迴旋空間，才有可能扭轉兩岸不對等格局下臺灣方面的劣勢¹¹⁷。

三、兩岸經貿持續升溫，台灣安全環境受到威脅

台灣地狹人稠，自然資源不足，但擁有豐沛資金以及先進技術與行銷管道。台灣在耐用消費品、電機設備、化纖、塑膠原料以及對勞力密集工業所需設備的製造等，都比大陸具優勢。相反的，大陸在能源及原料供應，以及低工資、地價等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雙方進行交流，彼此同沾其利。據估計，大陸每年自台灣進口近三分之二的數額？資本設備（capital goods）和中間性？品（intermediate goods）的進口，在大陸工廠再加工（value-adding process）後，大部分轉銷歐美日等國外市場。

台商對大陸投資，促進台商自身發展，對台灣經濟發展也帶來負面效應。由於台商將資金及技術移入大陸，結合大陸低廉勞力，大大提高大陸？品品質與出口競爭能力，在歐美日市場，大陸？品逐漸取代台灣？品，出現明顯的替代效應（substitute effect）。以美國市場？例，台灣？品佔有率，由1987年6.1 % 下降到1997年的3.77 %，而大陸？品佔有率則由1.55 % 升到7.19 %；日本方面，台灣由4.76 % 下降？3.64 %，而大陸則由4.95 % 急劇上升到12.36 %¹¹⁸。

兩岸大規模的貿易活動，從雙方經貿比重觀察，相互間的依存效應（interdependence effect）與日俱增。1988年前，兩岸貿易依存度極低，未超過雙方貿易總值3 %。但在1988至2000李登輝執政的這十二年中，相互依存度大幅提升。台灣與大陸貿易總值約占台灣總貿易值11 %。兩岸貿易的依存度，若將對香港貿易合併計算，台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將上升到26 %，而台灣對大陸貿易的依存度，將提高到16

¹¹⁶ 潘錫堂，《兩岸關係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4月出版），14頁。

¹¹⁷ 同上註，14-15頁。

¹¹⁸ 鄭竹園，《大陸經濟改革與兩岸關係》，（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年4月出版），297-299頁。

%。兩岸貿易一旦中斷，對台灣經濟成長將構成沉重衝擊¹¹⁹。

其次，在1990至2000年期間，對大陸貿易，台灣長期享有順差。1990年只占29.04 %，1992年躍升至99.63 %，到2000年9月，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竟達到台灣貿易總順差的304.67 %。如無對大陸連年的巨額出超，台灣恐自1993年後，每年都將出現貿易赤字¹²⁰。

另根據經濟部統計，截至1997年底，台商赴大陸投資件數已逾2萬件，總金額？112億美元，占對外投資總額的比例約四成，位居大陸外資第二位，僅次於香港。在兩岸貿易方面，1997年兩岸貿易總額估計達264億美元，占台灣對外貿易總額比重約11 %，占總出口比重近18 %。這些數據均顯示台灣對外經貿過度集中於大陸市場¹²¹。同時，無論從人口、幅員來看，大陸經濟規模皆超出台灣甚多，因此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進展，可能使台灣的經濟過度依賴大陸市場，進而在政治上受制於中共當局¹²²。

台灣是一個貿易導向的國家，對外貿易是支撐台灣生存的重要因素，無論在經濟或是在國際政治上，貿易一向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貿易成為台灣的命脈，如果台灣的貿易與經濟體系受到中國大陸的影響太大，主控權就會操縱在中共的手上，若中共對台灣展開一連串經貿與統戰策略，台灣將無法抵抗，可見貿易在台灣安全方面成為極重要的關鍵。

但是由於貿易全球化與台灣加入WTO的影響，台灣所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勢必越來越大，加上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在經濟上所？生的「磁吸效應」，台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以及以中國大陸國內市場作？台商的主要出口市場的趨勢似乎已經逐漸成形。

原本到中國大陸投資生？的都是以高勞力密集，也就是所謂的傳統？業？主流，但是近年來令人憂心的新情勢是，台灣許多高科技廠商也開始到中國大陸進行投資與生？，並對我政府喊話，希望對於高科技？業到中國大陸投資的開放程度可以再擴大，這對於我國政府的

¹¹⁹ 同上註，300－301 頁。

¹²⁰ 同上註，302 頁。

¹²¹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答客問》，（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9 年出版），36-37 頁。

¹²² 《大陸工作參考資料民國七十年至八十六年合訂本》，（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8 年 8 月出版），613 頁。

思維來說是一件危及國家生存的事件，因？對外投資與生？也會？生科技與管理技術遭到複製的情況，如果許多關係到台灣高科技核心技術的？品到中國大陸進行投資，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科技差距將會被很快拉近，到時候在國際市場上，同樣的？品，台灣的價格無法與中國大陸低廉的生？成本競爭，台灣的生存命脈也會受到極大的威脅。

當政府憂慮台灣對大陸投資正逐漸形成上、中、下游體系，對台灣經濟成長、？業升級構成強大壓力，而苦思對策。李登輝於1996年9月4日，親臨「第三屆全國經營者大會」致詞表示：「今年總統選舉期間，中共中止了兩岸間既成的聯繫溝通管道，並發動文攻武嚇，意圖影響選舉，結果目的未能得逞。如今，又刻意採取『冷處理』的手法，『以民逼官』、『以商圍政』的手段，對我政府施壓，企圖提升我社會各界的焦慮感。針對這種情勢，我們更必須秉持『戒急、用忍』的大原則，來因應兩岸當前的關係。」¹²³。

李登輝的這項談話，除明確表達「國家安全」的觀念，亦具有提醒工商界赴大陸投資勿隨中共起舞，尤應分散投資風險，不宜過度躁進¹²⁴。期盼國內工商業，要體認商機雖然重要，但國家生存發展更？重要，配合政府「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政策，在兩岸的和平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¹²⁵。

在政治面而論，戒急用忍的意涵，亦鋪陳台灣的大陸經貿政策不能僅立足「在商言商」基礎。在消極面，政府呼籲所有赴大陸投資的台商都應有國家安全與商機利潤平衡之概念。在積極面來看，對大陸施以戒急用忍政策，實乃希望台商能有立足分散市場、降低風險之全球經貿戰略考量，而非如外界對戒急用忍僅是「一味限制或踩煞車」之簡單論斷。當大陸對台經貿政策融入高度政治考量時，政府的戒急用忍就可發揮階段性的策略運用，與兩岸關係之緩和與否相適應¹²⁶。

綜觀所述，在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上相互對立的台海兩岸，卻能在民間交流與經貿互動中獲得相當不錯的進展。此現象頗符合整合理論者（integrationists）所強調的，兩國或兩個意圖整合的地區，

¹²³ 《李登輝登輝先生八十五年言論選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7年6月出版），231頁。

¹²⁴ 同註17，321頁。

¹²⁵ 《李登輝登輝先生八十六年言論選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8年6月出版），132-133頁。

¹²⁶ 同註17，322-323頁。

整合工程都是由爭議性較少的經濟、文化等展開交流互動，而後再漸及於政治、主權等複雜性整合。此即海斯（Ernst B. Hass）所稱的「擴散效應」（spill-over effect）¹²⁷。

然而經濟整合不必然政治整合，由於彼此在政治利益，國家安全與意識形態上的極大差異，即便雙方在各方面擴大交流與互動，並不足以確保雙方必有漸趨和平與穩定的發展。特別是在兩岸關係「不正常」或「不健全」或遭刻意扭曲下，非但使得雙方有極高互利與互補性的經貿活動事務，無法順利「溢出」（spills over）至政治性或其他相關領域，反而更易加深雙方誤解與敵意¹²⁸。

四、選票因素促使大陸政策有所突破

民進黨成立之後，競爭性的多黨政治及議會民主成？政治發展的最重要動力。在後來各級選舉中，民進黨快速發展及鞏固其政黨實力：1989年立法院增額選舉中，取得29.9 % 的總選票；1991年的第二屆國民大會全面改選，23.6 % ；1992年的第二屆立法院全面改選，31.4 % ；1993年的縣市長選舉，41.2 % ；1994年的省市議員選舉，32 % ；1995年的立法院改選，33.2 % ；1996年的國民大會改選，29.9 % ；1997年的縣市長選舉，43.5 % 。與此同時，國民黨的得票率則不斷下降，尤以1993、94、95、96和97年的縣市長選舉、省市議員選舉、國大代表及立法院選舉，其得票率均未過半。此外，1993年從國民黨脫離出來的新黨宣告成立，使得台灣政黨競爭更趨激烈¹²⁹。

一個建基於台灣民意、透過多黨政治而開展的議會民主政治體系已開始全面支配台灣的政治發展，容許各種不同的政治理念的選擇，也因而提供分離主義一個自由討論的空間。再者，隨著兩岸經貿和民間互動的持續深化，國民黨過去高舉的「反共復國」和「一個中國」的口號，其效能亦逐漸遞減，因而強化以台灣？本位的本土意識，民進黨也因此獲得越來越多的民？支持¹³⁰。

在國際環境上，1997年以來美中關係的各項進展，伴隨著「中美

¹²⁷ 饒美蛟等編，《經濟中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114 頁。

¹²⁸ 潘錫堂、黃天中，《中國大陸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 年 4 月出版），505 頁。

¹²⁹ 同註 7，23 頁。

¹³⁰ 同註 7，2-27 頁。

戰略夥伴關係」、「新三不政策」的加溫，讓台灣政府的決策者意識到華府確有逐漸向北京傾斜的趨勢，而在有關台灣前途定位的關鍵問題上？生了迫切的壓力¹³¹。

其次，繼1998年上海「辜汪會晤」之後，定下了汪道涵訪台之約，而後，在國際壓力及企盼下，「辜汪再晤」從事務性商談跨入到政治談判的進程愈趨緊迫，我方亦不斷苦思於台灣應用何種身份，來面對汪道涵來台所伴隨而來的政治談判問題。

李登輝「兩國論」的提出，因應在兩岸關係長期緊張，國民黨支持率一路下滑以及中共對台國際空間嚴重打壓等因素之下，尋求台灣主權獨立地位之法律模型，來減低過去政治說詞所？生的法律風險；在時間點的選擇上，則掌握了美中關係的低潮及汪道涵即將訪台前的契機¹³²，緊扣著2000年總統大選的時程而提出的。其基本上的策略選擇主要是企圖以「兩國論」框架住台灣對於兩岸定位的空間，對外壓縮在「略傾於中共的美中台三角關係」下，汪道涵訪台可能的談判籌碼，對內則可以創造出關於國家定位的思辯輿論，給予連戰較有利的制控點。

李登輝急於在其卸任前嘗試？兩岸關係定調，其實也在說明其希望不在位後的台灣大陸政策，能夠繼續走「李登輝路？」，並形塑屬於李登輝個人的歷史評價，同時制約宋楚瑜及陳水扁都相對棘手的國家定位問題，更有助於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的選情。

「兩國論」主張的提出，儘管引起台海的緊張、激發中共恫嚇、造成美國的壓力，但表面上獲得各種立場民意調查平均逾七成的支持率，對於一個邁向民主鞏固的社會而言，台灣民？對於國家認同與國家定位的共識，已基本完成。

綜觀所述，從1999年「兩國論」的出現、到連扁宋出？競爭2000年總統大選，大陸政策的轉折與遞移，可以明顯地看出「選舉」在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值此期間在美國，總統大選的時機對於台灣提

¹³¹ 宋學文，《從「兩國論」之發展探討我國大陸政策之決策過程：3i 模型的決策分析》，臺北：「展望跨世紀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1999年10月。

¹³² 根據1998年上海辜汪會晤的四項具體共識，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將於「適當時機」回訪台灣，而一般鹹認？，所謂「適當時機」，當指1999年的秋天。詳可見海基會網站，網址：<http://www.sef.org.tw/www/html/koo1.htm>。

供了安全的保障，因？不論是布希或是高爾都不能對北京示弱，以免同情台灣、反對共？中國的選民會背棄他們。而在大陸，江澤民的領導地位還處於相對穩定的時期，對他權力地位的挑戰要到接近2002年中共十六大時才會真正出現。於是「兩國論」引起了台海的緊張，但所幸沒有繼續惡化下去¹³³。

第二節 美國因素

1995 年李登輝的美國行，爆發嚴重的台海危機後。1996 年初，柯林頓政府？了顧及美國在亞洲的政治地位，以及自己國內的地位，對中共在三月將舉行的一連串軍事演習，刻意以更？堅定的態度回應。

台海危機後，北京與美國建立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共識，美國的目的是希望努力改善和中共的關係，避免戰爭爆發的可能，所以大幅向大陸方向傾斜，使台北陷於「台北 - 華府 - 北京」三角關係中被動受制的困境。

1999 年，李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後，美國基於維持台海穩定之戰略考量，既不能同意中共以武力犯台，但也不希望台灣挑戰「一個中國」政策，而且在聯合國宣示，不支持台灣加入所謂的「第三不」。這不但影響台灣國際空間之拓展與國際組織之參與，對台灣爾後務實外交推展與美「中」台關係之不均衡發展，均會？生深遠影響¹³⁴。

一、美國維持建構在「一個中國」、「和平解決」的台海政策，延續以台灣牽制中共戰略

（一）美國維持台海和平局勢

中共近年快速的經濟發展與日益重要的經貿地位及國力的增長，使中共在可見的未來更有能力來挑戰美國在亞太的霸權。台灣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同屬民主社會，和美國擁有共同的價值理念。因

¹³³ 王智盛，《2000 年總統大選民進黨中國政策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5 月，121-122 頁。

¹³⁴ 同註 17，260 頁。

此，美國在整個亞太戰略佈局中，將台灣視作同一陣營，依據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維持兩岸相對性的軍力平衡，達到牽制之戰略目標。

中共在 1995 年 7 月到次年 3 月間不斷升高兩岸緊張情勢，造成台海危機，迫使美國必須出面採取立場。起先，美國避免事態的複雜化，柯林頓政府在中共軍事演習的第一次回應是：「對這些演習發表任何正面或負面的評論，都是不智，而且不適當的。」國務院官員亦表達美國沒有以武力因應的立場。美國的姿態，從國務院到國防部官員言談中觀察，都是保持刻意的、戰略上的模糊¹³⁵。

1996 年初，柯林頓政府考慮了顧及美國在亞洲的政治地位，以及自己國內的地位，對中共在三月將舉行的一連串軍事演習，以更堅定的態度回應。美國國會亦提出一份不具約束的決議，要求美國政府保衛台灣不受「侵犯、飛彈攻擊、封鎖」。為了表達對中共三月演習的關切，美國在台灣附近部署了十四艘戰艦，包括「獨立號」及「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及神盾級巡洋艦。

美國航空母艦的部署並未解決仍然隱隱存於美國、中共、台灣之間的戰爭，但卻拋棄了美國長期所主張的「戰略模糊」，經過一個月的緊張對峙後，美國航空母艦駛離¹³⁶。

（二）美國不滿「兩國論」，降低對臺善意

美國在整個亞太戰略佈局中，將台灣視作同一陣營。但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也僅能在「三公報一法」（即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簡稱三公報一法）所形成的框架下進行，也就是「中共不武、台灣不獨、兩岸和平解決」。因此美國不僅對台灣有保護的承諾，也有「不獨」的約束。

因此，1999 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美國政府基本上囿於維持台海穩定的基本戰略思維，以及中共強硬的壓迫之下，而緊縮了對台政策。

¹³⁵ 張同瑩等譯，《台灣有沒有明天？》，（臺北：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2 月出版），81 頁。

¹³⁶ 聯合報編譯組，《中美交鋒》，（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年 2 月出版），23-25 頁。

從柯林頓主動致電江澤民，強調美國對台政策不變¹³⁷、舉行記者會重申美國兩岸政策的「三個支柱論」¹³⁸、到首度正式表明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立場¹³⁹，美國政府基本目的均在於重申「一個中國」原則、降低對台善意、防堵「兩國論」可能帶來的台海緊張。

1999 年「兩國論」提出後的不久，美國即派遣美國在台理事會主席卜睿哲來台「瞭解狀況並交換意見」¹⁴⁰，而華府也在同一個時間宣佈取消原定的軍事代表團訪台事宜¹⁴¹。換言之，正因？「兩國論」的提出，破壞了台海安定現狀，美國政府不再只是隱然視台灣？「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¹⁴²，美國總統柯林頓在 1999 年於紐西蘭舉行的 APEC 高峰會上，更表示李登輝總統所發表的「兩國論」言論，「對中國和美國都製造了很多麻煩」¹⁴³。諸多實例均可顯示，美國在「兩國論」後的美中台戰略三角關係上，表達了對台灣的不滿，從而一定程度地傾向中共。

(3) 美國關注台灣大選，穩定台海局勢

自「兩國論」之後，美國對於台灣大選的「關心」程度，而與中共威嚇相比較，美國方面則顯得要積極善意的多；先有美國在台協會理事會主席卜睿哲於1999年12月中旬來台訪問，表達美國將「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與新當選的台灣總統合作」的基本態度¹⁴⁴；後又有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在2000年年初的記者簡報會上，宣示

¹³⁷ 美國總統柯林頓是於 1999 年 7 月 18 日主動和江澤民通電，談話內容重點在於重申美國政府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並強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沒有改變。見《中國時報》，1999 年 7 月 19 日 3 版。

¹³⁸ 美國總統柯林頓於 1999 年 7 月 21 日舉行白宮記者會，說明美國在處理『兩國論』造成的台海緊張的立場，也就是延續美國兩岸政策的「三個支柱」：贊成「一個中國」、鼓勵兩岸對話、和平解決兩岸問題。見《中國時報》，1999 年 7 月 22 日 1 版。

¹³⁹ 台灣加入聯合國提案於 1999 年 9 月 15 日再度遭到封殺，然而本次提案最特殊之處，在於中、美、英、法、俄 5 個常任理事國，空前連手發言反對台灣友邦提案，這是自 1993 年我國推動參與聯合國以來遭到的最大挫敗，也是美國首度反對我國加入聯合國。見《中時晚報》，1999 年 9 月 16 日 1 版。

¹⁴⁰ 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於 1999 年 7 月 22 日抵台訪問，其聲明是就『兩國論』後續效應問題，專程來台與我政府溝通；據悉，卜睿哲此行不只是來聽我方對『兩國論』的澄清，可能也傳達美方希望我方採取的『適當補救措施』。見《中國時報》，1999 年 7 月 22 日 1 版、2 版。

¹⁴¹ 《中國時報》，1999 年 7 月 21 日 3 版。

¹⁴² 包括了前白宮國安會中國問題專家包道格 (Douglas Paul) 、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研究院院長何漢理 (Harry Harding) 等，均認『兩國論』已是台灣在兩岸政策上做出的『重大改變』，且有「片面破壞現狀 (status quo)」的情形，而可能被美國及中共都視『挑戰』，並呼籲台灣不要給人留下『麻煩製造者』 (trouble maker) 的形象。見《中國時報》，1999 年 7 月 15 日 3 版。

¹⁴³ 《中國時報》，1999 年 9 月 13 日 2 版。

¹⁴⁴ 《中國時報》，1999 年 12 月 16 日 4 版。

「台灣無論是誰當選總統，美國都會尊重並接受的官方立場」¹⁴⁵。

由於「兩國論」造成的衝擊，美國不只一次地宣示其維持中立的立場，可視？美國？「穩定台海情勢，保障美國利益」的具體「預防行動」之一。

美國對於選舉後期中共不斷施壓恫嚇的舉措，也展現了其穩定台海區域和平的決心與力量；在選前一周，中共的威嚇進入高潮，相對的，美國政府也利用各種機會管道，重申其主張台海和平穩定的政策

綜觀所述，在華府看來，不樂見美「中」因北約轟炸中共大使館事件而關係低迷之際，又因「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而益形疏離，更何況維持台海情勢之穩定及堅持兩岸和平解決分歧，系美國一貫之兩岸政策。因此，「柯江熱？」，派遣特使分赴臺北與北京，遂行「預防外交」，傳達華府希望兩岸盡速透過對話而非武力解決歧見之立場，並向北京保證遵守「一個中國」政策，充分彰顯美國對兩岸政策「戰略上明確，戰術上模糊」之一貫立場之意涵¹⁴⁶。

二、美國改善和中共關係，維持台海和平，無形間壓縮台灣國際空間

90年代，中共大陸經濟發展快速，不論在總體經濟層面，如經濟成長率以年平均 10% 的速率增長，使中共大陸在 1990 年代中成？世界上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國民生？毛額，從 1995 年7006 億美元？漲至 2000 年的 10645 億美元；財政收入在短短幾十年就縮短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進入世界前十名的行列。

9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已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市場之一，卓越的經濟力，讓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且美中關係的快速發展已持續 20 年以上，在許多領域出現巨大共同利益。在與美經貿關係中，中國大陸從一個小型的貿易夥伴，升格？一個與之關係密切且積極參與的貿易大國，取代其他東亞國家先前所扮演的角色。

（一）柯林頓時期大陸政策

柯林頓時期對中國大陸政策從「戰略圍堵」轉變至「擴大交往」

¹⁴⁵ 《中國時報》，2000 年 1 月 9 日 4 版。

¹⁴⁶ 同前註 17，237 頁。

的主要因素，不脫出美國國家利益部分。而隨著時代變遷，國家利益不論從功利性、區域性、層次性、多元性探討，仍以政治、經濟、安全三大範疇。後冷戰時期，不論細部利益的影響層面增加或減弱，可歸納出美國五個持續地存在著的國家利益：

- (1) 保護主權、領土及美國人民，並預防、嚇阻對國家的威脅，諸如核生化攻擊及恐怖主義；
- (2) 防止敵對之區域聯盟或霸權的興起；
- (3) 確保海上自由，以及全球海上、空中及太空航路交通之安全；
- (4) 確保美國可自由進出主要市場、取用能源及戰略性資源；
- (5) 嚇阻並於必要時擊退入侵美國及盟邦的行動。

柯林頓在對中國大陸採用交往思維，主要仍是希望以「合作性權力」的方式，促使中國大陸融入國際社會。奈伊之所以提出「建設性交往」，即是希望美國與中國大陸尋求建立一套相互連結的關係。交往政策不若軍事圍堵，而是一項外交戰略，藉由相互連結的過程，將促使雙方不論在經濟上貿易往來或軍事交流，皆能增進彼此之間政策透明度，降低雙方衝突的發生，避免崛起強權利用發動預防性戰爭的方式邁入強權之林。更進一步地說，是讓中國大陸本身必須處理內部面臨改變的事實，進而向國際社會開放，納入現有國際秩序，將威脅到美國在全球或是區域利益的程度降至最小。

同時，交往政策並不是一個以合作？內容的單一體，而是以「主要協調」加上「局部遏制」？主要成分的複合體。而其目的是和平地改變中國大陸，消除來自中國大陸的威脅。美國從實施其全球戰略的角度出發，重視維持與中國大陸關係的基本穩定，同時避免與中國大陸發生戰略對抗，引領中國大陸進入國際體系而成？一個盡責並具建設性的成員，加以中國大陸在世界上的角色重要性逐漸增加，中國大陸將是美國對付全球挑戰和保持亞太權力平衡一股可借重的力量。

(二) 美國改善和中共關係，維持台海和平

因此，從1997年，美國柯林頓政府明確認定，中國在2015年之前不會成？美國的「競爭對手」，強調穩定、開放、繁榮和？建立

更加和平的世界，承擔責任的中國更符合美國的利益。孤立中國並不是一個最好的選項，不但具有反作用，且亦有潛在危險性，更加奠定美中接觸交往的基調¹⁴⁷。

美中關係決定21世紀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因此美國需要擴大與中國大陸的合作領域，著力在雙方高層戰略對話、鼓勵台海兩岸對話、國際不擴散機制、軍備透明度、亞太地區多邊對話機制，以及執法合作等六個方面推動與中國大陸合作，強調中國大陸的建設性作用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不可少的；謀求促進中國大陸承擔責任，鼓勵中國大陸「負責任的大國」更進一步，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與美國聯合行動¹⁴⁸。

江澤民1997年11月成功訪問美國，北京與美國建立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共識。1998年6月柯林頓訪問大陸，在上海口頭宣示「三不」，不但大大改善長期以來充滿摩擦的中共與美國關係，自此華府之兩岸政策向北京一邊傾斜，而且使臺灣陷於「臺北 - 華府 - 北京」三角關係中被動受制的困境，壓縮台灣之國際空間。

1999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美國政府基本上囿於維持台海穩定的基本戰略思維，以及中共強硬的壓迫之下，而緊縮了對台政策。美國總統柯林頓於1999年7月21日舉行白宮記者會，說明美國在處理『兩國論』造成的台海緊張的立場，也就是延續美國兩岸政策的『三個支柱』：贊成『一個中國』、鼓勵兩岸對話、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同年，台灣加入聯合國提案於9月15日再度遭到封殺，然而本次提案最特殊之處，在於中、美、英、法、俄5個常任理事國，空前連手發言反對台灣友邦提案，這是自1993年我國推動參與聯合國以來遭到的最大挫敗，也是美國首度反對我國加入聯合國。

綜觀所述，柯林頓政府從1996年以來的基調就是穩定和中共的關係。在華府看來，不樂見美「中」因北約轟炸中共大使館事件而關係低迷之際，又因「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而益形疏離，更何況維持台海情勢之穩定及堅持兩岸和平解決分歧，系美國一貫之兩岸政策。因此，柯江熱？，派遣特使分赴臺北與北京，遂行「預防外交」，傳達

¹⁴⁷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新世紀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1998年10月；美國國防部，《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

¹⁴⁸ 周煦，〈新世紀中（共）美關係〉，《國際關係學報》，2000年15期，77-78頁。

華府希望兩岸盡速透過對話而非武力解決歧見之立場，並向北京保證遵守「一個中國」政策，充分彰顯美國對兩岸政策「戰略上明確，戰術上模糊」之一貫立場之意涵。

第三節 中共因素

1995 年的第一次飛彈危機，中共不僅中止兩岸間既成的聯繫溝通管道，並且發動文攻武嚇，意圖影響選舉，結果反而促成李登輝高票當選。中共轉而採取「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統戰策略，以此對我政府施壓。

此階段中共對台政策系以「江八點」？綱領，以「收回台灣，完成統一」？最高戰略目標。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執行策略可隨事態發展作不同程度因應。因此，1995 年李登輝訪美所引發的台海危機，乃至 1999 年李登輝的「七塊論」以及「特殊國與國關係論」的相繼提出，與中共長期以來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相悖離，中共反應雖然異常激烈，惟並未逾越「和戰兩手策略」的運用範疇。

一、繼續堅持「一個中國」不變原則，以「江八點」作？跨世紀綱領

中共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制定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江澤民又在1995年提出「江八點」。1997年9月，中共召開「十五大」，這項每五年舉行一次的黨代表大會，被認？具有承先？後的意義，在於重組鄧小平死後中共的權力結構，進而制定所謂具有「跨世紀」涵意的政策內容，也標示著「江澤民時代」的正式來臨¹⁴⁹。在會中江澤民重申，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發展兩岸關係、推進「和平統一」的八項主張。這一重要講話顯示，江澤民地位的強化已經可以在兩岸關係上著力¹⁵⁰。

「江八點」經過「十五大」的黨內決策程式「洗禮」之後，更將確立作？目前中共對台政策最高綱領性黨的指導地位。在即將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中共在對台政策方向上，仍將高舉並貫徹執行鄧小

¹⁴⁹ 陳永生，《十五大後中國大陸的情勢》，（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8 年 9 月出版），84 頁。
¹⁵⁰ 王家英、鄭赤琰，《香港回歸與兩岸關係之展望》，（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9 年 1 月出版），299 頁。

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以「江八點」為綱領，促使台灣儘快舉行政治談判，以推進「和平統一」進程¹⁵¹。

1997年「十五大」更將其作為跨世紀的綱領固定下來。就中共對台政策而言，「一個中國」原則是基石，也是底¹⁵²。無論從以往中共與美國簽署的「三大公報」，或與其他國家簽訂的「建交公報」，乃至於每星期中共外交部例行記者會的不時強調與宣示，中共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乃指「全世界承認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惟在台灣立場，根據行政院新聞局折頁摘述，所謂「一個中國」就是「一個分治的中國」，中華民國自1912年建國以來即為一個主權國家，而自1949年中共政權成立起，中國即處於分治的狀態，其後由於臺北與北京均未統治過對方，當然，誰也不能代表中國，而只能代表各自有效統治的一部分。關於「一個中國」的問題，台灣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曾在1992年就此問題談判了十一個月之久，最後決定先行擱置「一個中國」的爭議，雙方各自表述其內涵，才促成兩會第一次新加坡「辜汪會談」¹⁵³。

由於兩岸對「一個中國」意涵之分歧，中共不承認台灣之對等政治地位，不肯放棄武力犯台，復以雙方欠缺互信，以致1993年4月開辦的兩岸事務性議題協商，終究無法擺脫政治性因素的糾葛與制約，兩岸不能依循先低層次、事務性，漸進至高層次、政治性的協商模式原因也在此。

因此，1995年6月李登輝的美國康乃爾之行，到9月8日，外交部發布「中華民國與聯合國政策說帖」，首度就台灣重返國際社會發表政策白皮書¹⁵⁴等等事例，更令中共認為台灣的「務實外交」目的，明顯的就是背棄「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因此採取激烈的反應，除中斷兩會協商外，並對台施以長達一年的「文攻武嚇」。

¹⁵¹ 同上註，248 頁。

¹⁵² 同上註，306 頁。

¹⁵³ 《透視「一個中國」問題》，（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7 年 5 月出版），2、6 頁。

¹⁵⁴ 林國炯，《戰雲下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6 年 3 月出版），11 頁。

二、開展大國外交，「文攻武嚇」，對台國際孤立

（一）以「文攻武嚇」策略達到促談目的

李登輝訪美之行，引發中共一連串「文攻武嚇」，是自「八二三炮戰」的「第二次台海危機」以來，兩岸情勢最緊張時刻，堪稱「第三次台海危機」。中共目的是希望因而能防止台灣走向分裂，更積極的目的，是北京有意借力使力，促使臺灣同意「在一個中國前提下」進行兩岸談判，亦即「以戰促統」、「以戰逼和」的策略，迫使台灣放棄務實外交上應有的作爲，進而以「主權問題」掌握兩岸關係主動權

¹⁵⁵。

中共自從高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之論調以來，從未放棄過對兩岸談判的呼籲。但是，在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之後，是中共方面採取動作中斷兩會談判，使兩岸已經開辦且已形成某些機制的談判進入停頓狀態。

在此之後，兩岸雖然都在不斷試圖表現自己一方對於談判之恢復的熱誠，但均未採任何實質性動作。直到1997年11月，大陸主動邀請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率團到福州參加會議，新一輪的兩岸談判又見曙光。中共再次採取主動，試圖加強對於台灣的談判攻勢¹⁵⁶，終於促成1998年10月辜汪會晤之「融冰之旅」。

（二）開展大國外交，以「外交打壓」瓦解台灣國際空間

由於中共彰顯「一個中國」原則在所有領域上運用是毫無任何妥協空間，因此「鋪天蓋地」式封鎖台灣的國際空間，亦檢測「一個中國」不容彈性詮釋之指標。自從李登輝訪美後，中共除對台施以「文攻武嚇」外，同時加強與國際間關係，極力促銷「一個中國」與「一國兩制」的主張，企圖使「一個中國」原則在國際間定型化後，運用國際壓力，加強對台和平統戰。

江澤民1997年11月成功訪問美國，1998年6月柯林頓訪問大陸，並在上海口頭宣示「三不」，不但大大改善長期以來充滿摩擦的中共與美國關係，而且使臺北陷於臺北－華府－北京三角關係中被動受制

¹⁵⁵ 同註 17，302 頁。

¹⁵⁶ 同註 51，298 頁。

的困境。1998年11月，江澤民先後訪問俄羅斯、日本，推動所謂的「大國外交」，進一步壓縮台灣外交空間。企圖進行「將台灣現有友邦挖光、國際政治生路堵光、對等談判籌碼擠光」的「三光策略」，讓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無路可走」，從而在「一國兩制」架構下加速統一進程。

三、兩國論出臺後，中共對台多重手段齊上陣

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後，曾引發中共長達一年的一連串「文攻武嚇」動作。1999年5月李登輝新書《台灣的主張》的「七塊論」，以及同年七月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又再次掀起中共對台的文批、透過美國對台施壓、武嚇加文批及國際孤立齊頭並進之多重手段策略。

在中共的反應上，正因？「兩國論」所標榜的「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與中共長期以來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相悖離，其對於「兩國論」自然是激烈反彈，從而利用一連串的文攻武嚇策略對「兩國論」大加鞭撻。

在中共高層的反應上，先有江澤民在7月14日「中央高層會議」上以「三個不論」力抗「兩國論」¹⁵⁷，其次則是8月初中共「北戴河會議」中「一批二看三準備」的具體決議¹⁵⁸，後又有9月初江澤民在APEC高峰會後所提的「兩個條件說」等等¹⁵⁹，在在都顯示了中共欲透過文攻武嚇，對台灣維持高度緊？壓力，以壓縮「兩國論」發展空間的基本策略。但隨著華府不斷重申立場所謂「三個不論」，即江澤民針對「兩國論」，表明「不論涉及什？範圍、不論採取什？手段、不論付出多大代價，都要堅決制止台獨企圖」的立場。

¹⁵⁷ 所謂「三個不論」，即江澤民針對「兩國論」，表明「不論涉及什麼範圍、不論採取什麼手段、不論付出多大代價，都要堅決制止台獨企圖」的立場。見《星島日報》，1999年7月21日6版。

¹⁵⁸ 在1999年8月7日至9日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亦稱北戴河會議）上，中共高層就台海問題訂定了「一批二看三準備」的強硬政策：所謂「批」，是要徹底批鬥李登輝的「兩國論」；而「看」即是觀察，看臺灣是否會對「兩國論」進行修憲，看新當選的領導人是否會糾正「兩國論」，以及看美國是否向台灣施加影響力，要求李登輝收回「兩國論」；至於「準備」，即在保持高度政治壓力的同時，也要施加軍事壓力。見《中國時報》，1999年8月11日14版。

¹⁵⁹ 江澤民在1999年9月8日與澳洲總理霍華德於坎培拉會談時就台灣問題表示：「我認？要實現汪訪台必須要做到以下兩條：一是李登輝公開收回兩國論；二是李登輝只能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而絕不能用總統的身份接待汪道涵。」此段談話被視？其對汪道涵訪台的「兩個條件論」。見《中國時報》，1999年9月9日3版。

中共？防杜台灣「特殊國與國關係論」拉大分離傾向，一方面要求美、日、歐等大國積極表態，意圖將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傾斜至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另一方面要求美國言行一致履行對台「三不」承諾，不僅欲改變美國「促談、不促統」的立場，尚進而推銷「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使得台灣未來在拓展國際空間將會在中共「防獨」？主、「促統」？輔夾擊下，備受挑戰。

1999年10月1日，江澤民在北京天安門城樓發表五十周年「國慶」講話時，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方針，也表達中共堅持完成兩岸統一的意志。江澤民雖未提武力統一，然印證自李登輝總統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宣示以來，中共施展文攻武嚇，窄化台灣國際空間，運用各種國際場合全面遏止「特殊國與國關係論」效應在國際間擴散，同時一再揚言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在在使得江澤民此項未提武力統一而持續貫徹和平統一的對台方針，彰顯中共對台政策「和戰兩手」、「軟硬兼施」的辯證本質¹⁶⁰。

在2000年選戰對峙的前期，中共雖未宣示不介入台灣大選，但卻也間接表達了暫時靜觀其變的態度。然而越接近選舉結果的揭曉，中共的動作也愈加頻繁。訊息釋放也欲趨強烈，從原本的隱性干涉，轉變成？顯性介入，而更進一步地成？台灣總統大選的「參選者」¹⁶¹。由其重要領導人談話可以發現，中共在選舉後期釋放對台政策訊息的基調是「誘談、批李、促統、反獨」。除續批李登輝「兩國論」路？外，並無特地點名批判任何一位候選人，試圖將台灣框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政治談判；並未回應台灣任一位特定總統候選人的政策主張，僅強調「一個中國」、「反對台獨」的強硬立場。貫穿的議題在於強化兩岸政治談判的壓力、表達「反獨促統」的基本立場於每一組總統候選人，其目的則在於打破「兩國論」的傾台獨路？，？台灣大選結束後的兩岸基本框架重新鋪設。

綜觀所述，中共對台政策的發展，在江澤民主政下，無疑的仍將以「江八點」？綱領。只是自「特殊國與國關係論」發表之後，中共將「一個中國」原則無限上綱，提出未來兩岸恢復對話的兩原則：一是台灣明確承諾不搞「兩國論」、一是台灣回到1992年兩岸同意各

¹⁶⁰ 同註 17，261 頁。

¹⁶¹ 《中國時報》，2000 年 2 月 22 日 3 版。

自口頭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由於適值李登輝主政末期，事態延續，影響所及，兩岸僵局迄今仍無法突破。

李登輝主政期間，造成兩岸關係起伏不定，影響兩岸關係的關鍵，主要是認知的差距，中共將對李登輝個人的負面情節與台灣的大陸政策混淆，而非台灣大陸政策有所改變所致。「兩國論」的提出，基本上讓中共對李登輝政府再不抱任何期望，從而提出「寄望於台灣人民」的老調，將未來兩岸談判交流的希望寄託在「新當選的領導人」身上。

第四節 政治系統轉換過程因素

從1997年，美國柯林頓政府明確認定，中國在2015年之前不會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強調穩定、開放、繁榮和建立更加和平的世界，承擔責任的中國更符合美國的利益。在對中國大陸採用交往思維，是希望以「合作性權力」的方式，促使中國大陸融入國際社會。

江澤民1997年11月訪問美國，北京與美國建立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1998年6月柯林頓訪問大陸，並在上海口頭宣示「三不」，華府之兩岸政策向北京一邊傾斜，使臺北陷於臺北－華府－北京三角關係中被動受制的困境，壓縮台灣之國際空間。

這一時期，中共對台現階段政策延續以「江八點」為綱領，以「收回台灣，完成統一」為最高戰略目標，推動所謂的「大國外交」，進一步壓縮台灣外交空間。中共企圖進行「將台灣現有友邦挖光、國際政治生路堵光、對等談判籌碼擠光」的「三光策略」，讓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無路可走」，促使臺北同意「在一個中國前提下」進行兩岸談判，亦即「以戰促統」、「以戰逼和」的策略，迫使台灣放棄務實外交上應有的作為，進而以「主權問題」掌握兩岸關係主動權。

中共這種打壓政策在台灣內部卻不能達到預期之效果。1996年台海危機，台灣的選民在不畏懼中共導彈威脅下，以過半數選票選出李登輝擔任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民主化的深入發展帶動本土化政治力量的發展，兩者密不可分。中共任何對於台灣不友善甚至是武力相

向的行？都會被本土性政治力量用來作？攻擊中共，擴大台灣民？對於本土性政治力量的支持，導致台灣內部統獨意識之消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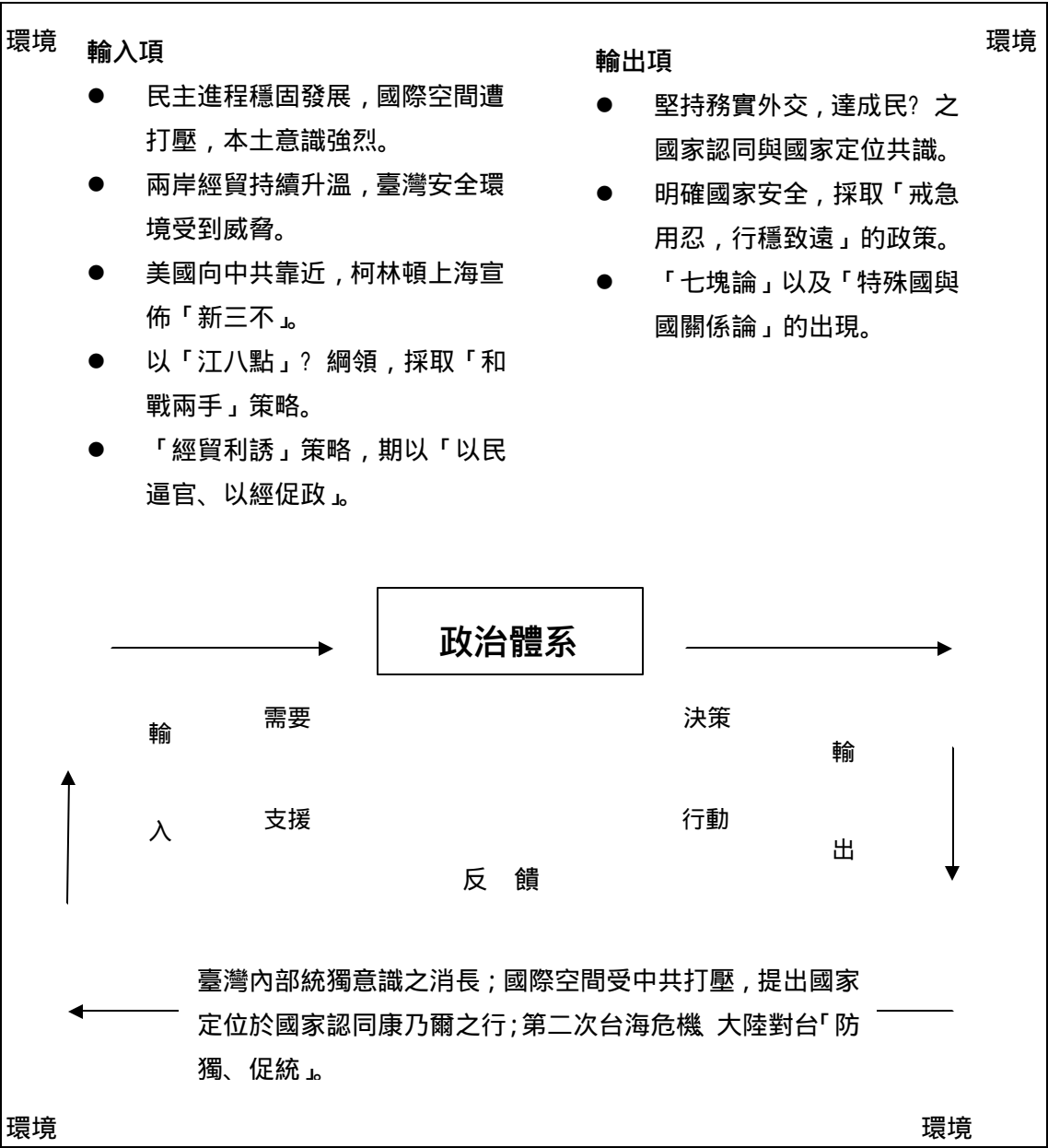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兩岸經貿持續升溫，台灣對大陸依存度提高，安全環境受到威脅。1995年飛彈危機以來，中共對台一連串文攻武嚇期間，採取兩手策略，極力安撫台商情緒；1996年4月以來，則不惜採取「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統戰策略，對台灣工商界人士積極拉攏，使原本可以單純化推展的兩岸關係遭到泛政治化幹擾與扭曲。

因此，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的大原則，來因應兩岸當前的關係，並企盼國內工商業，要體認商機雖然重要，但國家生存發展更？重要，配合政府「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政策，在兩岸的和平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

1999年李登輝執政末期，因應在兩岸關係長期緊張，國民黨支持率一路下滑以及中共對台國際空間嚴重打壓的主因之下，在其卸任前嘗試？兩岸關係定調，提出「兩國論」。這一方面說明其希望不在位後的台灣大陸政策，能夠繼續走「李登輝路？」，並且形塑屬於李登輝個人的歷史評價，另一方面制約宋楚瑜及陳水扁都相對棘手的國家定位問題，更有助於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的選情，給予連戰較有利的制控點。

綜合上述，試就「李登輝權力穩固時期的大陸政策」，依據國內政治因素、美國因素與中共因素等，以「政治系統理論」分析結果如下（圖六）：

圖六：李登輝權力穩固時期的大陸政策系統理論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小結

1995年飛彈危機以來，中共中止了兩岸間既成的聯繫溝通管道，發動文攻武嚇，意圖影響選舉，結果目的不僅未能得逞，且喪失台灣「民心」。由是之故，中共改採凸顯「經貿利誘」策略，刻意採取「冷處理」的手法，「以民逼官」、「以商圍政」的手段，對我政府施壓，期以發揮「以民逼官、以經促政」效益，用以拉攏台商遂其「以台引台」的目的。

與此同時，北京與美國建立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柯林頓訪問大陸，並在上海口頭宣示「三不」。華府之兩岸政策向北京一邊傾斜，使臺北陷於臺北 - 華府 - 北京三角關係中被動受制的困境，壓縮台灣之國際空間。

由此，本研究認為：值基於突破務實外交，經貿安全環境困境，以及爭取未來與中共對等政治談判之有利籌碼等戰略因素考量，李登輝相繼提出「七塊論」以及「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即便引起中共的強烈反應，美國的不滿。

「兩國論」的提出改變了既存的兩岸關係定位結構，並且對台灣內部自我形成一個政策制約的結構。對美國而言，「兩國論」促使其更向中共傾斜，並設法約束台灣內部的論述更加激化；對中共來說，其不但只能「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只能不斷威嚇強化立場，進一步嘗試制約台灣新總統的大陸政策綱領。對台灣內部而言，「兩國論」所形成的高度複雜且多元的反應，其目的就是欲造就台灣人民對於當下兩岸關係定位的共識，同時制約了連、扁、宋三位候選人在國家定位上的發揮。

李登輝總統主政這十二年期間，兩岸關係起伏不定，影響兩岸關係的關鍵，是其大陸政策改變，還是有其他因素？生，本論文後續章節將加以探討與分析。

第五章 李登輝各時期大陸政策之比較

李登輝執政時期，先後成立「國統會」、「陸委會」與「海基會」等單位，促成「辜汪會談」，開啟兩岸民間交流。然 1994 年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談話，引起中共強烈質疑與不滿。隨後 1995 年李登輝以總統之名訪美、1996 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以及 1999 年李登輝正式提出「七塊論」、「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等主張，不但促使中共不斷對台文攻武嚇，更使兩岸關係跌入谷底，自此台海又再次陷入緊張與不確定的敵對狀？。

李登輝執政十二年，期間雖然推動一連串的政治理念與政治改革，但也顛覆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使兩岸關係脫離「一個中國」的軌道，首次呈現多重選項。本章藉由前面各章所述李登輝各個時期大陸政策，著重從中國意識與本體意識、交流政策與對抗政策，統一政策與非統一對策三個方面，進行李登輝各時期之大陸政策比較，綜合國內政治因素、國際（美國）因素與中共因素，分析其變遷之軌跡，試圖對李登輝主政時期各階段之大陸政策做一評價。

第一節 中國意識與本土意識

李登輝執政十二年，中國意識與本土意識至始至終貫穿於大陸政策的決策與制定過程之中。然而就是這十二年，台灣島內的主流意識已從中國意識日益轉化為本土意識。台灣內部的統獨兩方加上位居主流的本土意識之「維持現狀」選民，影響了李登輝中後期大陸政策的方向。

一、 中國意識轉化為本土意識

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中國意識隨著政治與社會走向而有所轉變。在台灣社會演變中，「意識」與「族群」及「認同」等問題難以單獨而存在。台灣的認同問題，從戒嚴令（1987 年 7 月）解除後的近十年，深刻而鮮明的呈現出來，早期台灣朝野對於「中國往何處去？」這個問題，已經逐漸被「台灣往何處去？」這個問題所取代。¹⁶²

¹⁶² 根據現階段臺灣認同問題的外部現象來觀察，至少有兩種形式：（1）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

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之間，透過「本土化」而成為一種「實踐」的方式。在本土化過程中，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撕裂，根植於台灣人民心靈中，對大陸既有「離心力」又有「向心力」兩種力量在拉鋸，離心力指台灣作為大陸漢人移民的地方，一直存有強烈的拒斥中共專制政權，追求自由新生活的內在動力而言；「向心力」指的是大陸是台灣居民化的故土，所以台灣居民對大陸文化具有某種孺慕情懷而言。由於歷史演進中「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推擠作用，以及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政治史的斷裂，所以台灣居民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形成某種緊張性乃至撕裂性。

「中國意識」從早期台灣意識對抗威權體制之演化、制定國家統一相關機制（國統綱領及國統會），一直到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改，甚至教育上與文化上的灌輸等等，無形中，中國意識在台灣之轉化，使「它」成為一種「想像的共同意識」，說它為「想像」還不如說它是一種「統獨發酵」下「意識認同」，「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在「誰是正統，誰是主流」之間互相拉鋸，「主流」或許是「本土化運動」最大的支持力，「正統」無形中也被統獨光譜化約成為「統派」，本土化與「去中國化」無形中成為合流，中國意識在台灣之轉化，或許正好說明瞭台灣在這段期間「政治意識」發展演進的過程。而此一歷史因素，通常都被歸咎於「二二八事件」，造成「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之對立性。

中國意識在台灣之所以轉化為本土意識，除了歷史的因素外，最重要的是，政治人物透過「本土化」與「政治認同」畫上等號之做法，無疑使得本土化與「去中國化」同時在台灣進行，本土化與中國意識之間，並不一定相反或是對立，重要的是，如何在本土化與中國意識之間找到「平衡」。「平衡」即不一定是二元對立的尖銳方式，可以是某種「政治手段」上的「新中間路線」。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長期分離，特別是在冷戰時期所傳播的反共意識，長期的分離（separation）事實，使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台灣民眾愈來愈將自己定位在台澎金馬的國家（state）。基於這一背景，李登輝在執政時期，解構「中國大陸為中

互補緊張；(2) 全球認同與本土認同緊張與辨證。參閱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正中書局，2000年9月），83頁。

心，台灣為邊陲」這樣舊思維的邏輯方式，提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大陸」，重新建構以台灣為中心，提昇台灣的國際地位，在外交上達到「務實外交」的作為，以行動展現出高度的積極性。¹⁶³這一舉措迎合台灣廣大民眾提高國際地位，參與世界事務的願望，獲得廣泛支持。然而，「務實外交」的深層次含義便是政治上的本土化。

政治上的本土化，或許是區分出「同質與異質」的差別，來獲得選民的最高認同，但是社會上與文化上的「本土化」，卻隱含著一種「尋根」與「回歸」的意涵存在，中國意識之轉化，或許有人歸咎於歷史因素的存在，但是真正的因素，卻因政治人物操控而變得更為發酵。

二、 本土意識逐漸成為主流

兩岸關係由於受到歷史因素的制約，凡是探討「中國意識」問題難免必須與族群因素、民族主義及統獨問題一併來探討。兩岸關係隨著時間的發展固然是台灣內部族群整合（integration）的有利因素，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長期分離，特別是在冷戰時期所傳播的反共意識，也發揮了「脫中國」（de-China）的效果，即長期的分離（separation）事實，使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愈來愈將自己定位在台澎金馬的國家（state）。¹⁶⁴

台灣地區由於受到日本殖民統治與二二八事件等歷史因素影響，加上因為威權時期的高壓統治，在國民政府遷台時期，族群背景在政治上、社會上的打壓，政治上沒有台灣人（族群意識）為主的政治地位，社會上的母語（閩南語、客家與、原住民語等）與本土文化也無情地遭受到「外來政權」的打壓，相較於地域上原本與中國大陸就屬於邊陲地區的台灣，開始有了另一個新的想法。

因此，國族主義論述「台灣人出頭天」無疑是將台灣主體性的建構，從一種以大中國為大陸的中心思想，慢慢地把焦點轉移到以台灣為主體性的中心思想。「四百年來第一戰」隱含著台灣長期受到統治，如今有機會當家做主，作自己的主人，以此脈絡追尋下去，欲建

¹⁶³ 此一積極性，具體表現在突破外交困境，赴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進行「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講。

¹⁶⁴ 彭懷恩，《台灣政治發展的反思》（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2002年6月），316頁。

立一個平等合法且合理的政治地位與權力，反威權體制與訴諸族群意識，成了最好且最易獲得內部認同的方式，對國族主義者以族群認同建構之方式逐漸達到效果之時，對內凝聚一種力量足以對抗外來的壓力。

在民主化國家中，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成為政策制訂的基礎。我國從解除戒嚴以來，民主化進程持續成長，雖然我國民主化的發展尚未到達成熟的階段，但社會民意的產出對於我國政府的政策制訂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大陸政策的制訂過程除了決策者對於國家安全的顧慮以外，經濟與社會因素的全盤性考量才是整體大陸政策的基礎。

也由於台灣人民的自主性提高，對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是要走向獨立或是進行統一，部分台灣人民都有各自的統獨意識，而更有超過一半比例的民眾是支持「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或「永遠維持現狀」，而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這裡的「現狀」代表的就是中華民國「實質」上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另外由於民主化的發展，政黨政治的形成與壯大，本土性政治力量的形成，中共任何對於台灣不友善甚至是武力相向的行為都會被本土性政治力量用來作為攻擊中共，擴大台灣民眾對於本土性政治力量的支持。民主化的發展是與本土化政治力量的發展密不可分，而中共對於台灣的種種打壓與文攻武嚇更是本土化政治力量的成長來源之一，也就是說民主化與本土性政治力量的發展與形成，帶動了台灣統獨社會結構的分化。

綜上所述，就是當中共在國際上、外交上打壓台灣，台灣不斷受到中共在國際上打壓，台灣國族論述者正好藉此在國際視聽上建立中共長期「欺負」台灣之形象，在心靈深處「去中國化」的中心思想，更加深國際上「一中一台」的國際形象，也轉變了很大部分希望統一選民的思想，「維持現狀」成為主流。因此台灣內部的統獨兩方加上位居主流的「維持現狀」選民，對於台灣大陸政策的影響就是造就了「又統又獨、既統又獨」的大陸政策方向。

第二節 交流政策與對抗政策

李登輝執政前期積極推動兩岸交流，加強兩岸經貿關係。然隨著時局變遷，執政中後期因應中共「以民逼官、以經促政」之方針，李登輝推行採取「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對抗政策，實乃希望台灣不要因經濟過度依賴大陸，以致政治受制於中共。

一、積極促進兩岸交流

1987 年 11 月 2 日起，政府基於傳統倫理與人道立場考量，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使兩岸社會之交流由秘密走向公開化，也因而開啟了兩岸雙邊日益多元與複雜的互動關係，使兩岸朝向和平交流的方向邁進。根據國統綱領進程，首先是兩岸民間交流階段，期藉由逐步擴大民間交流以促進兩岸人民之相互瞭解；在互惠互動下，以化解雙方之敵意。政府希望以穩健、漸進、主動、積極之原則，逐步擴大交流，建立兩岸交流秩序。兩岸社會交流之演進有以下三個階段¹⁶⁵：

（一）第一階段（1987 年 11 月～1988 年 11 月）- 單向社會交流期：

政府自 1949 年播遷來台後，中共始終與台灣處於敵對狀態，且對台灣從未放棄以武力犯台野心，致使親人分隔海峽兩端。惟政府基於倫理親情、人道精神，及尊重民意之反應下，於 1987 年 10 月 15 日行政院第二五三次院會通過「復興基地居民赴大陸淪陷區探親決定」，政府基於三原則：一是反共國策與光復國土目標不變；二是確保國家安全，防制中共統戰；三是基於傳統倫理及人道立場，自同年 11 月 2 日開放除現役軍人以及現任公職人員以外，凡在大陸有血親、姻親三親等以內之親屬者。至此，隔絕近四十年之兩岸關係，邁向新階段。

（二）第二階段（1988 年 11 月～1992 年 9 月）- 雙向社會交流期：

自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即有部分民眾因年邁、患重病

¹⁶⁵ 《跨越歷史的鴻溝 - 兩岸交流十年的回顧與前瞻》（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7 年 10 月出版），77-78 頁。

或受重傷，無法赴大陸探親。基於人道考量，政府於 1988 年 11 月開放大陸同胞申請來台探病奔喪。1990 年放寬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探病奔喪。1992 年 11 月復修訂「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探病及奔喪申請作業要點」，對年逾七十歲，傷病未癒或行動困難乏人照料，且在台無子女之探病對象，開放其來台探病之大陸地區親屬一人，得申請留台延期照料。

此外，政府亦對犯案之大陸漁民如「閩獅漁號」案，以及大陸偷渡犯溺斃案，基於人道立場，同意渠等親友來台探親。

（三）第三階段（1992 年 9 月迄今） - 穩定發展期：

為使兩岸間之社會交流能在穩定中繼續發展，本諸「一國兩區」理念，適度納入區域法律衝突理論，期使適用結果上能產生若干適用大陸地區的規定。¹⁶⁶1992 年 9 月 18 日，訂定施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1993 年 2 月發布「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等法規，使兩岸社會交流有了明確的規範依據。

隨著交往密切程度的增加，許多問題也接踵發生，畢竟有一個無可避免的事實存在，那就是兩岸擁有各自的管轄主權和法律系統。¹⁶⁶隨著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政府大陸政策開始推行「一個中國前提下兩政治實體互認互存」的統一架構。政府大陸政策的現實目標旨在建立台海之間「穩定對等競爭關係」，由「僵持性分裂」走向「過度性統一」。因此，在中國主權問題上跳離國際法既定的法理和規範，參酌德國的「屋頂理論」，以「主權共用、治權分屬」原則，對事實管轄政權分別以政治實體相互承認為過渡架構。如此既不至於造成「主權分割」，亦迴避了「主權涵蓋」的困擾。¹⁶⁷

二、 前期積極推進兩岸經貿交流

台灣投資環境在八十年代中期後，總體經濟環境因勞工、環保、土地及新台幣升值等問題使內部投資環境惡化，造成廠商出走。在國際方面，由於長期經濟不景氣，國際商機減少，相對於大陸在 1988 年公佈「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保證台商具有經營自主權，並

¹⁶⁶ 《兩岸關係與中國前途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民主基金會，1992 年 1 月出版），131 頁。

¹⁶⁷ 同上註，31 頁。

提供比其他外商更優惠之獎勵投資措施，加上大陸低價土地與原料之誘因，更吸引台商前去投資。而香港以其天時、地利、人和因素，為兩岸提供一個便利之雙向經貿轉口站。這些條件，恰為台商提供了良好之投資環境與商機。¹⁶⁸

在此同時，政府開放兩岸民間交流與大陸經濟改革開放，恰好為當時正方興未艾的區域內相互投資風潮，提供了一個更為廣大的市場。在互補互利原則下，使得兩岸經貿交流得以在短期間內急遽成長。政府也因此在此兩岸經貿「不鼓勵、不禁止」的態度下，於 1994 年提出「兩岸關係以經貿為主軸」的政策宣示，¹⁶⁹顯示政府對兩岸經貿關係的高度謹慎態度。

在中共對台政策裡，希望早日實現兩岸直接三通，一直是 1978 年「告台灣同胞書」以來北京當局一貫的政策目標。1995 年 1 月「江八點」指出：「兩岸經濟相互促進，早日實現兩岸直接三通，不僅是廣大臺胞，特別是台灣工商業者的強大呼聲」。因此，政治目標與經濟手段，就是中共對兩岸經貿交流政策最好的註腳。¹⁷⁰

為破解中共三通攻勢，1995 年 4 月陸委會根據行政院連戰「兩岸關係以經貿為主軸」的指示，研擬「現階段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規劃案」，將配合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在不違背國家整體利益前提下，遵循市場的法則，對兩岸經貿關係作階段性的調整。全力協助本地企業及跨國企業在台灣建立根據地，以開發經營包括大陸地區在內的東亞市場。¹⁷¹政府希望在兩岸政治問題尚未達成一致看法之前，將在兼顧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前提下，先以務實的漸進方式促進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¹⁷²並期以推動亞太營運中心，在九七之後，香港可能面臨政治不穩之際，台灣可謀而取代之，吸引跨國企業來台灣經營，¹⁷³藉經貿國際化的策略，將兩岸經貿關係納入台灣發展全球經

¹⁶⁸ 林文雄，〈台商大陸投資發展分析〉，《共黨問題研究》，第二十七卷第一期，（2001 年 1 月出版），76 頁。

¹⁶⁹ 同前註 4，177 頁。

¹⁷⁰ 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 年 2 月出版），159-160 頁。

¹⁷¹ 《大陸工作參考資料民國七十年至八十六年合訂本》（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8 年 8 月出版），509 頁。

¹⁷² 同前註，590 頁。

¹⁷³ 饒美蛟等編，〈經濟中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88 頁。

貿的一環，來化解中共鼓吹三通所引發的國內外壓力。

由此可見，政府希望藉由兩岸經貿的往來，幫助大陸經濟穩定成長，促其經濟走向市場化，社會趨向開放化，政治邁向民主化。因此，政府可以提供台灣經濟發展經驗，來協助大陸發展經濟，進而加強雙方和諧互動的關係。

三、 中後期採取「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政策對抗中共「以民逼官、以經促政」

根據經濟部統計，截至 1997 年底，台商赴大陸投資件數已逾 2 萬件，總金額為 112 億美元，佔對外投資總額的比例約四成，位居大陸外資第二位，僅次於香港。在兩岸貿易方面，1997 年兩岸貿易總額估計達 264 億美元，佔台灣對外貿易總額比重約 11 %，佔總出口比重近 18 %。這些數據均顯示台灣對外經貿過度集中於大陸市場。¹⁷⁴同時，無論從人口、幅員來看，大陸經濟規模皆超出台灣甚多，因此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進展，可能使台灣的經濟過度依賴大陸市場，進而在政治上受制於中共當局。

1995 年 6 月李登輝訪美後，中共對台一連串文攻武嚇期間，採取兩手策略，極力安撫台商情緒；1996 年 4 月以來，則不惜採取「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統戰策略，對台灣工商界人士積極拉攏，使原本可以單純化推展的兩岸關係遭到泛政治化幹擾與扭曲。¹⁷⁵

當政府憂慮台灣對大陸投資正逐漸形成上、中、下游體系，對台灣經濟成長、產業升級構成強大壓力，而苦思對策。李登輝於 1996 年 9 月 4 日，親臨「第三屆全國經營者大會」致詞：「今年總統選舉期間，中共中止了兩岸間既成的聯繫溝通管道，並發動文攻武嚇，意圖影響選舉，結果目的未能得逞。如今，又刻意採取「冷處理」的手法，「以民逼官」、「以商圍政」的手段，對我政府施壓，企圖提升我社會各界的焦慮感。針對這種情勢，我們更必須秉持「戒急、用忍」的大原則，來因應兩岸當前的關係」。¹⁷⁶

¹⁷⁴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答客問》（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9 年 1 月出版），36-37 頁。

¹⁷⁵ 同註 8，613 頁。

¹⁷⁶ 《李登輝登輝先生八十五年言論選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7 年 6 月出版），231 頁。

李登輝的這項談話，除明確表達「國家安全」的觀念，亦具有提醒工商界赴大陸投資勿隨中共起舞，尤應分散投資風險，不宜過度躁進。並企盼國內工商業，要體認商機雖然重要，但國家生存發展更為重要，配合政府「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政策，在兩岸的和平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¹⁷⁷

在政治面而論，戒急用忍的意涵，亦鋪陳台灣的大陸經貿政策不能僅立足「在商言商」的基礎。1995 年飛彈危機以來，中共對台採文攻武嚇手段，其結果不僅效益不張，且喪失台灣「民心」，已全然悖離「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目標。由是之故，中共乃暫時擱置「武嚇」策略，改採凸顯「經貿利誘」策略，期以發揮「以民逼官、以經促政」效益，用以拉攏台商遂其「以台引台」的目的。

由此可見，李登輝對大陸施以戒急用忍政策，實乃希望台商能有立足分散市場、降低風險之全球經貿戰略考量，而非如外界對戒急用忍僅是「一味限制或踩煞車」之簡單論斷。當大陸對台經貿政策融入高度政治考量時，政府的戒急用忍就可發揮階段性的策略運用，與兩岸關係之緩和與否相適應。¹⁷⁸

第三節 統一政策與非統一政策

李登輝執政時期統一政策與非統一政策相互交織，在這十二年期間具有明顯的時間階段性。從李登輝執政前期、中期、後期的執政理念、政策制定可以看出，其大陸政策變遷是逐層逐步，而非一蹴而就的。

一、前期我國制定國統綱領，開展兩岸溝通談判

「中國的統一與富強是所有中國人共同的期望」這是 1990 年 5 月 20 日，李登輝於第八任總統就職演說中的一段話，並鄭重宣示，「如果中共當局能體認世界大勢之所趨及全體中國人普遍期盼，推行民主

¹⁷⁷ 《李登輝先生八十六年言論選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8 年 6 月出版），132-133 頁。

¹⁷⁸ 潘錫堂，《兩岸關係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年 4 月出版），322-323 頁。

政治及自由經濟制度，放棄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不阻撓我們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開展對外關係，則我們願以對等地位，建立雙方溝通管道，全面開放學術、文化、經貿與科技的交流，以奠定彼此間相互尊重、和平共榮的基礎，期於客觀條件成熟時，依據海峽兩岸中國人公意，研討國家統一事宜」，¹⁷⁹緊接著在 1990 年 10 月 7 日國家統一委員會成立，確立了台灣未來大陸政策內容與走向。

1991 年 2 月 23 日制定的國家統一綱領，具體揭示海峽兩岸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前提下，共同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統一的中國，並將統一過程分為近程 - 交流互惠、中程 - 互信合作、遠程 - 協商統一等三階段。「統一」是最終的目標和不易的原則，而對台灣既有的建設成果和制度的保留是重要的前提，基於這種原則和前提考慮下，於是才產生了逐一階段的交流、瞭解、縮短差距、建立共識到統一。中國統一是必然且可行的，但兩岸目前差距及彼此的敵意和疑懼是存在的，為維護台灣既有的建設成果和人民的生活水準，統一必須先使兩岸的人民生活差距縮短，再進而達成統一。¹⁸⁰

由於兩岸民間交流日趨頻繁，衍生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政府為了維護官方的「三不政策」，乃於 1991 年 2 月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之非營利「民間」團體，接受政府委託與授權，處理涉及公權力的兩岸事務性工作。在與大陸海協會的歷次談判中，雖然海基會有意藉機凸顯兩岸對等政治實體的事實，但重要的目標之一在於解決海上漁事糾紛、大陸偷渡客遣返及保障台商在大陸投資權益等事務性問題。而中共所要的是台灣放棄官方的「三不政策」、直接通航及國共兩黨第三度和談，或是兩岸官方直接進行談判以促進統一。

1991 年 11 月至 1995 年 5 月共進行了兩會各種層級「不定期」與「制度化」協商達十六次，雙方簽署了四項協議及達成了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口頭共識，惟就在 1995 年春節前夕，江澤民提出「江八點」，臺北亦於同年 4 月 8 日回應以「李六條」，台海兩岸暖意連連。

¹⁷⁹ 《李登輝登輝先生七十九年言論選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 年 8 月出版），53-54 頁。

¹⁸⁰ 「國家統一綱領全文」，《聯合報》，1991 年 2 月 24 日 2 版。

二、推廣台灣經驗，爭取大陸民心

早在 1988 年 7 月 12 日中國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現階段大陸政策」，即揭示現階段大陸政策目標是：擴展「台灣經驗」，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發揮政經影響，爭取大陸民心。1990 年 1 月 23 日，李登輝總統在接見來台參加世界自由日外賓代表時，致詞表示「以『台灣經驗』催化大陸的民主運動」。¹⁸¹

所謂的「台灣經驗」是從歷史的架構來看，八十年代之後，台灣方面的自信心已由哲學性的自我肯定轉為具體政治、經濟成就的宣揚。曾擔任新聞局長的邵玉銘先生即表示，「無論從政治、教育、文化和經濟各方面來講，中華民國台灣是中國史上最進步與富足的省分，若從整個民族的前途來看，台灣是中國的唯一希望。近百年來我們探討過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問題和建國模式，也歷經過各種思想的錘鍊，最後付出大陸淪陷代價，才尋出所謂的『台灣經驗』。未來中國發展的模式不在殖民政府型的香港，也不在小島寡民的新加坡，而是在我們台灣。從這個角度看，台灣經驗非常值得我們珍惜。這不是因為它最好，而是因為在中國其他地區沒有比它更好的典範。」¹⁸²

相對而言，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無論是政治或經濟等方面成就與台灣相比之下就大為遜色，就政治而論，台灣雖然未可謂為「完全成熟」的民主政治，但數十年來，台灣地區政治安定，鮮有大規模之政治動亂，為經濟發展及人民生活提供了最佳保障。反觀大陸，近五十年來政治動盪不安，各種政治運動、政治鬥爭如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四人幫、六四天安門事件等，使得中共在過去五十年中政治動盪，社會不安、民生困苦。

因此，兩岸發展的強烈對比，使台灣有信心以「台灣經驗」散播到大陸，發揮「燈塔效應」與「發酵作用」，以民間交流來促成大陸和平演變，使民主的思想能在大陸散佈，逐漸發酵，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發揮政經影響、爭取大陸民心。

此外，兩岸分隔四十餘年，加以大陸地區深受共產馬列主義所摧殘，致使中華文化的延續與傳承受到極大創傷。兩岸中國人既是同出

¹⁸¹ 同註 19，190 頁。

¹⁸² 邵玉銘，《國際局勢與中國前途》（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7 年 6 月出版），164 頁。

一源、血脈相連，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傳統，應是兩岸人民最大的凝聚基礎所在。¹⁸³

1995 年 5 月 30 日時任陸委會主委蕭萬長於大陸工作會議上提出「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關係的主張」。¹⁸⁴兩岸文化交流可使兩岸人民體會中華文化在兩岸不同際遇與體制下造成的差異與優劣，正如在春秋戰國及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國家分裂政治動亂，但藉由文化交流，更促成了中華文化的創新發展。¹⁸⁵兩岸之民間交流之所以持續發展，可以說是基於這種民族文化，以及同源同種的天性與根性，這也是未來兩岸人民建立互信，最終達到兩岸之統一的最堅實基礎所在。

三、始終試圖進行兩岸統一談判，凸顯對等政治實體

李登輝之大陸政策主要是本於前瞻、務實、主動、穩健等規劃特徵，在國統綱領的指導下，將國家的統一目標、原則與進程，做了明確的規劃。¹⁸⁶以「一個國家，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主張，作為兩岸互動定位。¹⁸⁷

兩岸協商談判是屬國統綱領近程的交流與互惠階段，兩岸關係是民間交流性質，仍維持政府「三不」立場，決不接受「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並於 1991 年 2 月許可海基會登記成立，以仲介機構方式協助推動兩岸民間交流，化解雙方歧見與敵意，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爭端。

（一）堅持談判單位之對等原則

政府除了堅持兩岸「一個國家，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之非「國共兩黨」交流之政治主張外，對於協商談判單位之對等，亦有所堅持。海基會之成立是政府為了因應兩岸交流之後，層出不窮的兩岸糾紛，

¹⁸³ 同註 11，98 頁。

¹⁸⁴ 同註 11，917 頁。

¹⁸⁵ 蘇起、張良任，《兩岸文化交流理念、歷程與展望》（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6 年 3 月出版），5 頁。

¹⁸⁶ 黃昆輝，《「中共十四大後之政經趨向與我因應之道研討會」閉幕式專題演講》（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2 年 11 月 15 日）。

¹⁸⁷ 蕭萬長，「八十四年國家建設研究會專題報告－兩岸關係展望」（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5 年 7 月 17 日）。

所採取的應變之道，所以海基會的基本定位是服務性、事務性的一個民間機構。而中共海協會的成立，則是為了實踐中共對台政策的戰略構想，所採取的制變辦法，其基本定位仍是對台統戰性質的一個官方新機構。¹⁸⁸惟「對等原則」是台灣處理兩岸關係必須堅持的原則，而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亦於 1991 年 12 月 16 日海協會成立酒會中透過「中央台」聲稱「『海協會』是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民間團體」。¹⁸⁹

由此可見，海協會既已符合台灣「民間團體」原則，為了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時任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採納陸委會主委黃昆輝建議，堅持認定中共所設置的這個新機構，無論採用什麼名稱，亦無論中共賦予這機構什麼功能，它都只能是與海基會的「對等單位」。¹⁹⁰

（二）框限於事務性及功能性層次

由於政府將兩岸協商談判拘限在海基會與海協會之民間交流層次，以仲介機構來研商解決民間交流衍生的問題，因此，其性質係屬事務性及功能性的商談，針對兩岸在文教、經貿交流過程所衍生問題，獲致有效的解決方法或達成解決的法制化共識，不涉及政治問題。同時，亦希望藉此，為兩會間各級人員的定期會晤，以及正式聯繫管道的確立等事宜，奠立制度化基礎。政府將秉持維護全民利益，國家安全與尊嚴之立場，與立法院保持聯繫，並督導海基會從事兩岸協商談判業務。¹⁹¹

四、後期為台灣之現狀國家定位，「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出爐

在美中台關係相對平穩的狀況下，2000 年總統大選前夕，1999 年「兩國論」的提出，掀起軒然大波。李登輝在其卸任前嘗試為兩岸關係定調，拋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其實是在表明其希望不在位後的台灣大陸政策，能夠繼續走「李登輝路線」，並且形塑屬於李登輝個人的歷史評價；同時，另一方面也有一部份的政治觀察家指出，「兩國論」的提出，可以同時制約宋楚瑜及陳水扁都相對棘手的國家定位

¹⁸⁸ 《兩岸關係里程碑－有關「海協會」之座談紀要》，（臺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1992 年 1 月出版），101-102 頁。

¹⁸⁹ 同上註，182 頁。

¹⁹⁰ 同上註，6 頁。

¹⁹¹ 《「辜汪會談」背景說明》（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3 年 3 月）。

問題，更有助於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的選情。¹⁹²

簡言之，1999 年「兩國論」的提出，是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有關於兩岸關係定位的重要論述。對前李登輝總統而言，透過當時國內外情勢環境的認知和判斷，給了其提出「兩國論」的構想，從而要求研究「兩國論」的智囊團予以落實，另一重要因素是：因應兩岸關係長期緊張以及中共對臺造成嚴重威脅的主因之下，尋求台灣主權獨立地位元元之法律模型，來減低過去政治說詞所產生的法律風險；而在時間點的選擇上，則掌握了美中關係的低潮及汪道涵即將訪台前的契機，¹⁹³緊扣著總統大選的時程而提出。其基本上的策略選擇主要是企圖以「兩國論」框架住台灣對於兩岸定位的空間，對外壓縮在「略傾於中共的美中台三角關係」下，汪道涵訪台可能的談判籌碼，對內則可以創造出關於國家定位的思辯輿論，給予連戰較有利的制控點。

「兩國論」對國內政治環境造成莫大的影響，規範了其後各個總統候選人的大陸政策相關政見。「兩國論」目的是希望將台灣之地位呈現出國家定位明確化，並化為國民意識成熟化的具體表徵，故在「兩國論」提出後，使得統獨光譜與省籍議題，將不再是兩千年總統選戰的核心議題。從這一層面上來看，李登輝成功地達到了為台灣現狀國家定位之目的。

第四節 小結

台灣於 1991 年 2 月 23 日制定國家統一綱領，以作為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綱領中並為國家統一訂有原則、目標與階段進程，具體揭示海峽兩岸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前提下，共同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統一的中國。並將統一過程分為近程 - 交流互惠、中程 - 互信合作、遠程 - 協商統一等三階段。「統一」是最終的目標和不易的原則，而對台灣既有的建設成果和制度的保留是重要的前

¹⁹² 參見：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cn_tw_domestic/88071001.html、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cn_tw_domestic/88071208.html。(2008/4/19)

¹⁹³ 根據 1998 年上海辜汪會晤的四項具體共識，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將於「適當時機」回訪台灣，而一般認為，所謂「適當時機」，當指 1999 年的秋天。詳可見海基會網站，網址：<http://www.sef.org.tw/www/html/koo1.html>。

提，基於這種原則和前提考慮下，於是才產生了逐一階段的交流、瞭解、縮短差距、建立共識到統一，冀望中共當局亦能實事求是，降低敵意，以務實的態度、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解決各項有關問題，從而達成國家統一目標。

在現階段交流互惠的階段，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可分為社會、文化、經貿三方面。社會交流的目的，是滿足人道及倫理的需求；文化交流，是為了增進相互的瞭解；經貿交流，是在建立互補互利的關係。因此，兩岸交流在本研究系指社會、文教及經貿交流。

由於兩岸民間交流日趨頻繁，衍生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政府為了維護官方「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乃於 1991 年 2 月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之非營利「民間」團體，接受政府委託與授權，處理涉及公權力的兩岸事務性工作。

在與大陸海協會的歷次談判中，雖然海基會有意借機凸顯兩岸對等政治實體的事實，但重要的目標之一在於解決海上漁事糾紛、大陸偷渡客遣返及保障台商在大陸投資權益等事務性問題。而中共所要的是臺灣放棄官方的「三不政策」、直接通航及國共兩黨第三度和談，或是兩岸官方直接進行談判以促進統一。

因此，兩岸談判與協商之概念，在現階段僅止於海基與海協兩會雙方事務性協商，至於國共兩黨甚至政府與政府間之正式接觸，以及談判促統、臺灣放棄「三不政策」等議題，雙方僅止於相互對話刺探，企圖營造各自有利條件之階段。

政府大陸政策的現實目標旨在建立台海之間「穩定對等競爭關係」，由「僵持性分裂」走向「過度性統一」。因此，在中國主權問題上跳離國際法既定的法理和規範，參酌德國的「屋頂理論」，以「主權共用、治權分屬」原則，對事實管轄政權分別以政治實體相互承認為過渡架構。如此既不至於造成「主權分割」，亦迴避了「主權涵蓋」的困擾。¹⁹⁴

因此，關於「一個中國」的解讀，兩岸就爭議不休，更遑論有政治統一的共識。以李登輝總統的康乃爾之行以及「特殊國與國關係論」

¹⁹⁴ 同註 6，31 頁。

等事件為例，其所造成的兩岸劍拔弩張情勢，亦是在兩岸交流之後所衍生的問題。而政府的「戒急用忍」與是否開放「三通」之政策，政治面之考量就大於經濟面之現實需要。因此，李登輝時期對大陸之交流與協商，實際上並未脫離國家統一綱領進程的第一階段，雙方僅止於「功能性」與「事務性」事務，尚無法「溢出」至政治性或其他相關領域。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說：「國家的利益源自國家認同。在瞭解自己的利益為何之前，我們必須先認清自己是誰。」(National interest derives form national identity. We have to know who we are before we can know what our interests are.)因此希望藉由本研究結果，一方面讓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認真思考兩岸未來的前途為何才是最有利？並嘗試從紛亂的政治表象中，推敲出兩岸的定位，以及台灣的處境；同時也提醒兩岸主政者在處理兩岸問題時，應以國際情勢與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來取代個人好惡或政黨內耗，以期建立雙贏的兩岸關係。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綜觀前面章節所述，吾人將國內政治因素與外在環境，以及中共對李登輝大陸政策之反應入手，依既定之架構鋪陳分析，期以獲致本研究目的之結論。

李登輝執政十二年期間，雖然推動一連串的政治理念與政治改革，但也顛覆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使兩岸關係脫離「一個中國」的軌道，首次呈現多重選項。然而，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出身於國民黨、繼承蔣經國遺位的李登輝，其大陸政策會從設立「國統綱領」、「陸委會」、「海基會」等的「統一中國」，演變成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類台獨意識」？本研究係依據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理論」分析模式作？研究架構，首先回溯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大陸政策（即政治系統理論中的「輸出項」），就李登輝主政十二年來所推動之大陸政策的內涵、特質、策略作分析，其次探討各階段大陸政策變遷所引發的兩岸及國際效應，最後試從美中台等國際因素影響（即政治系統理論中的「輸入項」）的角度探討其大陸政策變遷之緣由。不以李登輝之人格特質、領導風格等個人因素，以及未經證實之事例？取材，以期跳脫出這些較易流於主觀與偏狹情狀之侷限，以更宏觀之角度作分析。因此，吾人將內在與外在環境，以及兩岸關係互動之因果影響，依既定之架構鋪陳分析，期以獲致本研究目的之結論。

一、李登輝主政時期之大陸政策，採「兩面手法」，以「取得個人最大政治利益」為主要考量

（一）李登輝大陸政策隨國內政治情勢變遷，以迎合民眾的需求

台灣民主化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已蔚然成勢，無法阻擋的趨勢。李登輝做為蔣經國的繼承人，正是順應此一歷史趨勢，延續民主化的風潮而順利當上所謂「民主先生」。李登輝認為：台灣民主化是中國民主化的歷史開端，而中國民主化則是兩岸和平相處及最終走向統一的保證。因此他為自己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的定下雙重歷史任務：（一）儘速推動兩岸關係的正常化，並以之為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二）加速完成台灣內部的政治改革以發揮台灣在兩岸民主統一的關鍵作用。

由此不難看出李登輝執政之初，希望在對等承認的基礎上尋求兩岸的理性溝通，並透過理性溝通而達成共識，最終走向統一。同時，台灣的經濟實力及快速浮現的民主現實，最終會令北京接受李登輝所提出的統一模式。亦即企圖利用台灣經濟與民主的優勢，來影響與重組兩岸關係，再進一步推動台灣的民主改革。

李登輝權力尚未穩固時期亦已意識到「台灣必須走出去！」，但是須顧及國內輿論與民眾觀感，以及中共與美國的反應等。李登輝權力漸穩固，持續推進國內民主化與政治改革，經濟飛速發展，台灣民眾要求提高國際地位，返回世界舞臺。由於台灣民主政治發展漸具規模，經濟自由化的成功轉型，李登輝以務實理念發展兩岸關係、開拓國際空間，這是台灣賴以生存，爭取國家利益，保障國家安全之所繫。

台灣基於這種理念推動下，開展務實外交。終於促使 1995 年 5 月間，美國政府允許李登輝赴美訪問，台灣開拓國際空間作出更大突破，亦是台灣務實外交的一大勝利。然而由於兩岸長期缺乏互信的基礎，加上中共看待台灣從來沒有所謂「對等」、「民主」等觀念，李登輝的兩岸政策不僅泥牛入海，這一訪美事件亦引發第一次「飛彈危機」。

與此同時，李登輝總統任內的「本土化」提倡，平反過去備受壓抑的本土文化，導致國家認同與民族意識的混淆。由於中共無所不用

其極的在國際間壓縮台灣的生存空間，以及以「文攻武嚇」威脅台灣人民，對台灣社會造成極大的反感，本土化意識持續高漲。民主化的深入發展也帶動本土化政治力量的發展，兩者密不可分。中共任何對於台灣不友善甚至是武力相向的行？都會被本土性政治力量用來作？攻擊中共，擴大台灣民？對於本土性政治力量的支持，導致台灣內部統獨意識之消長。

正因？如此，台灣內部民間及政治反對勢力的質疑與批評日漸擴大，整體民意因而傾向「台獨」；國民黨在從 1992 年到 1994 年的選舉競爭中，無論是得票率或是席次都持續下滑，相對的在民主化的潮流中，民進黨卻日益壯大，這種結果反映著國民黨對台灣的控制力已經逐漸下降。

國民黨因？李登輝採取與本省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結盟鞏固統治力量，而導致利益勾結、黑金共生的金權政治。貪汙腐敗逐漸侵蝕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更迫使李登輝必須利用兩岸政策來轉移外界對國民黨「黑金」的指謫與批評，並利用中共的威脅，強化選民對他的支持。最終在 1996 年台海危機中，台灣的選民不畏懼中共導彈威脅，以過半數選票選出李登輝擔任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

李登輝連任後，兩岸經貿持續升溫，台灣對大陸依存度提高，安全環境受到威脅。1995 年飛彈危機以來，中共對台一連串文攻武嚇期間，採取兩手策略，極力安撫台商情緒；1996 年 4 月以來，則不惜採取「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統戰策略，對台灣工商界人士積極拉攏，使原本可以單純化推展的兩岸關係遭到泛政治化幹擾與扭曲。因此，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的大原則，來因應兩岸當前的關係，並企盼國內工商業，要體認商機雖然重要，但國家生存發展更？重要，配合政府「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政策，在兩岸的和平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

李登輝執政末期，因應在兩岸關係長期緊張，國民黨支持率一路下滑以及中共對台國際空間嚴重打壓的主因之下，在其卸任前嘗試？兩岸關係定調，提出「兩國論」。這一方面說明其希望不在位後的台灣大陸政策，能夠繼續走「李登輝路？」，並且形塑屬於李登輝個人的歷史評價，另一方面制約宋楚瑜及陳水扁都相對棘手的國家定位問

題，更有助於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的選情，給予連戰較有利的制控點。

綜上所述，李登輝始終堅持對等地位，對等單位與大陸談判，政經分離。隨著民主化深入發展，台灣民？本土意識增？，希望提升國家地位，參與國際事務。李登輝因應展開務實外交，遭到中共處處打壓，致使台灣內部統獨意識之消長。李登輝在卸任前提出「兩國論」，最終完成台灣民？之國家定位與國家認同。

（二）以「國家統一綱領」？最高指導原則之立場，藉以取得中共信任

李登輝於 1991 年 2 月 23 日制定國家統一綱領，以作？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綱領中並？國家統一訂有原則、目標與階段進程，具體揭示海峽兩岸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前提下，共同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統一的中國。並將統一過程分？近程 - 交流互惠、中程 - 互信合作、遠程 - 協商統一等三階段。

國統綱領自公佈以來，即便自 1995 年 6 月李登輝訪美後引發的中共飛彈危機，使兩岸緊張情勢升高，到 1999 年 7 月李登輝複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遭致中共對台施加一連串文攻武嚇，兩岸關係低迷，政府亦從未改變以國統綱領作？大陸政策指導藍本之規劃與立場，同時，更因其前瞻、務實與穩健的內容，發揮了如下五點功能：

1、縮小朝野對大陸政策認知差距，有助凝聚內部共識。

根據陸委會歷年多次民調顯示，整體而言，有七成多民？贊同國統綱領的各項主張，同時也有六成多至九成多之間的高比例，贊同國統綱領的個別主張。由此可見，國統綱領所具堅定國家統一目標、明確國家認同之意涵，廣受多數民？認同，對促進族群融合、開拓民族視野與胸襟，均能發揮積極整合及促進的效用。

2、有助兩岸維持某種程度的互信，降低中共的疑慮，避免引發戰爭。

自國統綱領公佈以來，儘管中共立足「小褒大貶」的基調予以大肆批判，但大陸迄未公開披露或討論綱領全文，而且亦獲得大陸知識

分子的肯定與私下流傳。尤有甚者，自 1995 年 6 月兩岸協商中斷以來，兩岸關係每下愈況，大陸方面常有涉台官員與學者反而藉質疑台灣政府高層背離國統綱領有以致之，希冀台灣重返國統綱領，裨益兩岸局勢之穩定。

3、堅持一個中國，謀求兩岸和平統一的立場，有助兩岸的制度化協商。

國統綱領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反對使用武力，倡議和平統一，已隱含反對「一中一台」或「台獨」等分離主義的意涵，有助於 1992 年兩岸兩會香港會談的進行，並間接促成 1993 年第一次辜汪會談的召開，及其後所建構的兩岸定期制度化協商機制。

4、以「創造性模糊」手法爭取「以小事大」的應有迴旋空間。

國統綱領倡議兩岸和平統一的三階段進程，惟並無時間表，由近程邁入中程階段端視中共如何展現善意，複設定包括宣示放棄對台用武、不否定台灣、對等政治實體，及不窄化台灣的國際空間等三項「連環套」作？檢測中共對台展現善意的「安全閥」，以避免在安全、對等、尊嚴上未能確保時，即過早進入中程階段，將喪失台灣可進可退之迴旋空間。

尤其以「循序漸進」因應中共的「一步到位」，系台灣戰略運用上可善用「以小事大」籌碼，以爭取安全迴旋空間及進退有據之上上策，切勿操之過急而淪喪兩岸進程之主動籌碼。

5、作？政府分階段協調分工與整合各項大陸工作之藍圖準則。

歷年來陸委會已協調行政院各部會草擬多項「年度」及「中程」計畫，以落實國統綱領近程階段，諸如，以人道考量？優先，逐步擴大民間交流；以文化交流？重點，增進兩岸人民互信；以互補互利？原則，開展兩岸經貿關係等工作，期以透過兩岸頻密的互惠交流，逐漸消弭雙方敵意，有助於由近程邁入中程階段。

（三） 取得中共信任後，轉向走出國際，成功訪問美國

台灣如果要長期依賴遙遠的美國，而與近在咫尺的中共對抗，實有違地緣政治的戰略思考。且自從蘇聯解體後，美蘇關係日趨緩和，

中共反而成為世界上僅存的少數共產主義國家之一，對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與戰略考量，產生一定的威脅。

同時美國為維持在全世界的領導地位，維護在亞洲地去的利益，即使美國對中共以經由「圍堵政策」走向「建設戰略性伙伴關係」，仍不願中共藉由「一國兩制」取得台灣後，跨過台灣海峽，突破美國的亞太防線，從台灣走向全世界。

因此李登輝藉由「國統綱領」、「海基會」、「辜汪會談」等方式，逐步取得中共的信任後轉向美國活動，以爭取台灣的國際地位、外交空間，來達成其「帶領台灣走出去」的目標，並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來感召國人，最後順利取得民意，獲得高達 54%得票率的支持，順利連任總統。再一次成功玩弄「兩面手法」，達到其政治目的，取得個人政治利益。

（四） 中共對李登輝大陸政策的反應正好被運用在台灣島上的政治操作

李登輝總統主政期間，造成兩岸關係起伏不定，影響兩岸關係的關鍵，主要是認知的差距，中共將對李登輝總統個人的負面情節與台灣的大陸政策混淆，而非台灣大陸政策有所改變所致。誠如前述，李登輝總統主政期間，政府大陸政策自始至終均秉承國統綱領之內涵與規劃逐步在推動。

回顧李登輝總統任職十二年以來，兩岸關係起伏甚大。隨著 1991 年海基、海協兩會的成立以及 1993 年辜汪在新加坡的會談，兩岸關係曾展現出一片光明的前景；可是自 1994 年 3 月李登輝與日人司馬遼太郎對話風波起始，1995 年 6 月李登輝訪美，1996 年 3 月海峽飛彈危機，到 1999 年 7 月李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以來，中共對台施加文攻武嚇，兩岸關係陷入谷底。大陸方面發現「雙方在目標上？生巨大的碰撞」。日本每日新聞也指出，李登輝總統的台灣本土意識？烈，讓中共認？李登輝的目標是在追求台灣獨立，兩岸關係走到劍拔弩張、軍備競賽的地步。

而中共更在 2000 年 2 月 21 日發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指出李登輝背離「一個中國」原則，更將「一個中國」原則無限上綱？兩岸一切對話的前提，使兩岸間原存在的、還留有若

干餘地的「一個中國」內涵，完全喪失迴旋空間。影響所及，兩岸僵局迄今仍難以突破。

中共對第一位具台灣人身分的李登輝總統，就任後的民主化與本土化作？，自始即抱持保留態度，這中間涉及中共本身認知問題。中共是一個極權政體，領導人的意志極易貫徹，反證到台灣，兩蔣時期亦復如此，但是後蔣經國時期的解嚴，使得台灣的威權主義解體，進入一個自由主義的公民社會，政府一切施政作？，均受到民意的監督，總統的直選更代表民主政治的落實，一如世界其他民主國家，民選總統，其施政作？必受到民意的制約以及議會的監督與制衡，無關乎總統個人之政治立場與黨派，一切以國家利益？舉的。政府的開放大陸探親、兩岸經貿交流等措施，又何嘗不是事關民？福祉與國家發展需要之施政作？。而推動務實外交、赴美訪問，亦是台灣「以小事大」的重要籌碼，藉此爭得國際較大面向的廣泛支持與迴旋空間，才能扭轉當前兩岸不對等的劣勢格局，這也是一個國家領導者的責任。但是中共？不作如是想，將台灣與大陸政治環境與運作模式等同看待。

另以 1990 年 5 月 1 日政府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宣告？例，雖然政府不再以武力謀求國家統一作？手段，但是「兩岸分治，中共不等於中國」等宣示，等於挑戰中共一向秉持之「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貫立場，中共也疑？這是李登輝「一中一台」的「獨台」甚至「台獨」傾向之意志表現，惟因中共當時對兩岸交流伊始，成效仍有待觀察之統戰策略運作下，靜觀其變。

由前述事例理解，中共打從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對話後，將以往對李登輝的先入？主印象？化，開始公開對李登輝個人展開人身抨擊，且不放過任何一個得以擴大渲染效果的事件，將對李登輝總統個人的負面情節與台灣的大陸政策混淆？一體。而這一做法，恰被島內政治力量所利用，使大陸政策逐漸產生變化。

（五）李登輝的「兩手策略」，使兩岸交流與協商談判，無法「溢出」至政治性其他相關領域

李登輝執政時期，大陸政策乃依據台灣之國力、？策、需求、期望等等，考量如何？生對彼岸的目標並採取行動，較著重單向（台灣對大陸）之政策與決策；不過它背後與台灣內政、外交、經濟、社會

息息相關，並常受到台灣內部（朝野）生態角力之制約與制衡。政府訂頒國家統一綱領，作？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冀望中共當局亦能實事求是，降低敵意，以務實的態度、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推動兩岸交流，從而達成國家統一的目標。

就現實面而言，由於兩岸民間交流日趨頻繁，衍生許多問題需要解？，政府？了維護官方「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乃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接受政府委托與授權，處理涉及公權力的兩岸事務性工作。在與大陸海協會的歷次談判中，雖然海基會有意借機凸顯兩岸對等政治實體的事實，但重要的目標之一在於解？海上漁事糾紛、大陸偷渡客遣返及保障台商在大陸投資權益等事務性問題。而中共所要的是台灣放棄官方的「三不政策」、直接通航及國共兩黨第三度和談，或是兩岸官方直接進行談判以促進統一等，非事務性的政治議題。

由於兩岸在互動與交流中均主張以理性與和平方式來進行，最後達到國家統一的目標，與整合理論所？調以和平來處理相互間衝突之精神相契合。在做法上，主張先從爭議性小、非政治性的經濟與社會領域合作，經由學習過程，逐漸擴大功能合作的範圍，此主張與政府所推動兩岸交流協商之漸進模式亦相符合。但是，另一方面在整合過程中，常從「擴散效應」說明經濟整合如何的由簡入繁，不斷擴大範圍，延伸至其他部門，進而？動政治整合，則與兩岸現？顯有不符。

至於以雙邊的交流接觸、經貿投資等數據之量化指標來評估兩岸整合之程度，或是期望經由制度的設計，使心理、社會與經濟仍有差距的不同政治體，願意接受統一的安排等等的這些的整合效應，亦與兩岸實際交流之動機與結果不同。

吾人透過對李登輝時期大陸政策研究，可以清楚發現，實際上交流即便雙方在各方面擴大交流與互動，並不足以確保雙方和平與穩定。特別是在「不正常」或「不健全」或遭刻意扭曲下，非但使得雙方「功能性」與「事務性」事務，無法順利「溢出」至政治性或其他相關領域，反而更易加深雙方的誤解與敵意，「一個中國」的解讀，兩岸就爭議不休，更遑論有政治統一的共識。中共不承認台灣之對等政治地位，不肯放棄武力犯台，複以雙方欠缺互信，以致 1993 年 4

月開？的兩岸事務性議題協商，終究無法擺脫政治性因素的糾葛與制約，兩岸不能依循先低層次、事務性，漸進至高層次、政治性的協商模式原因也在此。

因此，當李登輝總統 1995 年 6 月的美國康乃爾之行，同年 9 月 8 日，外交部發布「中華民國與聯合國政策說帖」，首度就台灣重返國際社會發表政策白皮書等等事例，更令中共認？台灣的「務實外交」目的，明顯的就是背棄「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因此採取激烈的反應，除中斷兩會協商外，並對台施以長達一年的「文攻武嚇」。再以李登輝總統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論」等事件？例，其所造成的兩岸劍拔弩張情勢，亦是在兩岸交流之後所衍生的問題。而政府的「戒急用忍」與是否開放「三通」之政策，政治面之考量就大於經濟面之現實需要。

綜上所述，李登輝時期大陸政策之執行，兩岸交流與協商，雙方僅止於「功能性」與「事務性」事務，無法「溢出」至政治性或其他相關領域。若政治面考量依舊重於經濟面效益時，兩岸在未建立互動共識之前，實際可行性幾無。

第二節 未來政策及研究建議

一、政策建議

（一）台灣經濟轉型的成功與否將成？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的支撐結構

台灣面對中國大陸「磁吸效應」的持續發酵與全球化貿易全球化競爭，必須加快速度持續進行經濟結構重整與轉型的國家經濟改造工程，否則當台商外移或在中國大陸投資生？的進度遠超過台灣經濟結構轉型的進度時，台灣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將？生邊緣化的現象，台灣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中將處於弱勢的一方，並且喪失談判地位與籌碼，將很難抗拒中共步步進逼的對台統戰策略。

因此，李登輝在處理兩岸關係，制定大陸政策的關鍵就在於台灣經濟是否依賴大陸市場。李登輝認？「大陸投資熱」是一種危機，尤其是在其連任後，兩岸經貿持續升溫，台灣對大陸依存度提高，安全

環境受到威脅。1995 年飛彈危機以來，中共採取兩手策略，極力安撫台商情緒，採取「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統戰策略，對台灣工商界人士積極拉攏，使原本可以單純化推展的兩岸關係遭到泛政治化干擾與扭曲。因此，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大原則下的大陸政策，來因應兩岸當前的關係。

當前處理兩岸關係的關鍵就在於台灣經濟是否能夠順利重整與轉型成功，「大陸投資熱」是一種危機，但也是一種轉機。許多台商到中國大陸投資的目的在於降低？品的生？成本，提升？品的出口競爭力，這類型的台商投資由於是將？業部分或全部外移到中國大陸，如此便可能會造成台灣的？業空洞化問題，但是由於台灣經濟環境無法提供低廉的勞動力，投資優惠政策也無法與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競爭，完全限制這些？業留在台灣，將會使這些？業發生喪失國際競爭優勢與？業萎縮的現象，但是開放某些台灣？業到中國大陸進行投資生？也有助於台灣經濟結構的重整與轉型，關鍵就在於台灣政府如何處理台灣經濟結構轉型的問題。

另外由於中國大陸市場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經濟發展快速所帶來中國大陸廣大市場的需求也必須是台灣經貿發展在全球佈局的策略下所必須重視的區域，因此對於許多高科技廠商到中國大陸設廠是？了接近中國大陸市場的策略也必須加以重視與安排。台灣政府的經濟政策將會對台灣的未來發生重大的影響，影響將不僅在台灣經濟發展方面，對於經濟轉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失業率問題與社會問題也需要台灣政府制訂良好的勞工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加以配套解決。政府大陸政策對台灣產生重大的影響，影響將不僅在台灣經濟發展方面，對於整個社會問題以及台灣的未來也要帶會巨大影響。

（二）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是創造兩岸關係雙贏局面的關鍵

藉由中國大陸的低廉勞動力成本與廣大的市場潛力，台灣由過去依賴美國市場轉向依賴中國大陸市場，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成？台灣的最大出口市場。

台灣是一個具有完整自主權的獨立關稅領域，台灣可以利用 WTO 所提供的自由貿易架構，與其他成員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已

逐漸擺脫在市場上依賴中國大陸的問題。過去「戒急用忍」政策與「南向政策」配套，就是不希望依賴中國大陸，雖然南向政策並沒有成功，但也提供了台灣未來經貿政策的思考方向。如果台灣產業升級成功，中國大陸應該主要做台灣的生產基地，而不是依靠中國大陸市場來維持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這是一個兩岸經貿關係中最重要的課題。

（三）「非統非獨、既統又獨」仍將可能繼續主導台灣的大陸政策

對台灣歷年的大陸政策作分析的結果，台灣的大陸政策呈現「非統非獨、既統又獨」的政策特徵。因為台灣自從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就等於承認中共政權是政治實體，不再以叛亂團體來看待中共政權，國統綱領中更以「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來代表中共與中華民國的地位，並堅持「中國統一」的立場，其實就是意味兩岸分治的政治現實，希望在這樣的基礎上，追求兩岸統一的目標。

可是政治意識型態的歧異與經濟發展程度的差距，還有中共對於台灣國際地位的打壓與「文攻武嚇」的作偽等問題，使台灣人民無法認同中共政權，更無法使兩岸進入國統綱領中的「中程階段」，也使台灣的大陸政策呈現「非統非獨、既統又獨」的特徵，因為雖然無法認同中共而不願意在現階段進行統一，又礙於中共的武力恫嚇，台灣也不敢宣佈獨立，變成了立法委員沈富雄先生所說的「不願統、不敢獨」，台灣的大陸政策便表現出「非統非獨、既統又獨」的特徵。

而兩岸之間經貿交流越密切，兩岸之間因交流而產生的問題越多，中共對於台灣的「外交打壓」與「文攻武嚇」也沒有改善現象出現，再加上台灣社會民主化與本土化所產生的自主意識，台灣的大陸政策發展越是呈現「非統非獨、既統又獨」的特徵，因為「統」與「獨」的因素都同時在增強當中，按照這個趨勢的發展，以後的大陸政策仍可能朝向這個方向發展。

（四）「一個中國」的內涵需要兩岸長時間的互動才能形成共識

由「九二精神」和「九二共識」的內容與爭議來看，台灣內部對於「一個中國」原則並無共識，偏向統派的人士認為一個中國是「未來的中國」，也就是兩岸共組「一個中國」，這個中國是「未來式」，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偏向獨派的人士則認

？，兩岸可以合作，卻不一定要統一，呂秀蓮副總統也提出以「一個中華」代替「一個中國」的論述，認為兩岸都是炎黃子孫，同文同種，但是「台灣絕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即使要統一，統一後的形式或組織也有許多不同的選項可以選擇，也就是說偏向獨派的人士認為統一不一定要選擇「單一國家」的形式，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沈富雄就提出「兩岸共組國協，台琉同時廢武」的主張¹⁹⁵，因為其認為「台灣人民不願統、不敢獨」¹⁹⁶，所以台灣內部都已經無法建立共識，更遑論要與中共建立共識。

所以目前若將兩岸統一的議題集中在政治層面的思考，只會產生爭執和爭議，無法產生共識，甚至會因為兩岸對於一個中國的想法不同而產生兩岸關係的緊張，因此兩岸需要更多的合作來降低兩岸之間的衝突，在共同經濟利益方面進行合作，有助於兩岸對彼此敵意的降低，使兩岸的合作能像功能主義所敘述的「分枝理論」般不停地連結與深化兩岸之間功能性事務的合作與發展，將兩岸的利益結合在一起，兩岸的敵意自然也就有消失的可能。

兩岸統一的政治問題必須要先尋求敵意的降低，甚至是結束敵對的狀態，以共同經濟利益為出發點，共商兩岸統一的未來形式，在全球化潮流的影響下，「單一國家」的政治體制已經不再是唯一選項，兩岸合作的型態有著更多不同的選擇，唯一不變的考量是未來的中國形式必須對兩岸三地的華人都有最大的利益與和平。

二、未來研究建議

（一）待未來海峽兩岸國家級政策文件解密後，或能還原更多李登輝主政時期大陸政策制訂過程的考量與依據：國家政策的相關資料，需由官僚體系中取得資料，還原真相，但海峽兩岸官員往往均以「機密」為由而拒絕提供¹⁹⁷。因此本文僅就官方公開資料、首長相關談話、期刊報導為主，輔之以學者相關學術研

¹⁹⁵ 有關沈富雄所提出的「兩岸共組國協，台琉同時廢武」主張，詳見多維週刊，「台 36 位資政顧問聯名反對[一中]」，<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61/ChinaAffairs/4665.htm>。（2008/4/19）

¹⁹⁶ 「立足台灣 放眼大陸」國統綱領三部曲【專題座談記錄】，中國時報與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共同舉辦，2001 年 2 月 25、26 日，<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tw/200102/2001022501.htm>。（2008/4/19）

¹⁹⁷ 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1986 年），326 頁。

究，以期達到客觀詳實的論述。

- (二) 未能當面訪談當時前國家領袖李登輝、大陸政策決策者，以及曾經擔任或參與兩岸事物決策的重要閣員、智庫學者，未能獲取第一手視聽資料，實乃本文不足之處。
- (三) 受筆者自身過去學習領域侷限，本研究面向僅限於政治因素，並未探討如兩岸經濟社會交流等因素。期待後來研究者以台灣經濟與大陸之關係、兩岸經濟社會交流角度，更廣泛、深入的研究李登輝大陸政策制訂過程之變遷。

參考書目

【中文文獻】

上 冬子著、駱文森譯，《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台北：先覺出版社，2001）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5 1997 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7）

王玉玲，《由兩岸關係探討台灣的統獨問題：以博奕理論析之》（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

王作榮，《壯志未酬》，（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9 年）

王家英，《台灣近年外交政策的趨向》（香港：香港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8）

王家英，《第二次辜汪會談後的兩岸關係》（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9）

王家英、鄭赤琰，《第二次辜汪會晤後的兩岸關係》（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9）

王瑋，《美國對亞太政策的演變（1776 1995）》（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

井尔秀憲著，邱榮金等譯，《台灣經驗與後冷戰的亞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5）

包宗和等，《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初版）

田弘茂、朱雲漢二人所著，《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業強出版社，1997 出版）

江振昌，《兩岸三地的政經情勢》（台北：國關中心，1996）

吳安家，《台海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台北：永業出版社，1996）

吳安家，《台海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台北：永業出版社，1996）

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1986）

沈 野，《都是李登輝惹的禍》（台北：獨家出版社，1994）

李文朗，《台灣民主化的極限》，（台北：正中書局，1999）

李美華等人譯，Earl Babbie 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台北：時英出版社，1998）

李美華等人譯，Earl Babbie 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下）》（台北：時英出版社，1998）

李哲夫，《台海風雨二十年》（台北：海協學術出版社，2000）

李 敖，《李登輝的真面目》（台北：作者出版，2000）

李 敖，《李登輝的假面具》（台北：作者出版，2000）

李 敖，《共產黨李登輝》（台北：作者出版，1989）

李登輝，《見證台灣—蔣經國與我》（台北：允晨出版社，2004）

李登輝，《亞洲的智慧》（台北：遠流出版社，1999）

李登輝，《經營大台灣》（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

李登輝，《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出版社，1999）

李毓昭譯，和泉太郎著，《日美台三國同盟》（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

邱 毅，《李登輝的大謀略》（台北：中華書局，2000）

長谷川慶太，《後李登輝時代風雲》（台北：台灣先智出版社，1999）

周玉蔻，《向李登輝說不》（台北：商智文化，1997）

周玉蔻，《李登輝一九九三》（台北：作者出版，1993）

周玉蔻，《李登輝的一千天 1988-1992》（台北：麥田出版社，1993）

周 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1999）

周陽山，《李登輝執政十年》（台北，新黨出版，1998）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84）

明居正，國際體系理論與兩岸關係，《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4月）

林正義，《中美關係專題研究》（台北：中研院歐美所，1998）

林國炯等，《戰雲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

松本一男，《外國人眼中的李登輝》（台北：國際村文庫，1994）

邵宗海，《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台北：華泰書局，1996）

邵宗海，《兩岸關係》（台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

邵宗海，《兩岸談判中「一個中國」原則之探討》（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9年1月）

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

若林正丈，《蔣經國與李登輝》（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

風雲論壇，《李登輝與台灣未來》（台北：風雲論壇，1989）

胡幼慧，《性質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研究實例》（台北：巨流出版社，1996）

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台灣問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翁明賢，《未來台海衝突中的美國》（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馬英九，《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2）

張友驊，《李登輝接班風暴》（台北，新高地文化，1996）

張友驊，《李登輝霸權危機》（台北，新高地文化，1993）

張旭成，《台灣、中國與世界》（台北，新台灣人叢書，1990）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台北：生智文化事業，1998）

張亞中，《全球化與兩岸統合》，（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張茂森，《二千萬人的抉擇》（台中：台灣報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日報社，1992）

張慧英，《超級外交官：李登輝與它的務實外交》（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6）

張慧英，《李登輝 1988-2000 執政十二年》（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0）

張覺明，《審判李登輝》（台北：學鼎出版社，1995）

張麟徵，《歧路上的台灣》（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

莊芳華，《解構李登輝》（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

許信良口述，《挑戰李登輝》（台北，新新聞出版，1995）

許 漢，《解讀李登輝》（台北：國際村文庫，1995）

郭華倫，《中共問題論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

郭華倫，《中共問題論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 年 10 月）

陳一新，《斷交後的中美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5）

陳世宏，《李登輝先生與台灣民主化》（台北：玉山社，2004）

陳芳明，《李登輝情結》（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陳峰君，《冷戰後亞太國際關係》，（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陳毓鈞，《半個民主先生李登輝》（台北：博揚文化出版社，2001）

陳毓鈞，《一個中國與台北—華府—北京》（台北：寰宇出版社，1996）

陳毓鈞，《戰爭與和平—解析美國對華政策》（台北：寰宇出版社，1996）

陳德昇，《兩岸政經互動》，（台北：永業出版社，1994）

陳儀深，《會診李登輝》（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

黃 年，《李登輝總統的最後一千天》（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黃俊傑，《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台北：正中書局，2000 年 9 月）

葉邦宗，《歷史博議李登輝》（台北：鼎文書局，2000）

葛永光，《台灣的故事—政治篇》（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9）

趙春山等，《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台北：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金會，1991）

彭懷恩，《政治學》（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6）

彭懷恩，《台灣政治發展的反思》（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2002 年 6 月）

鄒景雯，《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台北：印刻出版社，2001）

楊中美，《李登輝 VS 江澤民》（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0）

馮滄祥，《李登輝民主嗎？笑傲江湖對話錄》（台北：苓雅出版社，2000）

趙建民，《兩岸互動與外交競逐》（台北：永業出版社，1994）

蔡 瑋，《中共的涉台決策與兩岸關係發展》（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潘克寬，《台灣一九九〇》（台北：群倫出版社，1986）

潘錫堂，《兩岸關係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0）

潘錫堂，《大陸情勢與兩岸關係演講集》（台北：作者自行出版，1996）

潘錫堂，《中共外交與兩岸關係》（台北：五南出版社，1997）

鄭劍，《跨越太平洋——中美首腦外交五十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鄭竹園，《大陸經濟改革與兩岸關係》（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蕭全政，《巨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

謝奕旭，中共軍事戰略佈局——東突西進、南聯北合 《青年日報》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蘇起，《危險邊緣：從兩國論到一邊一國》（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期刊論文】

兩岸關係與中國前途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民主基金會，1992。

尹慶耀，台海兩岸關係中的若干問題，《共黨問題研究》，第二十四卷第十期，1998，頁7-18。

王家英，李登輝出任以來的大陸政策及其困境，《當代月刊》，第四十四卷，1994。

王慶新，冷戰後美國與東南亞的安全關係及其在區域金融危機之際的變化，《亞洲評論》，春夏卷總第七期，1998年，43頁。

吳玉山，非自願的樞紐，美國在華盛頓台北-北京之間的地位，《政治科學論叢》第十二期（台北），台灣大學政治系，2000。

李雪巖，李登輝洩漏天機與兩岸關係條例，《鏡報月刊》，第一八二期，1992。

李雪巖，李登輝的階段性兩個中國論，《鏡報月刊》，第199期，1994年2月。

周世礁，李登輝執政後「大陸政策」的調整，《台灣研究》，集刊第二、三期，1990。

林正義，台灣兩岸關係的美國因素，《美國研究》，第十八卷第二期，1988，頁1-33。

張五岳、阮銘，兩岸關係與台海安全，《新世紀政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2000。

莫大華，從1996年看台海飛彈危機檢視美國的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美歐月刊》，第十一卷第九期，1996。

許立倫，中華民國大陸政策之歷史回顧與評析，《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十二卷八期，1994。

楊力宇，李登輝對大陸政策的重大啟示：兩岸關係的展望，《動向雜誌》，第六十九期，1991。

趙春山， 建構跨世紀的兩岸關係－正視一個分治中國的現實問題 ，《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四十二卷第九期，1999。

劉國奮， 試析近年來兩岸關係發展中的問題 ，《台灣研究》，第四十三期，1998 年。

劉慶祥， 一個中國的完整敘述－從中共對主權看法分析 ，《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六卷第十一期，2000。

潘錫堂， 台灣宣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台研兩岸前瞻探索》（台北），第十九期，2000。

潘錫堂， 從跨黨派小組到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看當前兩岸關係 ，《第四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2001。

潘錫堂， 台灣二 年大選前後的中共對台策略與兩岸關係 ，《第三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2000。

蔡 瑋， 第三次台海危機：美國、台灣、中共的三角互動 ，《東亞季刊》，第二十七卷第六期，1996 年秋季號。

蔡 瑋， 第三次台海危機中美國的角色 ，《美歐月刊》，第十一卷第六期，1996。

謝昌生， 中共對台灣外交圍堵政策之研析 ，《共黨問題研究》，第二十三卷第十期，1997。

蘇 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八十七年年報 （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9。

【學位論文】

王玉玲，《由兩岸關係（1979—1990）探討台灣統獨問題——以博奕理論作嘗試性分析》，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策略研究所，1990。

李正文，《小布希政府對華政策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2003。

吳國樑，《「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對兩岸關係影響之研究》，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文化教育組碩士論文，2000年。

林姮妤，《台灣國家認同徵一之研究》，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2003。

施長志，《後冷戰時代美國在兩岸關係中所扮演之角色（1989—2000）》，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2003。

胡喬治，《中華民國大陸政策之研究（1987—1992）——大陸政策政策發展過程之分析》，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1992。

馬麗卿，《我國大陸政策演變對兩岸互動之影響》，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2002。

張景明，《李登輝主政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以國家認同為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育文化組碩士論文，2001。

陳鵬光，《李登輝時期大陸政策之研究》，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楊惠智，《論務實外交對兩岸關係之影響》，東海大學政治研究所，1999。

蔣邦文，《中華民國「大陸政策」制定過程之研析（一九八七年迄今）》，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蔡履俊，《「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述之研究》，文化大學大陸研就所碩士論文，2000。

賴昭穎，《從1996年台海危機論美國對台安全政策》，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2000。

【外文文獻】

Christopher, Warren, “ The Strategic Prior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Nov.4, 199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Copper, John F., The Taiwan Political Miracle(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7) .

Easton, David.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5) .

Hu, James S.C., The Crucial Decade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aipei: Sino American Publishing Co., Ltd. 1987) .

Johnson, Janet Buttolph,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Delaware , 2001)

Lake, Anthony,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and Regional Stability in a Time of Change (Taipei: Central Daily News, 1998) .

Laster, Martin L., U.S. Policy toward China ’ s Reunification(Washington, D. C.: Heritage Foundation, 1988) .

Lewicki, Roy J. & John Minton, W., Negotiation (Singapore: McGraw-Hill Book Co., 1999) .

Mishler, Elliot G.,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Myers, Ramon H., A Uniqu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1989) .

Nye, Jr., Joseph S., “ What New World Order? ” ,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 ’ s Press, 1994)

Roderick, Mac Farquha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71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Senese, Doanld J. and Pikcuras, Diane D., Can the Two Chinas Become one?
(Washington, D.C.: Council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1989) .

Shaw, Yu-ming.,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Taiwan: Kwang Hwa
Publishing Co., 1989) .

Stolper, Thomas E.,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 Shore Island(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85) .

Waltz, Kenneth N. “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2 (Fall 1993)

【英文期刊】

Chang, Felix K., Conventional Wa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 《Orbis》 , Fall, 1996, pp577~607.

Haass, Richard N., Fatal Distraction: Bill Clinton ' s Foreign Policy , 《Foreign Policy》 , Fall, 1997, pp112~3.

Lin, Chong-Pin, The Military Balance in the Taiwan Straits , 《The China Journal》 , No. 146, 1996, pp577~95.

Shambaugh, David, Growing Strong: China ' s Challenge to Asian Security , 《Survival》 , Vol. 34, summer 1994.

Tucker, Nancy Bernkopf, China-Taiwan: US Debates and Policy Choices , 《Survival》 , Vol. 40, No 4, winter 1995.

【網路及報章媒體資料】

報紙類：中國時報、中時晚報、聯合報、中央日報、大公報（香港）、文匯報（香港）、瞭望週刊、人民日報、朝日週報、Washington Post、New York Times 等。

【網站】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china.htm>

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

海基會網站，網址：<http://www.sef.org.tw/www/html/koo1.htm>。

「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
<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mlp2-3.htm>

多維週刊，<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61/ChinaAffairs/4665.htm>

「立足台灣 放眼大陸」,國統綱領三部曲【專題座談記錄】，中國時報與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共同舉辦，2001 年 2 月 25、26。
<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tw/200102/2001022501.htm>

羅山愛，美國高官 6 年來首度訪台，〈世界新聞報〉，2007/05/09,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2201/2006/05/25/1905@1060663.htm>